

HUNAN
WENSHI

湖
南
文
史

37
1990/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37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7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高原 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80,000

版次/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

● 顾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鳌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高 康 朴永子

湖南文史

1990

目 录

(总第37辑)

政 坛 史 鉴

四十年來湖南五次机构精简整编始末……………任连荣(1)

1950年整编运动——1955年整顿机构紧缩编制——1957
年至1958年紧缩机构编制下放干部的精简运动——1962年
至1963年“精简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运动——1982
年至1984年机构改革

湘 籍 国 民 党 将 领

抗日名将向敏思将军……………叶 星(47)

喋血淞沪——挺进敌后——长沙歼敌——转战赣鄂——
血战衡桂——乐山整训——率部起义

国民党宪兵副司令吴天鹤……………李静宜(63)

魏巍在九十三军前后……………白 天(69)

记舅父文九德先生……………陈铁如(74)

湘 籍 文 化 名 人

黎澍同志早岁拾遗……………张生力 落一(84)

忆教育家向绍轩先生……………陶铸(92)

报业沧桑录

- 《力报》在沅陵始末……………冯英子(100)
回顾《新潮日报》……………曾楚樵(107)
霍揆彰资助 创刊于常德——沅陵复刊到迁离沅陵——
在长沙与《晚晚报》合并

地下斗争风云

中共湖南省工委系统解放前夕在萍乡城区的斗争

- ……………傅白芦(118)
“你是怎么回到萍乡来的？”——“你们搞了些什么事？”
——“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怪事？”

中央社会部华中工作组地下活动述要……………邓晏如(137)

策反工作——搜集情报——反搬迁——反破坏

三湘史华

- 我是中国第一个女邮工……………贺 勃(150)

历史审判台

周佛海浮沉录……………周之友(156)

- | | |
|-------------|-----------------|
| 一.投敌与粉墨登场 | 六.太平洋战争和周佛海的应变术 |
| 二.狗咬狗的斗争 | 七.汪伪政府垮台 |
| 三.主子 and 奴才 | 八.这边也挂上钩 |
| 四.从长沙到南京 | 九.从白云亭到老虎桥 |
| 五.入“和平军” | 十.周佛海之死 |

四十年来湖南五次机构精简整编始末

任连荣*

四十年来，我省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曾进行过多次精简整编与改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几乎年年都要进行，每一次都对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进行大幅度调整，构成了编制管理运行中跳跃式运动的主线。本文着重对我省1950年、1955年、1957年至1958年、1962年至1963年、1982年至1984年这五次精简整编或机构改革情况作一个回顾，为今后机构改革提供某些借鉴。

1950年整编运动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宣告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任命黄克诚为书记。8月底，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程潜任主任委员。

当时湖南临时省政府基本上是在旧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机构只设置了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等9个工作部门，以管理当务之急，共定人员编制1080名；各专员公署、县政府也相应地设置了上述机构。党群机构的设置，中共湖南省委及湘

*任连荣曾任湖南省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发了《关于各级党委群众团体系统编制草案》，具体规定了省、地、市、县、区党群机构设置和编制，有力地保证了各项任务地完成。

1950年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及时地对临时省政府和各专署、县政府的机构作了初步的调整、改造。各级党委增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确保妇女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位，各地增设妇联会这个群众团体。各级人民政府和群众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具体任务的贯彻落实。但是，随着军事斗争的减弱，各项民主改革的开展和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各级政权组织也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和整顿。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而又可行的行政组织法规，以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家行政机关机构体系。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干部不足以及旧职员的改造和选用。湖南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当时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即：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工作团成员，湖南地下党干部，留用的旧政府职员。长沙和平解放后，省委一方面采取措施，曾采用办干部学校、办各种党员训练班的形式，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积极做好旧政府职员安置、整顿工作，解决对这批干部的安置问题。解放前夕，我省旧政权工作人员虽有80%的停薪留职，但解放后有大部分人为了生活又报到工作，机关人员庞杂。旧职人员思想成份更为复杂。当时，我们党和政府对旧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采用留用政策，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原则，尽量给予安置。一部分进步官员在新政府中继续担任原职，一部分职员继续留任工作。但因新编制尚未确定，去留暂未宣布，旧职人员思想大多不安定。机关人浮于事严重，仅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就达1200人。因此，新政权在面临对旧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和选用的情况下，迫

切需要有统一的编制来约束。

湖南于1950年3月，遵照中央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宣布成立省整编委员会（亦称编制委员会），任命王首道为省编委主任，周礼、陈再励为副主任。着手进行全省的整编工作。与此同时，省直机关和各专区也成立了整编委员会。各专区整编委员会由专员、组织部长、民政科长等五至七人组成；县级在一般情况下不再设置整编机构，由县委组织部长及民政科长负责领导整编运动。

湖南省整编运动是从省直机关开始的。省直机关根据当时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机构方面增设了一些极需要加强的工作部门。如增设水利局，增设农业厅的植物病虫害防治站与兽疫防治队；为了加强对南岳的管理，增设了南岳管理局和南岳疗养院；加强了财政厅的经济监督部门。在人员编制方面，各厅、局、委原则上依照中央的规定配备，只个别稍微作了一些调整。在整编方法上，首先由人事部门了解职工、干部的思想情况、工作态度、业务能力，通过个别谈心活动，介绍整编情况，说明整编意义。在此基础上及时地召开直属机关干部与勤杂人员的动员大会，由袁任远副主任作报告，宣讲整编的目的和意义，说明整编主要是为了核实人数，对工作人员统一调整使用，目的在于提高工作效率，缩减国家财政开支；同时，宣传整编的政策，党和国家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不变，对于所有工作人员，不管是编内、编外，国家都负责，编外人员决不推出不管，认真负责解决膳食住房等问题。通过动员和宣传，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疑虑，解除了人们对编制运动的恐惧心理。然后，认真登记各机关编外人员，组织他们学习，接受教育，克服他们的旧思想、旧作风，使之树立新的人生观，并由省编委负责统一调配、使用。省级各工作部门的编制，由直属编制小组提出整编草案，省编委决定。

一、省编制委员会核准了长沙、衡阳二市自行拟订的编制草案。按中央规定，两市编制员额为4507人。从长沙市调出1300人，从衡阳市调出250人，以弥补本省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编制之不足。

二、按照政务院有关规定，根据各专区所辖单位的多少及工作发展情况，将全省10个专区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长沙、衡阳、益阳、常德为甲等专区，编制为320人；郴州、邵阳、零陵为乙等专区，编制300人；沅陵、永顺、会同为丙等专区，编制为280人；湘西办事处的编制，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不得超过250人。此外，给予每个专区预备员额8名。

三、根据中央编制草案的规定，省编制委员会决定，对县的区划和编制规定如下：县的划分，以恢复抗战以前的县制为原则，然后作适当的调整。按照政务院《暂行编制草案》规定，根据各县的实际情况，将全省77个县划分为特等县18个，编制280人；甲等县14个，编制为240人；乙等县26个，编制为220人；丙等县19个，编制为200人。

四、根据中央三级制政权的决定，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整编中对区公所和乡一级政权建设也作了明确规定。区的设置一般根据各县人口密度、面积大小和其他自然、社会条件，平均每区人口为38000人，面积为280平方公里，管辖8至15个乡，编制为24至26人。乡的设置原则上不打乱旧保的基础，但不完全按旧保建乡，根据具体情况，一般以面积15平方公里，人口2500至5000人左右的标准建乡。每个乡配备脱产干部2至3人。

从专署到乡各级的整编方法与省直机关一样，事先认真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认识，明确整编意义，由领导对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政治表现、工作能力进行考察评定，然后确定编内编外人员。对编外人员，按照党的政策，不

抱任何歧视态度，对他们的生活前途认真负责。名单逐级呈报，由各级编委统一调配使用。对于一时还不能安排的编余人员，原则上以专区为单位，指定地点集中整训，等候调用。防止了大批“洗刷”和推出不管的倾向。对于无工作能力而又自愿回家的编余人员，准其回家生产，并按规定给足回家路费。

全省整编后，初步建立健全了各级政府机关，加强了政府对经济工作的管理，核实了各级党政机关人数，统一了编制。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党派、群众团体共定编43167人，其中省级2808人。整编中，各级共列编外人员13646人，其中省级2108人。通过对编外人员的集训、调整，安排了9361人（其中省级1184人），占编外人员总数的68.6%。这次整编运动，加强了政权组织建设，调整了人员分布，纯洁了干部队伍，促进了各类工作人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整编中精减了一部分人员，不仅节约了国家财政支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的现象。

这次整编不仅统一了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编制，而且针对战争刚刚结束、人员思想成份较复杂的情况，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清理选用了旧机关工作人员。在定编的同时，对干部和职员开展了“三查三整”，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使整编运动与干部教育相互促进，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整编，是在我国政权初创阶段进行的一次精简整编，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既无现成的系统理论指导，也没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可供借鉴，因此经过整编后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是，1950年这次整编运动，就建立全国行政机关机构体系，统一全国编制，加速我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

1955年整顿机构紧缩编制

我省于1955年1月开始进行了编制调整，根据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的指示，4月底进行精简整编的准备工作，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精简整编。我省这次精简整编，主要是精简机构、紧缩编制。从调查研究入手，把改善领导关系、改进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根据全省各方面的任务及总编制的情况，考虑各个部门的职责任务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全省重点是加强县级和上级明文规定的某些部门。

根据当年形势发展，我省整顿机构、紧缩编制的工作是分两步进行的。从1955年1月初到4月，以调整编制为主要内容；从5月开始精简机构、紧缩编制为主要内容。

从1955年1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编制委员会针对当时全省编制安排不够合理的情况，决定对全省的编制加以调整，提出了《关于1955年全省编制的初步意见》。1月17日，以省委组织部的名义，正式提出了调整方案。2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1955年全省调整编制的指示》，省委指出：1955年中央拨给我省总编制为59766人，基本上维持了1954年的编制，因此只能在1954年编制的基础上适当进行调整。省委强调，调整编制必须从工作出发，根据我省情况，应加强首要部门和重要地区，加强省、县两级领导，照顾某些部门和地区的特殊情况。各专、县的总编制确定后，其所属各部门的具体编制一般不宜由省规定，而应由各专、县自己根据实际需要，参考各部门上级机关的意见，加以确定或随时调整，但必须加强农村工作部、财经部（包括财委）。省委号召，各级必须从节约国家财政开支出发，认真精简某些机构，精打细算，合理使用编制。

在机构方面，1955年2月4日至7日，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将湖南省人民政府改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改为人民委员会。经国务院4月29日（55）国秘常字第79号批复，省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设民政、公安等14个厅，劳动、统计等9个局，以及计委、办公厅等3个委、7个办公机构，共计33个机构。

1955年3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在整顿编制中作处理好编余人员工作的指示》。对整编中的编余人员，省委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①部分能够分配工作的应另行分配工作。②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年轻力壮并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由各级编委掌握，集中起来培养训练，以备将来分配工作。③其他编余人员，包括大多数脱产不久的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根分子，动员他们回乡生产。

1955年3月11日，国务院就成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委员会问题发出电报通知：“为了紧缩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国务院已成立编制工资委员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亦应成立编制委员会，统一管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各级行政、事业和企业机关的编制工作。”通知指出，“国务院已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整顿机构紧缩编制的工作，这次整顿，必须达到合理的确定机构，确定人员，通过整顿应达到精干机构，紧缩编制，节省人力财力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国务院还强调，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编制委员会应即组织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摸清省、专、县、区、乡及各等城市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精简原则提出各级机构的设置和编制定员方案，5月初报送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

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湖南省新的编制委员会经3月30日省人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成立，由省委书记周小舟任主任，李瑞山、胡继宗、刘君实任副主任，于明涛等11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办全省精简整编工作的具体事宜。省编委成立后，4月底进行的整编的准备工作，重点调查了7个单位的情况。5月初，省委再发出通知，为整顿编制，精简机构，定决各部、委、厅、局、院、行在党组领导下，迅速成立编制委员会分会，负责领导各单位的整编工作。

1955年5月中旬，全省开始整编，省直机关首先全面铺开；各专、市、县的整编，省委选定二个地区、三个市、五个县重点调查研究，提供整编方案。

整编方法。省直机关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整编方案，一方面由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动手，自上而下地摸底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另一方面召开本单位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发动群众揭发不合理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各单位根据本身的工作任务，从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改善领导着眼，按照精简原则，提出本单位编制定员方案，然后由各战线负责同志及编委会逐单位反复进行审查，根据全省各个方面的任务及全省总编制情况来考虑各个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各单位发动群众后，揭发了很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省农业厅、水利厅既设有干部科，又设有人事科，工作重复；水利厅疗养院设主任1人，勤杂1人，但仅有一个病号。有的单位公文多，报表多，办事手续复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严重。如省工业厅的一般公文从收到发，要经过20道手续。1955年1月湖南制药厂请示核拨经费一文，经4个处、24个干部来往会办54次，签注大小意见19条（其中有六条系领导签的），周转105天才发出。还有为机关直接或间接服务的人员太多，总务、工勤人员比例很大，省总工会办公室的

事务、勤杂等人员就有56个，占机关总人数95人的58.9%。

这些问题的揭发，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加快了整编工作的进程。不少单位对整编工作严肃认真，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如省粮食厅，整编开始后，三个厅长对全省粮食系统的机构编制情况先后研究了三次，并召开了党委会、编委会、厅务会专门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联系本厅、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召开全厅干部大会和各专署粮食局秘书会议，进行整编动员；尔后以处、科为单位进行讨论，揭发厅本身和全省粮食系统机构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计划估算各处、科和全省各级粮食系统的具体工作量。全省县以上粮食系统中，估计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手续后，可节约1/5的编制，即全省可减少1000人。后实际减少890人。

省直机关各个业务部门在精简中，大多数单位都分析了计划、统计、财务、劳动、人事、保卫、监察等机构所占本单位编制比重太大的问题，据反映有的单位甚至达到2/3。精简中首先对各单位的政治人事机构专门进行了研究，凡是直属单位多、干部数量多、且直接管理一部分干部的单位才设立政治处或人事处（科）；凡是下属单位归当地直接领导，干部也归当地管理的，就不设政治人事机构，只配一两个专职干部管理本厅（局）的政治人事工作，这样政治人事机构的编制缩减了。

正确处理好调整出来的人员，是做好精简整编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因此，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解决一系列复杂的实际问题，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调整处理编余人员，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我省当年通过对农业厅等7个单位共281名编余人员的情况分析，大体可以分为4类：一是具有一定文化和一定工作能力的135人，占48.4%；二是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有重大政治嫌疑者和政治历史复杂的83人，占29.5%；三是能力太弱不能胜任工作，又无培养前途，甚至思想蜕化的

36人,占12.8%;四是老弱病残丧失工作能力的26人,占9.3%。对这几类人员的安排处理,根据中央要求,省委强调思想工作,实行首长负责制,并有专门机构负责办理;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调职、离职人员的困难,给予热情的关怀和照顾,不能推了了事。对于上述各类人员,具体按以下办法处理:①对第一类人员,贯彻紧缩上层领导机关,加强下层或基础单位的精神,“层层下放”,另外分配工作或培养训练。②对第二类人员,查实属于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依法处理,不能法办的办教养院教养。③对第三类人员原则上动员回乡生产,确无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的,由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安置适当工作;某些不能工作的女干部,动员其当家属,生活确有困难者给予适当补助。④对第四类人员按退休、退职办法处理或给予妥善安置;其中个别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而丧失工作能力的,有关部门给予特殊照顾。

这次精简整编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省在省级各战线党组和各级所提整编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全省编制情况和精简精神,省编委办公室于5月26日起草了《全省各级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初步拟定全省各级行政编制为58770名,比当时全省行政编制总数减少2090人(不含行政机构用企、事业费开支的编制),占3.4%。1955年6月22日,省编委又草拟了《全省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初步方案的第二次修改意见》,并经省委同意上报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

精简结果:到8月中旬,省直机关在机构方面主要是精简了大批处、科机构。据对27个部、委、厅、局统计,整编前共有109个处室,整编中有11个部、委、厅、局精简了36个处,占33%;整编前共有304个科级机构,整编中精简了54个科,占17.7%。如省委组织部、工业部等单位,原设了41个科,整编中精简了21个科。农村部、监委等单位处以下均不设科。这

样，省直机关一般是二级制（即厅、处（或科）两级），而且大多是废处留科，只有公安厅、检察院、农业厅等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保留三级制，设有少量的科；不仅如此，处、科级干部职数一般也只配一线，少数工作确需才配二线。

在人员编制方面。当时中央拨给我省各级行政编制总额为60223人，此外由事、企业及预备经费开支的2387人，总共62610人。这次整编共减少2273人（其中行政1050人，事、企业及预备费开支1223人），其中，省直党政群机关共有50个机构，编制5005人（含由企、事业费开支的人数），除新建和需要加强的部门外，有30个单位共减少817人，占这30个单位总编制3992人的20.8%，这就是说60%的单位减少了20.8%的编制。

市级：全省9个市共有行政编制4362人（不含系统管理的编制），其中7个小市编制不多，这次未予减少，主要紧缩了长沙、衡阳两市。长沙市编制2034人，减少293人，占14.4%；衡阳市编制570人，减少75人，占11.6%，共减少368人，占两市编制数的14.1%。

县级机构和编制基本维持现状，只是对个别县之间稍作调整。专区和农村区因牵涉其工作任务和设置等问题，故机构和编制未作大的变动调整。

此外，系统管理的编制，如粮食、税务、公安、检察等系统，也分别进行了精减。

1955年11月，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核拨我省行政编制总额为66111人，其中包括公安、检察、司法、监察系统17852名，占总编制的27%；分配省级3949名，专级2629名，市级6040名，县级17940名，区级18091名，共计48649名，占总编制的63%。这样基本上保证了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需要。

这次精简整编，全省从5月正式开始，到8月底基本结束，历时4个月。除取得上述主要成绩外，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少数单位精简决心不太大，总在精简数字上考虑过多；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整编从总体上看，研究业务，改进工作，理顺部门之间业务关系的目的并没真正达到，实际上也不可能达到。

1957年至1958年紧缩机构编制

下放干部的精简动运

1957年春至1958年，湖南省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一场紧缩机构、精简编制、下放干部的精简运动。

这次紧缩机构、精简编制的工作，是从下放干部开始的。1957年初，湖南省编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经省委同意，确定在省直机关42个单位中精简编制565名，并从省机动名额内拿出135名，共700名编制，连人带编分配到全省75个县，以充实加强基层。6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从省直属机关抽调干部下放到基层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省直机关各单位下放的干部应携带编制。7月1日，省委组织部、省编制委员会、省财政厅联合发出《关于下放干部下带编制的通知》，对省委6月15日通知精神进行具体落实，“按省委通知规定下放干部一律按系统分配。带行政编制下放的干部应下放到基层行政部门搞农业合作化；带事（企）业编制下放的干部应下放到本系统内基层生产和事业单位；”“凡党政机关下放的干部应携带行政编制；凡文化、教育、卫生、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系统下放的干部，一般应首先补充核定所属系统的年度劳动计划的缺额，如因下放而超过劳动计划的部分，应下带事业编制，凡商业、粮食等系统下放的干部，“经费开支问题由

本系统上下协商解决。”

全省各级紧缩机构、编制的工作，在方法步骤上，根据省委、省人委的部署，省、专、市、县基本上全面展开，首先着手制定各级精简方案。

1957年3月底，湖南省第五次组织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根据当时各级组织机构普遍存在编制庞大、机构重叠、层次繁多、效率不高的情况，用较多的时间讨论研究了精简上层机构、充实基层力量的问题。总的精神是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要精简，又要照顾工作任务的需要。

1957年4月初，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省级机关精简节约的几项规定》。关于机构编制精简问题，《规定》指出：①不论行政、事业、企业的机构、编制一律冻结，如有特殊需要，须经省人委和省委批准；②减少层次，省级各厅、局、院、部、委的内部机构，一般只设处室，实行两级制；③精简编制，省级机关按现有编制初步减少30%。随后，省直机关制定了紧缩机构编制的方案，经几次修改后开始实施。

1957年4月6日，省委组织部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简机构的精神和我省各市的实际情况，对市级机构编制调整提出具体意见。1957年我省有9个市的建制。市的机构设置总的原则是：大市一般可设细一些，但应减少层次，小市由于编制限制，机构设置宜粗一些，机构不强求划一、上下对口。1957年5月24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1957年县（镇）级机构和人员编制试行草案》对县级党政群机关机构设置、编制配备提出了原则意见。此外，我省当时还对各级事、企业单位制定了精简计划。1957年9月18日，湖南省编制委员会制定了《湖南省各种事业、企业机构精简计划指标（初稿）》，根据各类事、企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对全省各级商业、供销、服务、粮食、农业、

林业等25个系统，提出了具体的精简指标。

1957年10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对我省各级紧缩机构编制方案又进行了讨论，并分别征求了各有关部门和专、市、县的意见。11月底，省委颁发了《湖南省1957年紧缩机构编制第二次修正草案》。

省级：撤销省人委现有的政法、文教、财贸、工业、交通、农林水等六个办公室；省服务厅、外贸局合并到供销社；省航运厅、公路厅合并为交通厅；省财政厅的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合并到人民银行；省物资供应局、物资储备局合并为物资供应储备局，属省计委二级局；省统计局改为计委二级局，物价局改为省计委物价处；农业厅与水利厅合并为农业厅；森工局并入林业厅；水文总站与气象局合并为水文气象局，属农业厅二级局；农业厅所属畜牧局、水产局合并为畜牧水产局，属二级局；省人事局留干部10人，并入省人委办公厅，保留人事局名义；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轻工业厅，原工业厅所属重工业、轻工业、煤矿、纺织、机电五个局撤销，撤销手工业管理局，并入轻工业厅；撤销司法厅，其任务交法院；省委工业部与交通部合并为工业交通部等。

地专级：专署民政、人事、劳动科和监察室四个单位合并为民政监察办公室；工业局（科）、交通科、手工业处合并为工业交通办公室；撤销服务局及专级公司，保留批发站；农业、水利局合并为农业局；森工局并入林业局，或者农业、林业、水利三局合并，保留森工局；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并入人民银行。

县级：民政、人事、劳动三个科合并为民政科，保留监察室；小县教育、文化科合并为文教科，体委并入文教科；大县或工作任务较多的县，工业、手工业、交通科合并为工业交通

科，个别小县不设科，任务由财办担负；撤销服务局，设立畜牧水产局（科）；农业、林业、水利三个局合并为农林水利局，森工局根据任务大小确定并入或保留；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并入到人民银行；县人委各战线办公室除保留财经办公室外，其他一律撤银。

市级：暂保留市服务局；市人委各战线办公室的撤并与否，由各市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全省各级党政群机关、各种事业、企业机构1956年末实有333102人（不含中小学教师、公私合营职员及各种工人、营业员），经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初步确定全省精简指标为30%，即应精简100085人。其中省级精简51%，湘潭、常德地区27%，邵阳、衡阳地区26%，郴县、黔阳地区25%，自治州21%，长沙市35%，衡阳市30%，株洲市15%。以上精简总指标，由各地分别按党政群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不同情况进行落实。其中，各级党政群机关的精简指标是：省级46%，专、县级39%以上。事业企业单位主要是精简管理人员和非生产人员，步骤上放在干部精简以后再进行。有关事业、企业单位的精简指标是：财贸系统34.8%以上，农林水系统19.4%，交通系统19.5%，工业系统各厂矿企业管理人员45.1%，其他各系统也应适当进行精简。

省委、省人委这个方案下达后，各级立即组织实施，其中省直和市级先行一步。1957年12月4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撤并办公机构和部分工作部门的决定》，拟撤销合并一些机构。经国务院（58）直秘习字46号批复同意，省人民委员会撤销政法、文教、工业、财粮贸、农林水、交通、对资改造等七个办公室，其业务由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办理；服务厅与对外贸易局与供销合作社合并，仍称省供销合作社，省物资供应局与储备物资管理局合并，成立物资储备供应局，省计委领

导，公路厅、航运厅合并，成立交通厅；水利厅并入农业厅，森工厅并入林业厅；水文总站与气象局合并，成立水文气象局，属农业厅领导；城市建设局改为基本建设局；省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并入人民银行。

省级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按照1957年紧缩机构编制草案，应精简11007人，占省级总人数的41.7%。据省编委12月底统计，当时已精简10849人，占精简任务的98.6%；机构上除上述一级机构变动外，各厅、局、部、委内部处、室、科和所属的站、公司机构，也作了必要的调整。省直机关单位二级局、处、室、科、站、公司由751个调整为468个，减少283个，占37.7%，其中厅、局直属处、科减少101个，占原有数的28.4%；处、室下面的科减少182个，占原有数的45.9%，省级基本上执行了二级制。

市级精简在1957年变化不大，只是在部门之间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随着195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级人委的工作得到了加强。

为了做好紧缩机构编制、下放干部的各项具体工作，各级分别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和实施。1957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办公室的通知》，决定该办公室从12月10日起开始办公。12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委应立即成立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机构，并配备一定的力量，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做好接收安置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8年2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紧缩省、专（市）、县级机构的意见》。省委指出，去春以来，各级机构虽作了某些调整，但还是很不够的。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指示，加强基层，全省各级党政群机关及事、企、事业单位，还要合并一些重叠的、性质相近的机构，尽量

减少层次。关于省级机构，省委意见：手工业局合并到轻工业厅，设手工业管理处；高教局并入教育厅；国防体协与体委合并；统计局改为二级局，属计委领导。省委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为宣传部；省委工业部与交通部合并为工交部。在这个文件中，省委还对地专、县、市级机构调整提出了具体意见。

为了全面掌握全省各级的精简情况，1958年2至3月省编委办公室组织力量，深入山区、丘陵和湖区，对专、县（市）各级紧缩机构及行政、事业、企业编制精简情况，对县以下事、企业部门设置和各级各类人员比例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指导全省精简工作。

专、县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工作于1958年2月左右才全面展开。1957年底和1958年初，各专、市一般都召开了县级组织部长会议，进行部署。同时，各县从组织、人事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了办公室，首先对本县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进行调查摸底，作出方案，既坚持精简原则，又防止盲目裁并机构和草率精简人员。县级从1956年以来，县人委普遍增设了计划科、统计科、税务科、手工业科等机构。1957年底对县人委的机构曾进行了裁并，但重点是财贸系统和文教系统。1958年初，根据中央和省的部署，为了减少层次，撤销农村区一级建制。这样县级机关工作任务相应增加，原来合并的机构1958年有的又作了调整，特别是农林水系统的机构设置比较细。但是，整个县级机构还是进行了缩减。如资兴县从分析工作任务入手，本着精简的精神，对县级机构进行了撤并，县直党政群机构由45个撤并为32个，精简28.8%；一级事、企业机构由20个精简为10个，精简50%。

省委《关于紧缩省、专（市）、县级机构的意见》发出后，地专一级行动也较快，成立了专门机构，除组织、指导县级的精简工作外，根据省委要求，对专署的机构也进行了紧

缩，撤并了一批地专直属机构和中层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层次，同时按省委规定的精简指标，精简了大批人员。

为了加强和改善对机构编制的管理，巩固精简成果，1958年5月29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了《湖南省机构编制管理试行办法》，对编制委员会的职责、任务、管理范围、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省建国以来第一个成文的编制法规性文件，它的产生和颁布，对当时紧缩编制，加强编制管理起了重要作用。

全省紧缩机构、精简编制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以邵阳专区为例，1956年末全区共有机构3838个，人员37087人（不含工人、营业员）。通过紧缩精简，全区共撤并机构944个，占24.38%，其中地专直属单位撤并的机构占41.67%，中层机构占42.29%。在人员编制方面，共精简9575人，占原来总人数的25.82%，其中党政群机关占23.47%。

从1957年春到1958年8月，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企业单位紧缩了一批机构，精简了30%左右的人员，共下放干部80481名。其中全省各级党政群机关减少25143人，又增加11765人，增减相抵实际精减13378人，占省委分配精减任务33201人的40.3%，成绩是肯定的。但是由于某些部门和地区对精简工作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紧，主管部门检查督促不严，有些部门或地区当时还没有完成精简任务，有的部门或单位虽已完成精简任务但潜力还较大，为此，1958年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再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精简机构工作的指示》。省委指出，“省、专、县、市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企业单位，应继续完成原分配的精简任务。对于已经完成精简任务的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摸底，挖掘潜力，继续进行精简。”省委根据经济体制和工作任务变化的情况，对全省财贸、工业系统的精简任务作了调整：全省财贸系统应再精简3万余人，可能还要多

一点：将工业系统原精简任务适当进行修改，暂定管理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12%，由应再精简11630人改为再精简6600人。省委强调，机构增设不宜过分强调上下对口，应因地因事制宜设置。一切机构变动应按照省委、省人委颁布的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履行报批手续，人员编制应贯彻“增事不增人或少增人”的精神。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增设，一般不应增加编制，在同级编制内调剂解决。

省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精简机构工作的指示下达后，全省各级积极行动，对原有精简方案进行修改、调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省委指示精神。1958年10月，省级机关在各部门自报机构编制精简方案的基础上，又编制了新的精简方案，并经省委审查同意，以省编委的名义公布实行。省级精简方案对省直各党政群工作部门总的人员编制、内部机构设置及其编制定员，直属事、企业单位、附属机构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这个方案还就各单位的行政服务人员及其行政服务人员中的勤杂等人员的配备比例，作了原则的规定。方案指出，各单位的行政服务人员（一般指秘书、资料、档案、收发、机要、文印、打字、总务及勤杂人员），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各单位应控制在总编制的20%左右，最多不超过25%，超过25%的单位应减少行政服务人员，增加业务人员；行政服务人员中的勤杂及其他人员（指公务员、通讯员、炊事员、电话员、传达员、司机、水电修理工及花工等），一般按单位新编制10：1（100人以下的单位）、12：1（100至200人的单位）、14：1（200人以上的单位）配备，其中炊事员应按新编制40：1配备。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予以调整。各专、县、市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也相应调整了精简方案，并逐渐付诸实施。

1958年，全国农村出现人民公社化高潮，到1958年11月，

全省由原有3169个乡镇组建为1232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企合一，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为一体，是包括工、农、商、学、兵各方面的综合性社会基层组织，开始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尝试。为此，县、乡两级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体制，机构编制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

两年来紧缩机构、精简编制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止1958年10月底止，全省精简91204人，占精简任务99714人的91.47%，占1956年末实有人数的27.52%。其中省级已精简11037人，超过精简任务30人，占1956年实有人数的51.14%。1958年12月底，全省国家机关行政编制定为103695名，其中省级4874名。

全省各级精简后，机构内部人员都有了较明确的分工，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有些单位虽然精减了不少人，但工作并没因此受到影响，相反，甚至还做得好些。各级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基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基层领导骨干缺乏的矛盾，同时也为国家财政节约了开支。撤并一些工作性质相近或重叠的机构，使机构设置趋向合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林业和森工过去分设，在森林砍伐上经常扯皮，合并以后统一了步调，平衡了计划，减少了矛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精简中省委、省人委颁发了我省第一个成文的机构编制管理办法，第一次正式用法规性的办法来管理机构编制，尽管这个办法还不够完善，实际执行情况也不很理想，但在我省编制管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历时两年的精简工作存在一些问题：紧缩机构编制只注重用行政手段，采用分配精简指标，分配精简数字的办法进行，没有从分析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性质、职能做起，撤并后单位之间的关系理顺得不够；对人员编制的确定也缺乏科学性，所谓“估计工作量”弹性太大。因此，有的机构合了又分，分

开不久又合；人员编制偏紧偏松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少单位感到人员太少，刚精简又要求增加编制，据当时对省直54个单位统计，有28个单位要求增加编制2000余人。

此外，有些单位对机构、编制由各级编委统一管理，“凡增设机构或增加人员都必须经过编委审批”这一规定认识不足，执行不严格，少数单位甚至乱开口子增加人员，造成新的超编。省级有个别单位内部虽然精简了层次，由三级改为二级制，但过后不久又恢复三级制；有的虽然未恢复三级制，但内部分组太多。各专、县对由地方和中央双重领导的机构并没有认真地管起来，致使这些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1962年至1963年“精简国家机关、 党派、人民团体”运动

我省通过1960年至1961年在省直机关进行的“紧缩机构，精简人员，保粮保钢，加强生产第一线”的精简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机构方面，省直机关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调整了一部分机构：撤销、合并了18个厅一级机构，181个二级机构（其中行政处室160个，事业机构21个）；人员编制方面，据1961年底统计，省直机关共精简4668人（不含学校、医院、下伸机构和生产工人），占1960年6月精简前实有人数的22.7%，占省委分配精简任务的87.4%。但是1960年至1961年的精简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①决心不够大，精简不彻底。省直机关虽精减少4668人，但同时又增加了1365人，增减相抵，实际上只精简了3303人，占精简前实有人数的16.1%。在机构设置方面，虽撤销合并了8个一级机构，同时又增设了5个。性质相近，机构重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全省物资管理，队伍相当庞大，除省物资局设

有6个专业公司，7个仓库，6个驻外办事处，共有职工1000多人外，还有14个厅局设有物资管理机构40个，共有职工761人。

②超编人员处理不够及时，措施不够有力。精简定编后，超编现象普遍存在。据省编委1961年12月对省直机关61个厅局的调查材料表明，截止1961年11月底，共超编1574名，占核定编制数的14.5%，其中工交战线超编最多，达1024名，而且还有546人单位未研究安排去向，措施不配套，进度慢。

总之，1960年至1961年省直机关虽进行了一次精简，但组织机构、人员编制仍相当庞大。省委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必须采取措施，大力进行精简。

一、精简的步骤方法及其原则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对各级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作出批示后，省委立即调整了工作部署，并着手准备精简方案。

1962年3月2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南局并中央报送我省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初步方案。

4月上旬，中南局召开中南五省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兵简政座谈会，会议对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兵简政两个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讨论，中南局组织部长李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这次精简的对象主要是：

- ①1958年以来新吸收的人员，以及未转正的雇佣、试用人员；
- ②非业务人员和服务人员；
- ③政治历史复杂或严重不纯的人员；
- ④部分老弱病残人员；
- ⑤不宜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人员；
- ⑥自愿回家生产的人员。

会议研究讨论了精简人员的出路：①凡有条件回乡生产的，尽量动员回到家乡参加生产；②有劳动条件，但无家可归或家在城市的，可以安排到农林牧场去生产；③抽调一部分人员

加强财贸战线的领导力量；④将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员列为编外，但要按中央规定精神执行，要严格审查，不能把难处理的人员都列为编外。

1962年4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通知，为了加强对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省精简领导小组，负责处理全省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机构的日常工作。省委精简小组由李瑞山、徐启文、郭森、纪照青等十二位同志组成，精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劳动局办公。精简干部的安置处理工作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局负责。

在精简中，为了稳定各级领导骨干的思想情绪，使精简和其他工作能顺利进行，省委于4月27日发出通知：鉴于各地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机构工作，为了有利于积累经验、改进工作，省委决定在这次精简中，地、市、县、区委和公社党委以及支部的主要骨干，一般不动。上级各部门精简下来的干部，应当安排适当工作，不要随便顶替下级的主要骨干。

5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继续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工作的指示》。文件指出，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精神，切实作好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克服当前困难最现实、最有效而且是带根本性的一项措施。文件还指出，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必须根据当前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进行，重点仍然是缩短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文教战线和精简国家机关与企、事业机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精简压缩的原则是，“各级国家机关、党群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机构，应力求减少层次，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精简多余职工，坚决克服人多政繁的现象，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文件强调，“对老弱病残人员一定要妥善处理、合理安排。其中合乎退休条件而又自愿退休

的，可以退休；农村有依靠，能回农村居住的也可动员回乡；有的可调作轻便工作，或参加本单位的农副业生产。”在方法步骤上，省委要求首先要逐级作好精简和调整的方案，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条条块块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对这次精简工作，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党组，下最大的决心，切实加强领导，确定专人抓精简，集中力量作为当前一项突出的中心任务抓紧进行。各级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要以主要精力协助党委完成这一任务。总之，决心要大，具体方案要细，行动要快，步子要稳，处理办法要落实，使精简工作能达到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和工作的目的。

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实际，1962年5月18日省委下达了《关于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这个方案对全省党政机关的编制定员、精简指标、机构设置提出具体的意见，并就精简中有关具体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此外，根据中央关于10万人口以下的不设市、改为镇的规定，我省将岳阳、娄底、冷水滩、冷水江、东江、安江等6个新建市的建制报请国务院批准予以撤销。

5月23日，省委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精简和调整干部工作的通知》，总结了前段精简工作情况，调整了全省精简工作部署。省委指出，鉴于目前农村工作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十分繁重，需要集中力量去抓，加上精简工作面广，情况复杂，因此，精简工作必须分期分批进行，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工矿企业单位的职工精简工作，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精简工作，到下半年再进行。省委还强调，调整各级骨干干部必须十分慎重，尽量缩小调整面。精简工作必须贯彻“决心大、步子稳、工作细、安置好”的原则。

1962年7月上旬，省委召开精简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62年以来全省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情况，着重研

完了调整顶替、安置巩固工作和进一步完成与超额完成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的任务等问题。省委书记李瑞山同志代表省委在会议上针对全省精简工作中一系列问题作了讲话。

这次精简运动，在方法上，省委强调思想发动，坚决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两头挤、三结合”的办法进行。即自上而下地分配任务，分战线包干负责；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一个一个机构，一个一个编制研究确定。所谓“三结合”，就是人、粮、工资三结合，粮食、供应、工资严格按照编制执行。同时，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

自省委5月18日精简方案下达后，各地（市）委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安排，各级国家机关都按照新的精简方案，进行机构调整和人员精简。工作进展较快的有常德、郴州地区和自治州各县以及沅陵、黔阳等县市。

但是，各地在精简过程中还碰到一些具体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是精简后干部、职工的安排问题，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为此，经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16次会议通过，国务院作出《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关于精减下来的职工（含干部）安置去向，主要应当安置到农村，并相应地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个《决定》下达后，各地反映，所作规定是适当的、可行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不能完全解决。为了妥善地安置和处理精简下来的干部，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27日又作了补充规定，关于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精简干部的安置处理办法主要有：

一、1958年以来，从农村吸收的新干部，应当尽可能动员他们回去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以来，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应当尽可能让他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当工人。

二、1957年底参加工作的干部，凡是本人保留干部身份，

不领工资、不办退职手续、回家参加劳动的，可以批准，并发给证明。上述干部5年以内，如果工作需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或者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批准，可以分配工作；要求退休的，可以批准。

三、合乎退休、退职条件的干部，应当按照退休、退职的规定处理。

四、现在工作上不需要，但是必须保留下来的干部，可以采用送高校学习、定期下放基层工作或者劳动锻炼的方法，储备一批，另列编制，保留原来的生活待遇。

五、按照1958年6月《中央关于安排一部分老干部担任各种荣誉职务的通知》的规定，挑选一批条件适合的干部，担任各种荣誉职务。

六、精简下来的干部，在等待处理期间，应当保留原来的生活待遇。已经作了适当的安排，经过说服动员仍不服从分配的，可以按照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的第十条处理办法，减发工资。

这些措施和原则，对于保证精简运动的顺利进行，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精简方案及其机构调整、编制定员

这次精简运动的任务，主要是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对各级党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精兵简政。根据现有材料，现着重分述各级党政群机关的精简方案及其机构调整、编制定员情况。

在这次精简运动中，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我省的精简方案是分几次提出并逐步完善的。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

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作出指示后，同年3月2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南局并中央报告，提出了我省精简的初步方案（湘发〔62〕142号）。这个方案是根据中央精简定编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通过调查摸底，并经省直单位及各地区研究讨论而提出的。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拟保留编制82576人（不包含1%的机动编制），比1960年精简前实有120734人需精简38158人，占31.6%；比1961年末实有125910人需精简43334人占34.4%。其中：

省级：拟保留编制5000人，比1960年精简前实有人数6664人减少1664人，占25%；比1961年末实有5665人精简665人，占11.7%。

专级：七个专区拟定编3500名（分为480名、500名、520名三等），比1960年精简前7850人（平均每个专区1121人）精简4350名，占55.4%；比1961年末实有人数7409人精简3909人，占52.7%。

市级：全省16个市，拟定共保留编制12510人，占市级总人口的3.6%，比1960年精简前16409人精简3899人，占23.8%；比1961年末实有15594人精简3084人，占20%。

县、公社两级：全省86个县、506个农村区、3395个农村公社、216个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拟共保留编制61566名，占农村总人口的1.84%。其中，县级25360人，平均295人；区级4048人，平均8人；公社级30862人，平均9人；镇级1296人，平均6人。县、区、社、镇共比1960年精简前实有89811人减少28245人，占31.4%；比1961年末实有人数减少35676人，占36.6%（其中县区两级精简42%，公社、镇级精简31%）。

关于机构的设置问题。总的原则是：对于任务重复，性质

相近的机构，应该坚决撤销和合并；可设可不设的机构，坚决不设。机构上下不一定对口。

省级：鉴于国家机关一级机构在1960年至1961年精简中已作了一次调整，撤销合并了一部分厅局单位，这次除个别调整外，拟不再作大的变动。

地专级：国家机关当时一般设有一级机构四、五十个，拟保留二十三、四个，即：地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交财贸部和监察委员会；群团拟保留团地工委，妇联、工会办事处；专署工作部门设：专署办公室、民政科、人事科、公安处、法院、检察院、计委会、工业科、交通科、财政税务局、粮食局、商业科、手工业科、农业科、林业科、文教科、卫生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可参照上述范围，根据工作需要，因地制宜设置机构。

县级：国家机关当时一般设有30多个机构，拟保留24个。即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部分县设统战部。群团机构设团县委、妇联会、工会、工商联。县人委工作部门，各地因地制宜设置，最多不得超过16个，一般设：人委办公室、民政科、人事科、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计委会、工业交通科、农业科、林业科、财政科、税务局、粮食科、商业科、手工业科、文教卫生科。

市的机构设置，一般可参照专县机构设置意见，根据城市工作的性质、市的规模及不同特点等因素设立不同机构。

各级编制委员会保留，下设办公室，与党委组织部合署办公。

各级所设临时机构一律撤销。

1962年4月2日至6日，中南局召开了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兵简政问题座谈会。会议要点如下：

一、关于精简指标问题。按各省所报的方案统计，全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精简179600多人，占1961年底实有人数602000余人的29.8%。精简后编制人数为422300人。其中，省（区）级平均精减17%，平均每省保留4800人；地专级平均精减41.1%，平均每专保留480人；市一级平均精简21.6%，今后新编制占城市人口总数的4.13%；县社一级平均精减31.37%，精减143900人，新编制占农村人口的1.95%。

二、关于机构设置问题。总的精神应按中央原则办事，从实际出发，长远考虑设置机构。任务可以归口，不完全强调机构上下对口，也不强求组织形式划一。具体原则是：①如撤并后不影响工作的机构应多撤并一些；②关于区的设置问题，中央指示是不设、少设。因此，设不设区，由各省决定，能少设就少设，能撤的就坚决撤；③县一级机构，中央已决定了，现已有二三十个，各省要严格控制，该撤的要坚决撤；④关于监察机构问题，已设的可以保留，没有设的一律不再新设。

中南局五省（区）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兵简政座谈会后，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南局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南各省国家机关精简问题的平衡意见及中央精简小组当时的指示精神，于1962年5月18日又提出了《关于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修正稿）》。

这个方案关于精简定编问题，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不含各级人民银行、建设银行、森工局、供销社、邮电局），根据中央精简定编意见，省级编制4500名；专级2800名，每个专区平均编制400名；县（区）社（镇）按农村总人口1.7%的比例编制，计57884名；市级：市区（包括近郊）平均按总人口的4%，远郊区按县比例定编，计10350名。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共应保留编制75534名（不含编制以外1%的机动人数），比1960年精简前实有人数116826人，精简41292人，占35%。比

1961年末124283人，精简48749人，占39%。其中省级1195人，占21%；专级4813人，占63%；县（区）社（镇）级39586人，占41%；市级3155人，占23%。

这个方案，县、社两级编制按照人口多少，采用分等级的办法核定。具体编制意见是：县级，甲等县（50万人口以上）配300人；乙等县（人口30万至50万）配250人；丙等县（30万人口以下）配200人。全省86个县，按照上述标准分为26个甲等县，24个乙等县，36个丙等县，每县平均编制244人；区一级平均8人；镇平均6人；公社平均9人。县（区）级共安排25172人，占县（区）社（镇）编制总数57884人的43%。

这个方案还规定，专、县两级党群部门编制，不得超过同级行政编制总数的30%。

此外，这个方案还提出了区、社两级人员具体分工的参考意见。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省级党政群机构在1961年精简调整的基础上，只个别加以调整，省委工业办、财贸办、政法办改为省人委的办事机构；恢复省人委文教办公室；省档案局与省档案馆筹备处合并，作为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处，对外保留名义；恢复省人事局；撤销省监察厅。地专级国家机关由当时的40至50个机构，拟精简为26至27个机构。县级国家机关由当时的30至40个机构，拟精简为24至25个。各市国家机关机构可参照专县机构设置。

各级编制委员会仍然保留，下设办公室，与党委组织部合署办公。

省、专、县、市国家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省级一般只设处（科）一级；专、市、县直属的工作部门，除少数任务特别繁重的以外，内部一律不另设机构。

根据上述方案，省委于同年7月发出通知，分别批复了省

委各部门、省人委各办公室等单位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省编委同年9月分别以战线为单位，批复了省直各厅、局的处室机构和人员编制。与此同时，根据省委的指示，省编制委员会还对省直企、事单位提出了精简意见，由主管部门提出具体精简方案报省委批准后实施。

随着精简运动的深入，各地原精简方案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编制方案参考或遵循。为此国务院编制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的精神，于1962年12月，分别拟定了《关于地方各级国家机关机构编制方案(草案)》、《关于地方各级党委编制方案(修改稿)》。这两个编制方案，详细而又具体地规定了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数额，规定了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领导职数。这两个方案的提出，对于全国党政机关机构编制方案的确定，起了规范化的作用。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上述两方案的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我省经过反复研究，第三次拟定了全省国家机关机构编制的调整方案，于1963年6月14日上报中南局精简小组并中央精简小组。这个调整方案与1962年5月18日省委下达的精简方案比较：

一、在人员编制方面：省级行政编制由4500名增至4700名；另外总工会、供销社、手工业联社等单位和粮食局企业部分的企事业编制约定为590人。两项合计拟定为5290人。省委会的编制，拟占省级行政编制总额的12%左右。专区级：9个专区（1962年底我省经中央批准又新设益阳、零陵两个专区），行政编制拟由2800名增至4150名，平均每个专区由400名增至461名；另加企事业编制924名，两项编制共拟定5074名。地委编制，拟占专区行政编制总额的26%左右。市级行政编

制没有增加，仍定为10350名，占各市固定人口（含近远郊区）的3.6%；另加企事业编制914名，两项共拟定11264名。根据市的规模，市委及市辖区委编制拟占该市编制总额的15至30%不等。县、区、社三级：平均按各县总人口的1.95%计算，由57884名增至66620名，其中社（镇）编制安排一半以上；县级另加企业事业编制7087名，两项编制共拟定73707名。县委的编制，一般占县级行政编制总额的27%左右。全省行政编制在定编人数以外，另保留1%的机动数，计858人；省配支农工作专用行政编制600人。这样，全省共计行政编制87278名，较中央原核定我省行政编制99935名（不含银行、武警编制）精简12657人，占12.6%。如果包括企事业编制9515人，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编制总额共定为96793名，较1961年末实有人数123465人，精简26672人，占21.6%。此外，中央指示我省配备的登记党员专业队临时编制2100名。

二、在机构设置方面：这个调整方案分别列出了省、专区、市、县各级党、政、群机构名称、机构总数额，与1962年5月的方案比较大体差不多，只是略有调整。

1963年9月19日，中央精简小组通知湖南省委，中央拟定湖南省各级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总额为84085名，其中：省级4150名；专州级3870名；市级10079名；县、区、社65153名；机动员额833名。

全省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总额的落实，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落实各专、县、市的编制，第二步是落实省直机关各厅局的编制。

一、专、县、市机构编制的核定。1963年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核定全省专、县、市国家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根据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编制平衡的意见和各地区1962年末的人口总数、行政单位多少、面积大小、人口密度、

月
一

1

三、对这次精简运动的基本估价

12-10-1964

1

的首要问题是稳定经济局势，以求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当时只有恢复50年代前期和中期所采用的，经过实践证明能够保证经济稳定的集中管理的办法。在这以后几年的实践表明，八字方针和这次精简的客观效果是好的。到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就已恢复和发展到相当水平，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项主要计划比例，已趋于平衡、合理，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经过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重大挫折，启示人们开始研究、探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标志是这次精简中开始触及党政分工和政企分工问题，虽然成效不大，但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省通过这次精简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取得的成绩。1962年至1963年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对全省各级国家机关进行了几次认真的精简，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统计，全省机关干部共精简28903人，占1961年末实有人数123633人的23.3%，占1957年精简前实有人数139445人的32.3%。同时，对各级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各级国家机关的行政编制共定为84385名（注：含中央定编后陆续追加的300名编制），即：省级4450名，专级3870名（平均每专430名），市级（包括郴州、津市、洪江）9565名，县、区、社、镇级66298名。

经过两年大幅度地精简机构编制，收到一定的效果：①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各了系统的基层，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直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或到大队、生产队当干部的有18000多人。此外，还层层下放了一批领导干部，加强了基层单位的领导。②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缓和了市场供求矛盾。按1963年调整后净减将近29000人计算，每年节省财政开支约2200万元，

减少统销粮1300万斤，变消费者为生产者。③改进了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机构重迭、人多政繁的现象，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机关出现了新气象。

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一是坚决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原则。在精简工作开始时，有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来越发展，工作越做越细，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员编制应该相应地增加；有的同志认为近几年来，机关年年精简，已经减得差不多了，没有油水了，再精简就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了。针对这些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反复进行了形势教育，大力宣传“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文件，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分析检查机构庞杂、人多政繁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与此同时，合理调整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典型示范。在精简工作开始之前，各级编委的干部，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部门的具体业务和任务，机构编制与工作任务是否相适应，人员编制使用是否合理，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是否对头，是否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有无潜力，有无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等情况，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机构编制的方案，交群众讨论，使方案更加落实，更加可靠。

三是坚持紧缩机构、精简人员与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结合起来，与反对机关“五多”结合起来，在精简运动中，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减少不必要的会议，严格控制文件表报，简化办事手续，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深入基层，从机关事务圈子中解放出来。

四是积极做好精简人员的安置处理工作。这次精简任务大，精减下来的人员多，对这些人员安置处理得好坏，影响极为重大，因此，精简中强调搞试点，强调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和组织工作。各级都成立了安置接待机构，都有专人负责，对精简回乡人员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和欢送。各级各部门领导亲自出面，做思想动员工作，本着善始善终、负责到底的精神，坚持“四不走”：思想不通不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不走，工作安排不好不走，安置不好不走。对精简下来的老弱病残人员，也妥善地进行了安置和处理。

二.存在的几个问题。

①精简没有从分解机构职能入手，精简后层次仍然太多，“五多”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克服。精简后，机构层次并没减少，“五多”现象仍然突出。以报表为例，据商业厅反映，仅财务会计一项，向中央商业部的报表就有电讯旬报、表式月报、季报、年报四种；表式多样，手续繁杂，据称季报数字就有7万余个，每次底表就有100张；县以上商业行政部门报一套，各专业公司又报一套，内容大致相同。由于表报多，任务大，专、县商业局都挤占企业编制。

②精简后增人之风又起。各级各部门的编制刚核定，有的部门又写报告要求增加人员编制。据不完全统计，省级机关当时就有12个单位要求增加编制共112人，其中行政编制80人，事业编制5人，企业编制27人。

③对编余的干部安置渠道不多，方法简单。这次精简，大批精减下来的干部虽作了安置和处理，但安置渠道少，主要是面向农村或基层，加上时间短，政策和措施不是很配套，方法较简单，干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干部的思想并没通，甚至成为以后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个方面。

1982年至1984年机构改革

1982年9月16日，省委常委确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机构改

革领导小组，正式开始了机构改革的工作。到1984年10月12日，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重新核定省直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的通知》，表明为省机构改革即告结束。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认真精简机构。通过改革，使各级机构精干，分工合理，职责分明，工作效率提高，消除机构臃肿、层次重迭、职责不清、人浮于事的弊病。

二、紧缩机关人员编制。在精简机构的基础上，核定各单位各部门的人员编制，实行岗位责任制。

三、从根本上改革干部制度。一方面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另一方面选贤任能，提拔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四、做好轮训干部的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政治、文化、业务素质。

五、为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摸索经验奠定基础。

步 骤 和 方 法

为了使机构改革能顺利进行，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各业务主管部门不要干预地方的机构编制工作；为了加强对地方改革的指导，1982年11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宋任穷同志牵头，成立了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分赴各地帮助指导机构改革工作。中央派驻湖南的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由原邮电部副部长刘雪初同志带队。

我省机构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安排的。

1982年9月16日晚，省委常委确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万达、纪照青、熊清泉三同志组成，正式开始了我省的机构改革工作。1983年1月30日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刘正、黄道奇同志，2月又增加了赵培义同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赵培义、任连荣、王宪甫等10人组成，赵培义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任连荣、王宪甫同志任副主任；后又增补了柏原、宋廷同同志为办公室副主任。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82年10月8日在蓉园5号楼正式开始办公。

1982年10月9日、11日，纪照青同志代表省委、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在省直各战线负责同志会议上作了关于我省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具体阐明了我省机构改革的任务、原则、要求、步骤与方法。

一、全省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①定机构。机构的设置应从工作需要出发，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基本适应，但不一定上下完全对口、对等，不一定同兄弟省市强求一律。要改进省委和省政府本身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要减少层次，减少头绪，使机关运转灵活。一级机构能办的事，不要层层设机构，一个机构能办的事，不要分设几个机构；小机构能办的事，不要设大机构；撤销属于中间层次的委办。要将政事、政企不分的机构逐步过渡为事业、企业单位，不再作为省委、省政府的职能工作部门。

省政府现有行政厅局单位61个，拟减少到40个以内，省委所属的一级机构拟保留14个；部、委、厅局内部的处室要精干，处室一般不设科。

②定班子。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关键，是配备建设好领导班子。要求经过改革，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要下降4至5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应占50%以上，每个

领导班子中一般都要有大专文化程度的领导成员。并具体规定了省直各厅局，地市党委、政府（行署）领导，省直厅、局内部处室和独立二级机构以及地市部、委、办正副职的职数。

③定精简比例。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任务，是坚决紧缩编制，具体落实中央规定行政机关精简1/3，党群系统精简1/5的任务。要求省直各厅局11月份拿出精简方案。

④安排好退居二、三线老干部。

⑤安排好干部轮训工作。

二、全省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根据中央部署和我省情况，全省机构改革总的安排是，1982年冬和1983年搞省直和地、市党政机关，1983年下半年搞县社两级。

省直和地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省委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开展省直部委办厅局的机构改革，在确定省直新机构领导班子人选时，同时搭好地、市党政领导班子。要求1983年春节前，基本结束。第二步，接着进行省直党政机构处室，二级单位和地、市党政机关的改革，争取1983年春耕大忙前基本搞完。这两步互相联系，不可截然分开。省直有条件的单位，经省委批准，也可将第一步、第二步的工作同时进行。

为使机构改革做到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采取的方法是：

①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省委确定先在省商业厅、供销社搞试点，先行一步，取得经验，逐步推开。

②上下结合，层层发动，广泛听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通过个别谈心，小型座谈、民意测验、党组织研究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最后由省委作出决定。

③充分相信和依靠老同志，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④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是整个机构改革的关键。新机构确定后，先要集中力量把配备领导班子这个中心环节抓好。

三.省直机关机构改革。

省委、省政府精心组织和指导了省直机关机构改革，对省直党政机关机构设置非常慎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斟酌、修改、完善方案。精简方案四易其稿，并分别于1982年11月、1983年1月和3月三次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83年4月17日发文通知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湖南所报机构改革方案。批准省委工作部门设7个，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设39个，同意省顾问委员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机关党委等组织机构，按照党章、宪法和有关规定设置；并核定省级党政群机关编制总额为5000人（不含公、检、法、司法行政机关的编制）。

省委、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5月14日转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湖南省直党政机关机构设置的通知，并征得中央同意，将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改为农村工作部、增设工交财贸政治工作部。省政府工作部门增设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与省经济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时，对未列入党政工作部门的原省直一级机构的机构级别、隶属关系及归并、撤销、改变机构性质等事宜，作了规定和说明。

省直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的核定，采取切块分配的办法进行。省直分为党群、政府、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几大块。根据各部门工作任务等情况，经过几上几下充分讨论、协商酝酿，省委常委于1984年9月5日下午讨论了省直党政群机关的定编方案。1984年10月12日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重新核定了省直党政群机关各部门的编制，坚持精兵简政的原则，规定了编制使用的范围，重申了编制管理工作的严肃性。

四.地、州、市机构改革。

地、州、市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是参照省直机关机构

改革的做法，在1983年春节后与省直二级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

根据省委部署，各地、州、市委均成立了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集中力量抓机构改革工作。同时，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也向各地州市派驻了机构改革工作组，加强指导，协助地州市委抓机构改革工作。各地州市经过反复协商，充分酝酿，陆续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领导班子名单，经省委、省政府同意，从1983年5月起至9月，省委办公厅陆续发文，分别批复了各地州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省委组织部也分别发文批复了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1983年9月省委组织部、省编制委员会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报告了《关于湖南省地州市党政机关机构精简情况和人员编制总额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关于机构设置，省辖市机构，原五个省辖市党政群机构平均设65个（最多的66个，最少的63个），经过改革，六个省辖市（含国务院新批的岳阳市）平均设59个，其中市委工作部门7个，政府工作部门38个（最多的长沙市40个），其他按党章、宪法和有关规定设置的机构14个。地区机构，原8个地区党政群机构平均设57个（最多60个，最少53个），经过改革，平均设41个，其中地委工作机构7个，行署工作机构24个（原42个，减少18个），其他按党章、宪法和有关规定设置的10个。自治州机构，改革前党政群工作机构60个，经过改革设52个。关于人员编制，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地州市（包括10个县级市）共拟定编制30438名。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我省地州市党政群机关（不包括公、检、法、司行政机关）编制总额定为29277名。

有关各地州市党政群机关编制总额的核定，省编委经过反复与各地协商，草拟了初步分配方案，并经省委常委原则同意。于1984年1月在益阳地区召开全省各地州市编委专题副主任会

议（部分地市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与各地再次进行了协商，修改了方案。会后分别向各地州市发文下达。

五、县级机构改革。

在省、地两级机构改革基本告一段落后，1983年10月省委发出《关于县（市）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知。省委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全面部署了县级机构改革的工作。对县（市）党政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作了具体的规定，对县（市）领导班子的配备，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审批机构改革方案的权限上，省委确定，各县（市）党政机关机构精简方案，委托各（州）市委审批，报省委备案；领导班子配备，除县委书记和县长报省委审批外，其他成员按审批权限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审批。在时间安排上，省委要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在12月份基本配备好，整个县（市）级机构改革工作争取在1984年春节前搞完。

为了推动全省县级机构改革，1983年9月由省委组织部、省编制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批复了县级机构改革中先行一步的衡山县机构改革方案，以此指导整个面上的工作。

1984年1月9日，省编委向劳动人事部报送了《关于湖南省县级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总额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我省县级党政群机关1982年实有人员63802人，根据中央有关要求和我省具体情况，请求按实有人数精简15至17%，计减少9570至10343人，编制总数定为52956至54232人，平均每县减少109至123人。

1984年5月，国务院下文核定湖南省县级党政群机关编制总额为52956人。

我省县级编制的分配。省编委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全省各县的人口、面积、产值等不同情况，综合诸因素计算出各县的编制总额，并在1984年7月全省编制工作会议上与各地（州）

市讨论研究，协商平衡，取得一致的意见，拟制了全省县级党政机关编制分配的方案，报送省人民政府审定。省人民政府同意省编委的方案，于1981年8月20日批转省编委《关于全省县级党政群机关编制分配方案的报告》，要求各行政公署，各州市、县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省政府还重申各级党政群机关的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控制，一律不能随意突破。

六、乡镇改革。

1984年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湘发〔1984〕5号），详细部署了全省乡镇改革的工作。《通知》提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是当前农村一项重大的改革，一定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有领导地进行。要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坚持群众路线，确定好乡和村的规模；要贯彻精简原则，乡一级不增加国家行政编制。《通知》指出，我省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不大，经过20多年的建设，大体上已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次改革中原则上实行以社建乡，以大队建村，以生产队或联队建立村民小组，一般不要改变现有行政区划。有些公社所在地设有公社一级镇的，可以采取乡镇合一，乡改为镇，由镇管村，以利于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通知》还明确了乡、村党政组织的职能；按照领导班子的“四化”要求，提出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知识结构和乡级党政组织的分工意见，并要求全省建立乡财税所，改革经济体制。全省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省委、省政府要求在1984年春插之后和双抢之后两批搞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提前进行。到1984年底，全省大部分已经搞完。1985年3月，全省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86年12月联合发出通知，根据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区、乡、镇党政机关人员编制标准，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与各地反复研究，全省平均按农村人口的1.5%重新核定。全省区、乡、镇编制分配，不但考虑人口密度，同时还考虑了乡、镇建制的因素。区、乡、镇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的使用范围，除按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外，我省还包括由事业费开支的计划生育员，区、乡、镇党政机关招聘人员以及离职带薪学习的人员。

主 要 成 绩

1982年至1984年这次机构改革运动，历时两年有余，规模大、涉及面广，影响比较深远。

我省的机构改革，具体说来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绩：

一、选贤任能，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这次机构改革，最大的成果是调整后的省、地、州、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在实现精干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省级党政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后，省委常委成员由原来的20人减少到11人；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9.1岁降到58.3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15%提高到55%。副省长由原来的9人减少到5人；平均年龄为62.8岁降到53.4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22%提高到40%。省直部、委、办和政府各厅局的领导班子在上述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十五个地、州、市党政领导班子的人数，由原来的313人减为229人，减少26.9%。

二、在初步划清部门及其所属机构职权范围的基础上，省、地、州、市、县的党政机构也有所精简。在机构改革中，撤

并了一些重叠机构，加强了综合协调、统计监督、立法执法部门。

省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由61个减为40个；省直机关处室据65个单位统计，精简了11.5%。

地、州、市党政机构由平均53个减为46个；县市党政机构由平均55个减为42个。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党政群机关也紧缩了人员编制。省级机关，中央核定为5000名，比1982年末实有7022人，减少28.8%；地、州、市、县的党政群机关，也不同程度地紧缩了人员编制。

三、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机构改革中，一大批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较大贡献的老同志，高瞻远瞩、着眼大局，权衡利弊，把位子让给了年轻同志；他们分别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并且自觉地热情扶持在资望和能力上不如自己的年轻同志。据有关方面统计，1982年到1984年三年间，我省仅离休的同志就有22931人，其中省级和享受省级待遇的18人，厅级和享受厅级待遇的1934人；处级和享受处级待遇的7253人；处级以上干部13726人。从这次开始，使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制度化。

四、轮训了大批干部，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轮训干部，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设。从机构改革一开始，我省就多渠道地分期分批轮训了大批在职干部。这些同志一般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但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的文化、业务训练。因此只要有学习机会，各级组织都为他们创造条件，以增强这些同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我省从1982年至1984年三年时间，先后采取各种形式轮训干部331541名，其中长期轮训（即学历教育）的54225名（不含教师轮训

和补习初、高中文化班），短期轮训277689名。通过轮训，大大提高了全省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

抗日名将向敏思将军

叶 星*

国民党第十五兵团第一一〇军中将军长向敏思，字利锋，土家族，1907年1月19日出生于湖南永顺县王村那丘。幼年就读私塾，及冠转读于长沙兑泽中学。其时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军阀连年内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将军自幼崇拜岳飞，受精忠报国思想影响，立志报国。于1925年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先后参加东征及北伐战争，历任排连营长。

我和将军从1937年淞沪抗战后期起，至1949年12月在成都郫县起义止，同在一起，经历各次重大战役。谨将亲历作战经过，就记忆所及，陈述如下：

喋血淞沪

“七七”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时，将军任九十八师副团长。到上海作战后不久，九十八师扩充为七十九军，向敏思升任五八八团上校团长，驻防武汉硃口营房。在“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声中，加紧训练部队。8月11日，九十八师船运至南京，原定担任首都警卫。“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打响后，于15日到达上海南翔。沿途深受群众热烈欢迎。鲜花慰问物品，各车站码头堆积如山。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手持彩旗，

*叶星曾任一一〇军政工处处长，系向敏思旧部。

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呀！杀呀”的雄壮歌曲，开赴战场。官兵们人人斗志昂扬，满怀民族的深仇大恨，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进入罗店月浦、宝山、蕴藻浜等阵地。向敏思团第一营守蕴藻浜紫竹林，第二营守备狮子林。五八三团第三营姚子青（黄埔六期，广东平远县人）守备宝山县城。姚营和五八八团阵地连结，临时由向敏思指挥。部署初定，向敏思亲到姚营视察，指示加强构筑工事，并对姚营长说：“宝山是我军右翼要点，如宝山不守，长江从江阴以东，就完全敞开了。敌人就可溯江而上，迂迴到我左后方登陆，包围我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敌人绕过宝山，在浏河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背。所以我们必须发扬撼山易，撼九十八师难的英雄精神，守住宝山”。姚营长保证：“誓与阵地共存亡，固守城垣，一息尚存，战斗到底。”至8月底，日军在淞沪战场攻击受挫，从国内增调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到上海作战，并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9月1日，日军千余人进攻狮子林，守军整天与敌人拼杀，伤亡重大。向敏思即令第三营前往增援，白天受敌机及舰炮轰击受阻，未及赶到，狮子林失守。

狮子林失守后，敌机及海军舰炮，不断对宝山进行轰击。日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向宝山城外阵地进攻，每次都被打退。9月5日拂晓，敌机多架配合海军舰炮，对宝山县城不断狂轰滥炸达两小时。日军两千多人在战车掩护下，四面包围县城，城内多处中弹起火，与外界联络全被切断。城垣多处被轰塌，日军源源不断冲进城内。姚营长率领残余官兵与敌逐巷逐屋肉搏苦战，毙伤敌人无数。坚持至6日晨，终因敌多我少，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全营官兵六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首开淞沪战场英勇抗敌的光辉史篇。消息传出，中外震惊，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国民党中央常委监委为表

彰姚营死难官兵，于9月10日通令全国：“宝山之战，姚子青营全体官兵与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并将宝山县命名为“子青县”。

宝山失守以后，敌机及舰艇上的大炮，对我军阵地采取卷地毯式的密集轰击。而后战车掩护步兵向月浦、蕴藻浜、紫竹林等阵地猛攻。反复争夺，累失累得。战斗之激烈，双方死伤之重大，实属惊人！白昼敌高空侦察气球对我阵地严密监视，一有动静，便指示大炮轰击。因此，我炊事人员白天无法送水送饭，只有在夜幕掩护下送水送饭到阵地。所以每天只能吃上一餐饭。疲劳与饥饿，严重影响官兵体质。向敏思携带后方送来的慰问品、慰问信，亲到第一线战壕视察慰问，并用顺口溜鼓舞官兵们说：“九十八师英雄汉，捆紧肚皮照样干。血战淞沪保上海，杀敌报国保民安。”战士们听了自豪地笑了，精神为之振奋，并高呼：“一日一餐吃得饱，保卫祖国，保卫上海！”群情激奋，呼声响彻阵地夜空。

日以继夜，浴血苦战。阵地工事被炸塌，打退敌人后，夜晚又修复。官兵不断死伤，后方多次整排整连的补充。有些士兵夜晚补充上阵，第二天就战死！真是用血肉之躯凝铸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都被我们打死在阵前。

罗店、大场久攻不下，敌从9月下旬起，又增调三个师团到上海，以百倍的疯狂猛攻我阵地罗店、蕴藻浜。五八三团团长路景荣在罗店争夺战中阵亡，向敏思在蕴藻浜争夺战中负伤。当此关系到整个战线安危时刻，向敏思带伤指挥残余官兵，满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趁敌人立脚未稳，在幕下扑向敌阵，拼死冲杀，夺回蕴藻浜阵地。营长黄梁（湖南永州人，黄埔六期，后升任一一九师师长，现任永州市政协委员）在阵地战中冲杀在前，身负重伤。连排长以下死伤三分之二以上。这场可歌可泣的守备战，坚持至11月12日，终因敌在杭州湾金山大

量登陆，迂迴我右侧背，我部才被迫退出战场。

经过90个日日夜夜，在淞沪这块三角地带，敌人最初只有6000多人，经过三次大增援，最后达20多万人。并以死伤4万多人的代价（这是敌陆军省1937年11月初公布的，实际不少于5万多人）侵占了这块用血洗过的土地！我军伤亡虽大，却打破了敌人整个战略计划，彻底粉碎了三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从而鼓舞了全国军民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勇气，掩护了沿江工业内迁，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挺进敌后

淞沪战后，九十八师集结于浙江临安，正式成立七十九军。由原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升任中将军长（湖南桃江县人，黄埔一期，现居住台北）。辖九十八、七十六、一一八等三个师。向敏思伤愈后调任七十六师副旅长兼四五一团团长。其时日军侵占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以后，即以第三、第九、第十三等三个师团先后渡过长江，向北侵占定远、怀远、蚌埠、淮河以南地区，企图配合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1938年春，七十六师推进至皖南宁国，对宣城、芜湖方向之敌警戒。牵制日军北调。向敏思率四五一团经广德进出于苏南敌占区。5月间到达溧阳以西上沛埠。我和便衣人员先一天到达。群众告知小股日军在汉奸带领下，经常外出抢粮抓伏，奸淫烧杀，民愤极大。向敏思指派第九连连长杨景之（四川井研人）在上沛埠以东设伏，打死日军10余人，缴获三八步枪5支。为了避免日军注意，打出江南第一挺进梯队名义，布告安民。沿途收容男女青年20余人，编成战地服务队。其中如流亡教师史之达，日本留学回国青年杨浩生，以后都成长为部队骨干。杨浩生在对敌宣传，审讯战俘，翻译缴获日军文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

部队夜行昼宿，从南京东南句容县天王寺附近，分路越过京杭公路，从大茅山经延陵到珥陵、皇塘一带，发动群众，组织舟船，傍晚渡过运河，破坏丹阳至常州奔牛之间京沪铁路路基多段。敌人发现后多路分兵合围，拦击我军，在河网地区与敌激战两天，打沉敌汽艇多艘，奉命撤除敌后。在大茅山曾与新四军陈毅师长会晤，提出相互配合，对日作战。7月底回到宁国梅林整补。

此次深入敌后，不仅是对敌人的打击，也是对敌占区群众进行长期抗战的宣传，并惩办了汉奸。这对部队新进官兵，是一次实战演练。官兵亲见敌人“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的残酷罪行，从而激发了民族仇恨，提高了爱国思想。8月，向敏思调升十八军十四师少将旅长。

1938年冬，国军撤销旅的编制。向敏思调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中队长（蒋介石兼主任，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他和叶剑英率领的中共政治军事教官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等20多人，共同培训抗日游击干部。这个训练班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举办的。在此期间，向敏思与中共干部朝夕相处，聆听叶剑英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的论述，从理论和认识上都有提高。对中共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深为钦佩。为以后投向人民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9年春，游干班结束。向敏思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任命为第九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指派到南昌以北的梅岭山区，将在南昌战役中滞留于敌后的失散官兵收编为游击部队。4月，在湘潭组成司令部，以赵家骧（四川宜宾人）为参谋长，杨文焕为参谋兼副官（云南云县人，后升任团长，现任

云县政协委员），我任译电员兼军需，携无线电台一部，经萍乡从奉新插入梅岭。当时司令部全无武装，向敏思以其机智勇敢亲率司令部人员，利用雨夜，涉水绕过敌人哨所，于黎明前到达。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联络，将遗留的官兵160多人，其中有鄱阳湖西岸吴城镇的守备野炮6门，骡马50多匹，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按各原有单位，编成5个大队。因梅岭地区狭小，不便开展工作，奉命将所有人员武器各归原单位。6月交清任务后回到湘潭。向敏思被任命为潭株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夏楚中兼任司令）。

长沙歼敌

1940年秋，向敏思升任七十九军九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冬，部队在鄂西咸丰整训，为培养基层骨干，他把各连年轻有文化的士兵择优成立军士大队，自任大队长。经过半年严格训练，于1941年6月在湖南澧县结业，分发各连充任班长。

1941年9月，日军在岳阳附近集结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等师团，配合飞机近百架，海军舰艇20多艘，总计约12万人，由第十一军团司令阿南惟畿指挥，发动对长沙第二次进攻（第一次战役是1939年10月，向敏思代理潭株警备司令未参加），9月17日强渡新墙河，20日分别渡过汨罗江，分三路攻抵长沙外围。其时，九十八师在常德市附近驻防。长沙告急，奉命昼夜兼程驰援。9月26日到达长沙东北，占领新河街杨家山阵地。正在构筑工事，石子铺警戒营被优势日军压迫，激战至晚，转至土桥迎击日军。日主力从我右翼迂迴，窜入长沙。师长王甲本（云南富源人，云南讲武堂陆大将官班毕业。1944年8月在衡阳对日作战时阵亡）当机立断，留置二九四团在原阵地，~~连夜率主力~~向高沙坪望仙桥迎击后续日军。27日凌晨在三

窑堂、白茅铺间与敌早渊联队遭遇。二九二团抢占有利地形，与敌开展激战。天明敌机多架盘旋轰炸，配合四十师团向我猛攻。激战至30日，奉命留二九三团与突入长沙之敌对战，师主力向捞刀河以北霞凝港、罗汉庄之线侧击日军。是日，我七十九军暂六师师长赵季平（湖南桃源人）率师赶到，从桔子洲头猴子石强渡湘江，配合友军暂二师，协同我在城内奋力抵抗之二九三团，内外夹击，于30日夜将侵入长沙之敌赶出。这时，敌受我外围各路友军分割包围，伤亡重大，补给被切断，粮弹将尽，士气低落。于10月1日开始突围撤退。师长洞察敌情，主动果断地向牛头咀之敌侧击，不使逃跑。逼使担任后卫之敌四十师团主力回师冲击我师，以便掩护其他部队脱逃。敌机终日低飞轰炸扫射，我师无线电台、骡马行李等被炸。官兵多人被炸死。师指挥所被迫退至霞凝港。敌企图压迫我于湘江消灭之，我则背水苦战。师搜索连占领鹤羊山，誓死扼守，敌累次凶猛进攻，均未得逞。连长余应勇战死，继任张连长、吴排长等在争夺山头中光荣牺牲。山上弹痕累累，血肉横飞，最后山上仅存排长郑昌言等15名战士，仍巍然不动，使敌无法前进一步（郑昌言现任浙江省参事室参事）。是夜，副师长向敏思为打破被困危局，率搜索连第六班欧阳班长等10名战士，冲过石子铺敌集结点，与湘阴之友军九十九师取得联系，通报当面敌情，协同向北撤退日军截击，断其退路。并督率部队从背后猛攻敌人，打死敌一一六连队第一大队少佐大队长川崎进，第二大队长横泽三郎等。这时，我师官兵在师长王老虎（重庆报纸喻其作战英勇）率领下，横冲直闯，越战越勇，总计毙伤敌3000多人，俘获甚多，一直追到青山铺附近，奉命结束战斗。收集阵亡官兵尸体，埋葬于平江天岳关烈士陵园。同时亦将敌遗弃死尸及骡马等埋于一坑，立碑“倭寇万人坑”。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七十九军这支由陈诚、罗卓英培

植，转战于三、六、九战区，作战比较英勇的队伍，被选为随罗卓英出国入越作战六个军之一。

当时，我沿海港口全被日军占领封锁，外援物资不能从海路输入，中国统帅部认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已战败并被希特勒占领。于是计划以六个军占领越南后，再由东向西进攻，要求英国从缅甸出兵由西向东夹击，占领整个中南半岛，利用越泰緬的海口，为我输送外援物资。因此，七十九军所属九十八师等在1941年11月从株洲上火车，经衡阳、柳州到广西河池金城江集结。当时英国正陷于与希特勒苦战中，无力东顾，反对中国东西夹攻计划，所有准备入越作战部队，均在原地待命。

12月8日，日本侵略者先发制人，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英国要求中国出兵救援香港。七十九军各师又从广西坐火车东返衡阳，准备南救香港。部队到衡阳时，香港英军已投降，于是在衡阳待命。湘北日军为牵制第九战区部队南援广九，敌十一军团纠集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并从华北调来第九独立旅团，约10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第九战区鉴于第一、二两次战役经验，采取在新墙河、汨罗江之间逐次抵抗，消耗迟滞日军，诱敌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聚歼之。在长沙市区由第十军凭坚强工事在岳麓山上重炮配合下固守。

12月26日，敌渡过新墙河，30日进抵长沙外围，我七十九军东运至株洲，九十八师连夜推进至浏阳河，并在草尾冲、柞间桥之线构筑阵地。1942年元旦，敌在飞机掩护下向长沙发起猛攻。守城部队在岳麓山重炮配合下，与敌展开厮杀。经过四昼夜激战，敌未得手。这时，我合围部队对敌进逼，切断其补给线，敌靠飞机投送粮弹，处境已十分危险。4日晚敌开始撤退。我九十八师已渡过浏阳河，攻抵侯家冲梨市之线。二九二团一部在浏阳河东山镇渡口堵击日军。敌多次强渡均未成功。战斗之激烈，两岸竹林，都被枪弹射击打断。5日，敌

机多架掩护渡过浏阳河，敌集于曹家坪、梨梨市之间。我师誓对梨梨市之敌猛攻。敌凭街房顽强抵抗，二九二团团长詹扬清指挥攻击时负伤，副团长王卓如（湖南祁阳人，黄埔六期，现住香港）代团长继续指挥攻击，又负重伤。入夜敌逃脱。我死亡官兵300多人，敌在东山渡口遗留尸体将近百具。梨梨市敌留尸体比比皆是。至15日，突围残敌逃过新墙河。

1月8日，九十八师在东山开会悼念阵亡将士。重庆中外记者30多人，乘专机到衡阳，赶来东山采访，拍摄战利品及遗留敌尸照片。

这次战役开始，向敏思指示政工人员分两部分开展工作，一部分配合各团政工人员发动民工，征集材料，协助部队构筑工事，一部分配合师野战医院抢救伤员。我在师政治部任科长，负责建立伤兵转运站，每站常备担架10副及茶水米粥等。伤兵在野战医院包扎后，一站抬送一站，尽快送到后方兵站医院治疗。回程运粮弹支前，沿途秩序井然，受到各方表扬。

两次长沙会战，敌人都以失败告终，伤亡近5万人，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我国军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泰晤士报亦称：“盟军胜利，全靠华军英勇善战。”

转战赣鄂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我军即在东山补充训练。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调升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升任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向敏思接长九十八师。原二九二团团长朱济猛升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向敏思针对晋升和新进的军官多，实战经验少的情况，在龙头铺调集营连排长集训。贯彻“忠党爱国，勇敢杀敌，勤练杀敌本领，实实在在做人做事”

的“忠勇勤实”四字军训。大讲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侵略，企图灭亡我国的罪行，激发军官们爱国家，立壮志，为民族雪耻报仇的责任感。结合我军从抗战以来英雄人物事迹，树立军官们的自豪感。时间虽短，收效较好。

当时补充的新兵，由于各接兵部队层层扣克，吃不饱，疾病多。向敏思严令医务人员优先为新兵治病，并改善伙食，责令政工人员为病兵拆洗棉衣，灭虱，代写家信，教唱歌曲等文体活动，尽快增强士兵体质，然后加强训练。四个月后，部队战斗力有所提高。

1942年4月18日，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回飞降落在浙江衢州我机场。敌上海第十三军团、武汉第十一军团，受命以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夹攻第三战区浙赣路，目的在于破坏沿线我空军基地。七十九军奉命东援浙赣路作战。九十八师于5月中旬从东山出发，经浏阳、万载在清江县附近渡过赣江。敌飞机沿途不断袭扰，迟滞我东进。7月初到达上屯渡以西。抚河涨水，向敏思命二九四团杨钧亚团长率部轻装渡河，敌已先我侵占抚州。杨团向抚州攻击前进，在城南激战。金溪之敌窜攻南城，九十八师奉命留杨团于原地，师率主力经一夜急进，先敌抢占南城，拒敌南进。相持约一个月，敌退。九十八师在崇仁附近休息。酷暑行军作战，痢疾、疟疾在官兵中流传。当时缺少医药，向敏思命政治部一个懂中医的科员，用中草药为官兵治病。11月开回湖南，在醴陵附近补充训练。

1943年5月，宜昌之敌沿江西攻，陪都重庆震动。七十九军奉命西援六战区。九十八师经常德出渔阳关在聂家河以西向敌攻击。敌攻石牌要塞不下，侧后向我袭击，5月下旬开始撤退。向敏思率部在肖家岩利用高山地形，堵住日军后撤部队，进行围歼。激战两天，敌无法突围，第三天先撤退过江日军，

在宜都回渡江南，在飞机掩护下向聂家河东岸七十九军军部攻击，救出肖家岩被围之敌。九十八师跟追敌至湖北公安虎渡河，与敌夹河对峙。10月，敌从洞庭湖西岸发起对常德进攻，九十八师在河街市、刘家坊、王家厂等地逐次抵抗，消耗迟滞日军。11月，敌在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围击中撤退。

常德会战结束后，九十八师在石门、新安附近整训，向敏思带领部分团营级军官到桂林军委东南干训团参加美式新武器培训，为接受美式新装备做好准备。

血战衡桂

1944年，已进入抗战后期。日军在南太平洋遭到美军重大打击，损失惨重。散驻南太平洋各地的数十万日军，海路被截，补给困难，企图打通陆上通路，收缩战线，作垂死挣扎。

5月，日侵华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在武汉设立指挥所，亲自指挥对长沙、衡阳的进攻。集结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为一、二两线。第一线五个师团，作为主攻部队；第二线三个师团，作为后备决战部队；另以二一六联队乘舰艇溯湘江两面策应。

这次敌人鉴于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教训，改变部署，湘江两岸配合两个师团，先攻占沅江、益阳、宁乡，东岸六个师团，后攻占平江、浏阳、株洲，完成对长沙的包围，再攻岳麓山，长沙守城部队第四军于6月16日突围，长沙失守。敌从新墙河到侵占长沙，根本未受打击，乃乘胜南下，企图一举攻占衡阳。衡阳为粤汉、湘桂铁路交汇点，是连接东南各省的中心，有前进的空军基地，又是连接东南各战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命令第十军方先觉军长率四个师死守。6月，我七十九军奉命急援长衡。九十八师从湘西石门出发，昼夜兼程，经常德、桃江到宁乡时，友军七十四军五十八师指挥一

个团被日军围困在城内东南角，无法突围。向敏思命令二九二团团长詹杨清（湖南益阳人，黄埔六期，后升五十八师副师长，现住台北经商）晚上攻城。第二天拂晓，第一营营长米典初攻占城东门泔水大桥，解围完成后，继续南进。曾先后在潭市、虞塘、永丰等地阻击日军。6月底到达衡阳以西金兰寺集结。

6月26日，敌攻占衡阳飞机场，六十八师团从衡阳南面渡过湘江，从西南方向包围衡阳。敌一一六师团从西北面包围衡阳，发起进攻。九十八师即向衡阳西郊推进，配合守城部队，打退西北方向进攻之敌。敌累攻累受挫，至7月2日暂停进攻。至11日经补充增援后，在飞机掩护配合下，分兵一面攻城，一面向我师攻击，企图压迫我师后撤。向敏思识破敌人意图，亲至第一线督战，死不退让。坚持至8月2日，敌虽攻占外围据点，缩小了包围圈，但仍久攻不下。敌第十一军团司令横山勇亲到衡阳指挥。于8月4日又发起第三次总攻，并命令第十三师团从正面渡江强攻，均未打退，伤亡重大。敌第二线决战兵团五十八师团从西北角突击。这样，我与敌阵地已很难明显划分，形成犬牙交错胶着状态。敌一个运输队，运送粮弹，误入我阵地被截，生俘班长等多人。敌飞机空投粮弹，有一部分误投在我阵地上。我各团检获降落伞130多个及全部物资。敌后续决战部队不断增援，我师及守城部队越战越少，未得一兵补充。师长向敏思决定每团抽调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由富有作战经验、机智勇敢的营长胡桂卿、徐志鳌（江苏宜兴市人，后升任一一〇军副参谋长，现任宜兴市政协委员。）等率领，轻装插入敌阵，猛冲猛打，扰乱敌人。一队曾攻入二塘，和守城部队取得联系。在突击中救出美军战斗机跳伞驾驶员1人。

敌久攻不下。其四十师团从湘乡南下，从衡阳以西包围我师，九十八师处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状态。8月7日，敌对衡阳总攻击，8日晨，守军经过40多个苦战的日日夜夜，粮尽弹

绝，无力再守，衡阳终于失守。

衡阳失守后，敌经过补充，沿湘桂路向我七十九军全力进攻。至9月初，我军在冷水滩附近布防，阻击敌攻击桂林。此时，九十八师侧击黄羊司、芦洪市之敌。根据日军动态，向敏思断定日军在正面是佯攻，主力迂迴我后方，立即电请上级改变部署。终因决策者刚愎自用，未予采纳，使部队再受重大损失，仅九十八师就伤亡团长、副团长3人，副营长8人，连排长30多人。9月6日，敌主力迂迴至东安及新宁清江桥，并向黄沙河急进。七十九军完全处于包围之中，奉命向武冈转进。军长王甲本在突围时与敌伏兵激战，在山口铺附近战死。9月11日，九十八师二九三团团长马登云突围清江桥，被先期占领之敌伏击，在力冲杀中阵亡。向敏思此时尚在敌人包围中，闻讯后，收容散失官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后撤路线，反向敌后转移，率残部从邵阳以南突出包围，安全到达武冈。

在武冈稍事休整，并未得到补充，新任军长方靖（上海人，黄埔三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居住北京）尚未到职，又奉命开赴桂林作战。向敏思不顾艰难，率九十八师为军先头部队，翻过湘桂边境越城岭，经城步龙胜于10月初到达桂林。参谋总长白崇禧从重庆飞到桂林，对官兵进行慰勉。部队即到上高田、海洋坪一线进入阵地，拒敌前后。这时，灵田墟友军告急，向敏思奉命派二九三团前往解围，于下午3时赶到。团长黄梁与团附徐志鳌立即前往守军阵地了解战况，遇守军师长等从山上退下，告知敌已攻占高地。黄团长表示被占之山头，今晚由本团夺回，请坚守现在阵地勿退。即令二、三两营在山下开阔地带构筑工事，阻敌下山。入夜，命令第三营为主攻部队，趁敌立脚未稳，进行夜袭。严定不准打枪，摸进敌阵后以手榴弹歼敌。半夜，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夜空。拂晓夺回被占高地，原守军师长赞扬九十八师部队勇敢善

战。

10月17日，敌开始全线进攻，至30日外围部队退守桂林。这时九十八师所剩不多，全师编成一个团，由二九四团团长王卓如率领，死守隘字山致和村阵地，凭岩洞死守。从11月4日起，敌累攻不下，即用火焰喷射器向岩洞喷火，官兵多被烧死烧伤。至11日，守城部队突围，我二九四团与外界隔绝，团长王卓如负重伤，被困在岩洞内，向敏思亲率师部搜索连及警卫连前去解救，继续战斗至12日夜才突出重围。

九十八师从淞沪抗战到现在，已有7年半，转战于三、六、九各战区，驰骋于苏皖赣湘鄂桂六省，从未得到很好的补充训练。至此，全师仅剩2000多人，已无力再战，奉命开赴湖南通道县集结，于1945年1月沿川湘公路徒步入川，至5月初到达乐山，接编第三十二补充处。

乐山整训

部队入川前，向敏思觉察到长期在前方打仗，纪律松弛，这次到大后方，应从整肃军纪着手。因此，重申本军的十大纪律。十大纪律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偿，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不准强拉民伕，不准调戏妇女。并要政工人员协同副官搞好前站工作，每到宿营地组织供应烧柴禾草副食品等。并公告商定价格，公买公卖。组成纠察队，检查宿营地有无违纪和损坏等情况，适当赔退。殿后收容落伍士兵。向敏思本人有时先部队出发，中途停下观察军容；有时后部队出发，和纠察队一起检查军纪，千里行军，所过城场、集镇都能照常赶场做买卖，减少了对群众的扰害。

到乐山以后，鉴于三十二补训处纪律涣散，甚至有个别军

人吸毒贩毒，群众十分愤恨。接收后，向敏思将连以上军官送七十九军军部军官队集训，士兵武器装备等补充我师各团。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措施：

1、向敏思初接乐山警备司令，某京剧团来乐山演出。乐山嘉峨师管区司令黄占春的侍从副官寻衅闹事，打坏戏具，迫使中途停演，影响很坏。向敏思严令师管区将主犯王副官送到警备部，判刑3年，以肃军纪。同时规定九十八师官兵，平时不得进出各娱乐场所，不准坐茶馆。每逢星期天上午，由师政治部统一安排，专场为官兵演出。规定官兵因事外出，必须佩戴外出证。严禁吸毒、赌博，任何人不得介入地方事务，不得经商，连排长不得开小灶。为了贯彻言出令行，曾亲率稽查队上街检查。一时戏院及大街小巷，歪戴帽子斜穿衣，打架闹事的人少了。军风的好转也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2、在整顿军纪的同时，对各连队制订统一的训练计划，时间安排得很紧，逐月检查评比。每天凌晨，师长亲自到西湖塘和官兵一起升旗早操，有时还亲自点名，师司令部官兵都不敢睡懒觉。

3、1945年秋，正是雷波马边屏山各垦社播种鸦片季节，向敏思派部队深入各县各垦社劝禁。1946年春，正是鸦片收割季节，遵照行辕指令，派副师长朱济猛会同乐山专员刘仁庵率团长王卓如等两营人，到各县社武装铲烟，拒受贿赂，坚决铲除烟苗，得到行辕嘉奖。

初到乐山时，向敏思派师运输营修通太平寺草坝到煤矿山马路约4公里，便利煤炭外运。

在乐山一年半时间，向敏思不谋私利，治军严肃，纪律严明，与三十二补训处相比，截然不同，深受乐山民众所称颂。1946年秋，向敏思升任七十九军副军长，离乐时，乐山《诚报》曾出专刊，颂扬他在乐山治绩，以其俭朴，誉称“草鞋将军”。

率部起义

1948年冬，向敏思升任一一〇军中将军长，归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指挥，辖一四〇师、一〇四师、一一一师。1949年秋，从达县率一一一师开到甘肃南部白龙江上游的碧口。中途改命在遂宁集结。这时，向敏思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支离破碎，失败早成定局。何去何从，进退两难。10月，他称病到重庆住在本军办事处养病。罗广文曾两次到办事处，要他到南川指挥一〇八军、一一〇军拦堵刘、邓大军入川。向敏思称病推却。11月底，重庆告急，部队向成都、郫县集结。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各高级将领打气，侈谈西南是反共基地，胡宗南要在成都与解放军决战等等。第二天，蒋介石逃离成都，胡宗南也不知去向。这时先总理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教导使向敏思痛下决心，幡然率部起义。在一次讲话中，他沉痛地说：“我们几十年的军队生活，名曰国民革命军，实际上除了东征、北伐及抗日战争以外，一无是处。只有弃暗投明，向共产党向人民靠拢。”

成都解放以后，贺龙将军在宴请起义将领时，曾对向敏思语重心长地说：“你过去干得不错，欢迎你以后紧跟人民，再立新功！”1950年春，十五兵团奉命出川，过武汉时，有人建议去看望同期同学林彪，向敏思说：“林彪和我在黄埔时，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此人作风不好，不去看他。”

在浙江余杭华东军区整编时，曾受诬陷，受到审查。向敏思风趣地说：“自身正，其奈我何！”在弄清事实真相后，于1955年1月调任山东省林业厅副厅长。1965年调农业厅副厅长。1973年因病逝世，终年67岁。

国民党宪兵副司令吴天鹤

李 静 宜*

吴天鹤字鸣虚，1898年（清光绪24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南常宁柏坊田尾满洲洞吴家村吴云亭家。幼时，家庭很贫苦，父亲替别人挑担，远走云南，以做烟帮生意为生，后客死他乡。母亲刘氏无以维生，携着五个儿女迁家于县城卖酒。

吴天鹤3岁启蒙读私塾，念过经、史、四书之类，因无钱交学费，读了5年便在家一面为母亲分担家务，帮助母亲卖酒；一面刻苦自学。他勤奋好学，不仅对诗词颇有造诣，而且还用沙盘练字，学成了一手好书法。此后求书写匾和屏及招牌、字联的不乏其人。在京、沪、闽时，曾为诸书法名家所称赞。17岁时，考入常宁县双蹲书院就读。毕业后，出外谋生，至湘潭县县长吴茂欽处谋得一抄写文书职数年。

吴天鹤1925年向友人借得旅费，步行至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7月即加入国民党。1927年毕业后，即分配到宪兵部队参加北伐战争，任排长、连长，1929年晋升为副营长；1933年晋升为中校团附兼任北平公安局科长；1934年在代理团长期内，蒙古德王在北平与日本密谋，妄图使蒙古独立，吴天鹤侦察得到实情后，即与部下周密策划，将德王抓获，并呈报上级，秘密处决，使日蒙双方阴谋未能得逞。日本指使蒙古向蒋介石和北平官方要人，闹得满城风雨，为了应付蒙方，上方只得命

* 李静宜系吴天鹤夫人。

令将吴天鹤撤职查办，实际则将吴调至南京军委会晋升为上校。1935年调任宪兵四团团长，后兼任福建绥靖公署情报处处长。1937年，日本欲攻占福州，组织汉奸浪人集团，以作内应，并造谣滋事，捣乱破坏，人民不堪其苦。为首的汉奸刘某，是福州电力公司总经理，商界巨头，实属罪魁。吴欲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把刘抓捕，再行各个击破，然刘深居简出，久而未获。吴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亲自出马，引蛇出洞。计果成，刘某被捕被处决。从此汉奸浪人消声匿迹，人民称快，颂吴是位好官。1938年日本欲攻占福州，军舰已开进马尾海港附近，人心惶惶，四处奔逃。省政府主席陈仪、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敌策略，陈仪、蒋鼎文及部分人主张放火将福州烧光，使敌人一无所获。

吴天鹤坚决反对说：敌人尚未登陆，而先自扰，使百姓无处安身，而先失民意，是下策，宜以安静待敌而击，如若海防部队与敌战败至某地时，再烧不迟，将燃烧物备好待用。吴的意见被大家采纳，敌人见岸上无动静，惟恐有大兵埋伏，而离去，因此福州得救。稍静吴亲自驱车至一山中，将疏散的老百姓劝回安居。陈、蒋称赞吴是位多谋的将才。1938年吴晋升为少将团长；1941年调宪兵司令部任参谋长；1944年升任宪兵副司令，直至1949年，吴天鹤23年的军队生涯，都是在宪兵部队中度过的。当时宪兵肩负着军事警察和普通司法行政警察两重任务，是介于国防军和地方警察二者之间的部队，主要是为国民党效力。但吴个人也曾与共产党有过一段合作的经历。

1929年冬，吴任南京宪兵三团二营副营长时，曾突然奉命执行紧急命令，拘捕常宁县农民运动的“暴徒”肖礼尊。肖是常宁县农会创始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其父隐匿南京，化名一球，就读于南京军官学校。吴与肖父素有交往，乃急趋肖寓相告，并与肖父共谋营救之策。吴献计说：“速电

告礼尊，谎称母病危，令其速归。”礼尊接电果速返家。待吴领兵赴军校到肖家搜捕时，礼尊已化险为夷，在赴福建的车上安然入睡了。

1932年秋，日本驻京副领事松本初次来华，与领事同赴外交部欢迎宴会，松本竟傲踞首席。回馆后，被领事怒斥无理，有损国体，并上报惩处。松本羞愤，于午夜潜至燕子矶，欲跳江自尽，因胆怯又止，后潜栖石洞中。日本借口松本失踪，欲挑起事端，照会限一星期交人，否则，日军将“访问”南京。南京政府张惶不安，调动所有在京侦缉力量，限三日内寻获归案。吴身着便装，不分昼夜，四处侦察，第二日，在燕山矶一餐馆得知一客人饭后无钱付帐，以手表为质而去。吴见表询其貌，乃于次日早在此餐馆等候，候至中午，松本果然到来，吴将其寻获，满天风云遂此消散。吴以破案有功晋升营长。

1937年，吴任宪兵四团团团长时，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肖韶以福州日报社社长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国民党特务欲以汉奸名义逮捕他。吴出面作保说：“肖与我同乡，我最了解他的底细，我敢担保。”一面密告肖，并出主意说：你是中宣部（指国民党）派来的，可找部长邵力子出面证明。肖依计行事。特务只得暂罢。不久该报社两名记者失踪，吴劝肖速离福州，方免于难。

1949年，宪兵司令部自粤经桂、黔入川，驻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吴看清形势后，于11月宪兵司令部撤退前夕，私下派人将妻儿送乐山下友人处，以示决不离川。11月29日，宪兵司令部将宪兵部队及学校人员西撤成都。同时撤离重庆的有宪兵六团、十五团。已在绵阳成都线者有宪兵十四团，驻扎成都的有宪兵二团。以后形势日紧，宪兵司令张镇急于飞台，乃令吴于12月7日下午，先率司令部人员及宪兵六团、十五团开往新津，候国民党中央军校一、二总队出发赴宜昌。

后，借其先行掩护跟进。宪兵二、十四两团待勤务交待完毕，继续南进。张镇布置后三天，带领数人匆匆飞台。吴到新津后，得知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起义通电已出，东西线交通又艰难。南进西昌实不可能，嘉乐又告解放，乃于17日晚折返成都。此时宪兵十四团早已集中成都，有一部分与二团担任城防。宪兵司令部军法处曾有军法官朱德钦，系打入宪兵部队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后离去。此时，奉派为川西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人员八大代表之一。19日，朱德钦前来看望吴，谈论当前局势，分析国共两军军情。朱暗示吴宜义举为上策，吴暗示有意。21日吴即召集团处主要人员，于通商银行讨论局势。经几次会议意见未统一，绝大多数认为，只有起义这条路，唯有参谋长方潋瑕及宪兵六团团长沙靖两人坚持异议。因此迟迟未决，形势日紧。22日下午又召开紧急会议，吴见方、沙两人仍执迷不悟，热心玩火，乃掏出手枪，对众人说：“方今四面楚歌，大势已去，逆势而行是为不智，欲将弱卒而当强敌，犹如以卵击石，是为不仁。我为主帅，应为部属将士负责，引之走向光明之途，决不能使之陷入死亡之境。诸位如有异议，意志不能统一，那我只有不成功，便成仁，饮弹自尽罢了。”说罢，欲开枪自击，众皆急向前夺枪嚎啕痛哭说：“副司令弃我等而去，无人领导，怎能共商起义大计”。方、沙二人亦皆惶恐自惭，俯首垂泪道：“我俩抛弃己见，唯命是从。”起义之举得以统一。当时议定行动方案有二：（一）依附邓锡侯起义；（二）依附重庆卫戍司令部王瓚绪起义，其意在避免自己直接通电起义，使蒋介石难堪。另一方面，吴又派十四团团长江瓚与朱联系。23日晚，一部分城防部队被撤走，吴大惊。时已3点，即与参谋长方潋瑕驱车出城赴赵部，此时赵瓚也正派车来接，乃相偕入城，至东马棚赵之寓所集商。时已24日晨，赵介绍与朱德钦联系的经过，大家皆喜，乃决定由宪兵司令部直接通电全

国起义。电稿于当日送交朱德钦同志转发；1949年12月24日吴天鹤率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及四个宪兵团、三个宪兵营及宪兵学校、医院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吴意识到，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只有挺身而出，抓住时机，消除顾虑，才能尽快地走上光明大道。此时，他还耽心下属官兵值此大转变中，心绪不安，发生意外，因而日夜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并尽早与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商谈部队整编训练问题，决定将宪兵学校同宪兵六团、十五团调归六十二军开赴郫县整训；宪兵二团、十四团集中温江文家场、周家场归六十军整训。1950年1月初，解放军军事代表柏沙到达，任整训主任，吴任副主任，始放下心来。

1950年吴调西南军政大学高级将官研究班学习；1953年，调西南军区高参室工作；1955年转业到重庆统战部休养；1970年受迫害致死，终年72岁。1979年中共重庆市委发文给予彻底平反，并召开追悼大会。悼词中称：“吴天鹤同志是和我们党有过一段合作经历的朋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为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早在1935年，吴任宪兵四团团团长时，副团长高维民性情高傲，吴宽厚并以诚相待。一次高主持训练新兵靶场射击，流弹误死一兵，吴以事故发生，都因自己管教不严，上报请罚，而对高只字不提。高深受感动，徒步十余里，往吴寓负荆请罪，以后信服无间。吴从不摆架子，但有士兵求见者，皆迎至客厅接见。素重乡情，常乡客盈门，有求必应。但对家乡青年学生有问考警官学校之事者，则加以劝阻说：“此非有识青年之前途也。”故人多说吴善得人缘。吴对桑梓教育事业亦很关注。1948年下半年，曾将科学书籍千余册、钢琴一架由南京运至来

阳车站，送县合江学校。吴天鹤治家教子甚严。所生一男六女，皆能奋发上进。有的成为工程师、讲师、一级教师；有的成为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都能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子女常说：“这是党的培养，也是家父严格教育的结果。”

魏巍在九十三军前后

白天*

我童年时用名魏冀承,求学时名魏巍,1940年从国民党军出逃参加革命时改名白天,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十月十八日(1906年12月3日),邵阳县司门前金潭村(今隆回县金潭乡)人,没有叔伯兄弟,姊妹多人,父亲魏荣堃早逝,生活不宽裕,在乡间读了几年私塾和小学。

我童年时受过不少欺压,尤其是我的族叔魏毓温,想侵夺我家财产,我反对过他,但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他还扬言要打死我,这就是我离开家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养成了我反抗强暴、反抗权威的思想及偏激孤高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我的上进心。

1920年至长沙,先后入第一师范附小、岳云中学、明德中学就读。这段我居住在赵恒惕部下当团长的姊夫邹鹏振家,过了4年多平静而温饱的学生生活。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我追求进步,五卅惨案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5年冬,知友刘树楷告以国民革命军秘密招收学生,我由长沙辍学至汉口,在租界考取后,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开学后,集体参加国民党,即与国民党左派共鸣。1926年冬毕业,分配到赣州新编一师二团任见习参谋及见习排长,1927年

*白天,即魏巍,曾任刘戡部九十三军参谋长。建国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71年因患肺癌去世,终年68岁。

春任武汉分校步科二队区队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我逃离武汉赴上海，闲居姊夫邹鹏振家。1929年冬，唐生智在河南发动反蒋，我找在唐部的左派同学黄铎，谋其参与倒蒋活动未成。

1930年任第九师旅参谋主任。1931年春随军往江西，参加三次“围剿”，秋初脱离第九师，回上海休息。“九一八”后，上海空气紧张，十九路军由江西开往上海，我想参加而没有打通关系。不久晤李默庵，约我去十师工作，任五十七团副团长职。

“一二八”爆发，奉命开沪南，于平湖乍浦一带构筑工事，准备防御。1932年夏，上海形势缓和，奉命开鄂东参加围剿，遍历鄂、豫、皖三省，迄平汉路大战，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才结束。1932年冬，八十三师准备开华北，刘戡任师长，约我去工作，李默庵不让我离去，我告以参加抗战的决心，他才同意，赴豫西八十三师四九四团任团长。1933年春，开平北，夏初接古北口防，同年冬，入南京陆军大学十二期，以陈铁旅副旅长职学习，1936年冬毕业，派充鄂北师管区新兵总队队长，驻孝感组训新兵，直至“七七事变”，应刘戡之约，任八十三师参谋长。期间，我反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出卖祖国的投降政策，极力主张与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赴平西，解南口之危，退守晋南。1937年冬，晋南战事停顿了九个月，李默庵、刘戡等政工机构濒于瓦解，为谋求出路，在太原，我秘密访过周恩来同志，谈及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回来力图民主改革，向李（默庵，军长）刘（戡，副军长）陈述改革之方案：招收内地的青年学生，经短期训练后，充实政工并任民运。意见被采纳后，我即创办十四军干训总队，一面派人至长沙、武汉、西安等地招生，一面筹备办学事宜，自己亲赴延安考察，参观了抗大、陕公，会见了毛主席及罗瑞卿、肖劲光、谭政等同志。训练班开学后，我亲自授课，讲《民族的战争问题》。然而干训队创办

不久，新的政治工作与旧的政工体系发生矛盾，1938年秋晋东南牺盟会议，对我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根据地》小册子，成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向各县派出工作队，宣传发动群众抗战”的意见给予否决，会议不欢而散。陈诚以赤化嫌疑为由，致电李、刘解散。李默庵除把原定的两三千名额缩减为四五百外，并且提前结束了教育，分发至十师、八十三师工作。1939年刘戡升九十三军军长，我任军参谋长。晋东南新旧政工系统斗争激化，三十三军团地工会被撤销，成立九十三军地工会，从西安干四团调进受过国民党右派宣传的百余青年学生，以扩大右派队伍。见此，我派余毓生、余贻泽进行整顿，集中学习，我亲自向地工人员宣讲《时代的跃进与青年的跃进》，勉励大家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思想进步，指导大家学习《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革命书刊。

1939年6月，我与余毓生等商定，并促成刘戡派余毓生以军部秘书名义访问八路军总部，以公开身份与八路军联系，将九十三军进步分子的活动和要求参加八路军的想法，向左权参谋长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做了详细汇报，彭总指示：继续在九十三军坚持工作，促进九十三军坚持抗日，坚持团结进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我遵照彭总的指示，在安泽一带原有“红枪会”的基础上，组织一支农民武装，名为九十三军别动队，我与余毓生、余贻泽、夏訥、冯毅等秘密组成革命力量领导小组，平时在一起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以及争取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

为了广泛发展进步势力，将抗战坚持到底，1939年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我嘱余毓生邀战地女青年座谈节日的由来及意义，并做了启发性的发言，题为《如果没有社会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妇女的真正解放》。9月，我向地工队、宣传队、别动

队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的报告，联系实际，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时，国民党内部限制异党的反共摩擦日紧，因刘戡追随蒋介石，九十三军地工会于10月被取消，此时，我多次向刘提出：不要参与反共摩擦，否则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刘执意地说：“不能违背委座（蒋介石）的指令妄作主张。”我以送怀孕的妻子回后方为名离队，以示抗拒。

1940年2月，我从西安回到部队，与余贻泽、冯毅等进步分子秘谈局势的变化及对策，决定加强对别动队的控制，抽出一些青年扩大脱产游击队，掩护浮山牺盟会撤退，营救安泽牺盟区长，制造中央军与阎（锡山）军之间的矛盾，以缓和反共摩擦，当刘戡奉命堵塞中条山唐天际司令率领的晋豫边区游击队转离时，借口作战方案不妥，不肯附署（国民党规定，军师作战命令必须有参谋长附署才能下达），扣住命令，延期一天下达，使八路军游击队安全转移。此事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察觉，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上破口大骂：“我军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我针锋相对：“有人破坏抗战，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不成体统。”矛盾公开化后，我即联合进步分子成立“国民党左翼联盟”，拉军队参加八路军。由于林的告发，蒋介石、何应钦两次来电，命令刘戡：请我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实属谋害）。刘复电：前线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请求缓调。5月下旬，我写信给彭德怀副总司令，托韩乐然（共产党员，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带回西安，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得知韩在宝鸡被捕后，虑其身份暴露，不能再坚持下去，被迫离开国民党部队，逃至太行，在途中作诗一首：徬徨垂十载，苦学觉迷律，漏网奔微曙，挥刀斩劣根。赤忱推霸道，白手拯民生，汤火勿回顾，高歌寄故人。

1941年5月，在前总由彭德怀、申伯纯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去太岳区，收拾国民党中央军退走后的局面，

争取唐士渊团无结果，回总部后，此时，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入东南亚，我坚决要求经敌后赴越南，与陈锡联、戎子和等过平汉路，遇日军袭击，仅以身免折回。

1942年春，任前总参谋处长，9月任军委高参室主任。1943年在延安军委参加审干，后入党校学习，历时两年多。

“八一五”事变不久，我离开陕北赴东北，任总部参谋处长，1946年夏调补训师副师长，协助何长工、吴溉之等同志。同年秋，补训师解散，调总部教育处处长。1947年初，我根据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的精神，写了《目前的战役问题》的小册子，经林彪修正批准后，即以司令部的名义印发部队作教材，后因个别同志不同意以机关名义下发，应予收回，因而消极对抗，离开东北，经平壤、大连至胶东，住三野数月，值范汉杰扫荡，突围经渤海，冀中至平山县工委。1947年冬分配到十八兵团工作，先任六十一军参谋长，后调六十军副军长，经临汾、晋中、太原诸战役及解放西北的作战，于1949年冬解放西南，任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剿了一年土匪，1950年底调军事学院，任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1951年夏调北京任军训部部队训练局副局长。1953年秋任第一炮兵技术学校校长。1957年3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59年因受彭德怀错案的牵连，改作地方行政工作，任哈尔滨市副市长。1963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战争史研究，撰写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

记舅父文九德先生

陈铁如

(一)

舅父文九德，字有生，是外祖父山玉公的独子，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农历四月廿二日生于衡山东湖天柱寺。行大，还有三个妹妹，我母亲居三姐妹之长。他家历代都是贫苦佃农。除了受地租剥削，常年还有无穷的差役，地主少爷出门，外祖父必被唤去抬轿，用他的话说是“肩膀给人当马骑”。外祖父有感于祖祖辈辈目不识丁，受人欺压，便节衣缩食，供儿子就读于乡塾周鹤汀先生家。虽家境难以维持温饱，读书时中午常须挨饿，瓜菜成熟时，方可摘条黄瓜聊以充饥，但舅父天资高，又勤于读书，深受其师器重，故得以免除学费，读完四书五经等孔孟之书。后相继进入衡山高等小学堂、湖南陆军预备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同期），1909年毕业回湘军任职，先后做过副官、连营长等，1922年任补充团团长，不久编为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第九团任上校团长，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初改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步兵大队长、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1929年长沙分校并入南京中央军校，舅父未随同前往，而留在湖南担任四十六旅上校副旅长，1934年调任陆军第十六师上校参谋处长。舅父在军中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安徽六安团管区司令，1937年到任，1939年辞职回乡开发实业，五十年代初故去。

舅父戎马半生，他在任内军纪严明，身体力行，即不准部队侵扰百姓，也从不体罚士兵。他在长沙分校的学生、五十年代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革命历史影片《大浪淘沙》作者朱德南同志于1980年回忆道：“九德老师思想进步，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广大同学所敬重。”

(二)

1939年当他在军界服务了三十个春秋，经历晚清到民国的沧桑变迁，领悟了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之后，以半百之年毅然回到哺育他的家乡，用多年的积蓄购了50亩水田，一片山林和他祖辈就佃居的那栋泥墙茅屋，从此，揭开了他生命的新篇章。尔后漫长的12年里，在地方上，他总是开新风气之先。舅舅家地属雪峰山脉，处驰名中外的五岳之一——南岳衡山风景区中。南岳山以西岭为界，山南山北俗称前山后山，舅家和我家都在后山。这里气候潮润，雨水丰富，遍山楠竹。每逢春夏之交，新竹长成，是极上乘的造纸原料。世代代，都是湘西的纸匠于嫩竹砍伐期，到后山来租山建槽造纸，手工小帘，一人操作，约四开大小。凭藉这丰富的原料，舅父几经周旋，于1941年争取了一点投资，在东湖建成湖南南岳造纸厂，并出任厂长。他聘请了专业技师，招聘有一定文化的工人，制订严格的管理办法。由于采用半机械化作业，且推行当时的新工艺，故纸质可达现代新闻纸水平。

舅父分析了后山农作物品种单一及耕作方法原始粗放等弊端，倡议引种小麦、棉花……启发贫困山区父老乡亲的脱贫之心。他在自家山林里开辟示范油茶场、油桐林（以往是自然杂生，产量极低）。红薯也是他从任所驻地引回后山的，他根据

农艺书籍介绍，亲率两名长工、一名月工精心操作，不敢懈怠。棉苗栽种长成，他要亲自抽样点数一株几个枝叉，一枝结桃几个，每株采棉多少，计算产量和成本；蔬菜地里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整地栽种，浇水浇粪，计算产量，一棵辣椒结实多少，一瓠红苕有多重，都一一记清，忙个不停。有时白天没干完，晚上挑灯再战；小麦喜干热，不宜后山，试种两年，收成欠佳，毅然放弃；茶油是我们家乡的主要食用油，天柱村的油茶林，经几代繁衍，均已果实累累，受益者，饮水思源，对九德公感恩不已。

我们衡山不知从何时起便流传着“前山会杀猪，后山会读书”的民谚，意即前山交通发达，信息来源广，人们的商品意识早就较浓；后山人则闭门读书研究学问，不少人因而进入仕途，舅父深知民众文化教育之重要。回乡后，欣然接受乡亲们的推举，担任本地新授寺小学的义务校长，继承传统，把学龄儿童都吸收进来读书，贫苦子弟连书籍课本都免费，对创办这项公益事业的罗应儒老先生，年年设坛祭奠，弘扬老先生为民兴利的思想，教育乡邻及在校师生。舅舅在安徽任所驻地的一位袁姓挚友，不远数千里，于1940年把他的儿子袁宜之夫妇介绍来后山，九德公聘他为新授寺小学教师，以大学毕业的学历，在新授寺任教多年，直至抗战胜利，才同校长依依惜别，返回安徽老家。

在当时社会管理松懈、风气不正的条件下，舅父倡导立乡规民约：尊老爱幼、禁止牌赌、惩治偷盗、看“四季”牛、修乡村公路、封山造林、不信迷信……互相监督，严格遵守。舅父的两位至亲表弟曾染上赌牌恶习，他找来谈心，严辞规劝，直至改正。那时，到天柱寺村，如到另一文明世界，男耕女织、怡然自得。良好风气代代相传，迄至今天，令当地人自豪的是，~~天柱~~角赌风绝迹，路不拾遗。这和舅父早年呕心沥血的

倡导，不无关系。

(三)

天柱寺村地处僻壤，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舅父便常年订阅中央和省的报纸，每天由孩子们去五里外的东湖镇邮代所取回，看过后，按同一格式折好，依日序排列，保存在书房里。几年过去，报纸码成小山，整整齐齐。人们都说我舅父办事认真得近乎古板，收到一封信，一定用剪刀将封口谨慎地剪开，绝不象一般人随手撕开，以致有时不慎，信瓤也一起撕破。看后必定工整地在信封落款一侧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收送到”，若已作复，随即再行加注“某月某日复”字样。处理过的信件，依日期先后，一摞一摞排列在书架上，归笼在竹篾书箱中。以致时隔二十多年，且历经土改运动，为了查询我大表兄立微的下落，我父亲1954年去他家书房楼上，还顺利找到立微表兄记述“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信件，为证实立微的烈士身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材料，又经现中顾委委员李锐同志的推荐，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史料编入革命烈士书信续集。

舅父对孩子们读过的书刊，也成捆成箱保藏在书房楼上。那时，县城都少有书店，乡下更难买到书，可是他家书房楼上俨若一家图书馆。课本、儿童读物及《开明少年》、《少年先锋》、《大家唱》等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还有鲁迅著作，应有尽有。我小时，总吵着要到舅舅家去，为的就是去看那五彩缤纷的识字卡、连环画和听外婆绘声绘色地讲“老虎外婆”之类的童话故事。

以上几个细微处，足见舅父那时就已有科学管理思想的萌芽，这同八十年代的今天所推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定置管理等

学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四十年代以前的湖南农村，只有少数中医郎中，没有医院。妇女生育，只有请接生婆，巫医合流，九死一生。九德公宣传新法，我的三个表妹，先后于1943年至1948年降临人间，都是舅父依照妇科典籍而亲自接生的。这在当时，以他的身份，被看作是惊人的怪事。

在南岳造纸厂，舅父见工务主任是一位好学上进、正派勤谨的青年，便介绍同我二姐相认，以后他们恋爱结婚。那是1943年，由舅父倡议，在我家为二姐举行了简朴的新式婚礼。没按乡间习俗大摆筵席，铺张浪费。而只请来亲友邻里，舅父亲自为外甥女证婚。新郎新娘也不拜天地。仪式间，只是主、证婚人讲话向新人祝贺致意，新人致答。这在我们山村，确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颇为青年们和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过来人所羡慕。

（四）

舅父九德公出身贫寒，同情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一生读圣贤书，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堪称孝子、贤兄、慈父。

我的周氏外祖母过世早，那时舅父年方12，小姨刚满五个月。刘氏继外祖母一年后进门，自己虽未生育，但抚养周氏所生子女，辛劳一生。舅父待继母一如生母，即使后来在军中担任较高级职务，大小家务，都尊重继母的意见。到了晚年，老外婆常常咳嗽不止，有时卧床不起，舅父不劳女工，而亲自侍奉床前，端屎倒尿。1948年，继外祖母病故，当时正在长沙为三儿治病的舅父，接到电报，星夜赶回。披麻戴孝，用乡间最隆重的仪式为继母治丧，亲撰长篇悼文，历述继母的贤淑美德，~~并~~奠于灵前。对此，乡邻无不交口称赞。舅父致力军务，

原配赵氏舅母随军操持家中一切，1922年心力交瘁不幸去世。之后，舅父仍一如夫人在世，对岳母（恰是我的姑奶奶），情同亲母，孝敬关怀，直至老人归仙。继舅母章国干女士的娘家姑姑，是一位笃信佛教、视力极弱的孤身老人，长沙沦陷后，便跟随舅父家生活。舅父待妻姑亦如生母。乡间难比老人过惯了的都市生活，舅父总是千方百计弄些好的食物孝敬她，使她直到临终，总在念念不忘侄女、侄婿对自己的照顾和孝敬。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2年舅父已升任营长职，回忆自己的成长，对启蒙恩师周鹤汀老先生万分感激。为了报答，便把生活清贫而年迈的周老师接到常德任所，一住数月，极尽孝道。临别时，以400元银洋的厚礼相赠，帮助老师安度晚年。以后每次返乡，头一件事就是探望恩师，直至1944年周老先生病逝，从无间断。对贫困的近邻老人，每逢过年，馈赠稻谷百斤，初一、十五必登门叩节，问好请安。

对三个胞妹，舅舅作为长兄，更是备加关怀。仅举二例，我家和两位姨妈家都是一贫如洗的佃农，每逢我母亲姐妹的生日，舅父送四担（600市斤）稻谷。名义是送生日礼，其实是在生活上助一臂之力。我家人口多，尤多得帮助。我小姨刚满五个月便被送到谭家做童养媳，家庭生活很苦。到她20岁时，因家庭琐事，夫妻拌嘴，一时想不开，竟投水身亡。这下吓坏了谭家，以为她哥哥在外做官，一定不会轻饶，吃不了兜着，便用其阿婆的寿材入殓。舅父得知苦命小姨的不幸，非常难过，但人死不能复生，便强忍悲愤，令大表兄立微携款从长沙赶回后山料理。感念谭氏阿婆对小姨从五个月起的抚育之恩，执意改用外祖父的寿材方才罢休。小姨的婆母后来把这件事叨念了几十年。

舅父对子女要求极严。我的表兄弟姐妹有9人之多，现除大表姐年逾古稀在家休息外，他们中有一位是为民族献出了年轻

生命的知名烈士，一位在海峡彼岸为祖国统一效忠，其及六位分别在医疗、教育或农业、电力战线的专业技术岗位上为四化建设出力。他们的成材，家教是良好的基础。舅舅要求孩子们从小就要尊师爱友，见了老师必鞠躬问好，放学路上与同学分手时要道再见，要爱护庄稼。他见孩子们在吃饭时掉下一粒粮食，一定要口念“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他要求孩子们将日之所见记入日记，常年不懈，练习写作，甚至气温、风霜雨雪及一日三餐的饭食谱，都要观察入微，无一遗漏。他教育孩子们吃饭要细嚼慢咽，以利消化。他自己吃饭，也是从左腮鼓向右腮，反复咀嚼，方才下咽，以致他吃一顿饭比通常要长上一二十分钟。即使一家老小同桌吃饭，他也坚持要大家使用公筷夹菜，防止传染疾病。他于1925、1929年先后两次聘请古文名师来家，为子女讲学并辅导古文及诗词写作。他本来切感军界的事不好作，勉励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将来从事实业。但一旦得悉长子立微、次子立微已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去挽救民族的危亡时，又极表理解和支持，使他们在前线建立了功勋。1938年3月，立微大表兄曾回长沙看家并短暂停留，恰在长沙治病的舅父饶有兴趣而动情地听了前线的种种情况。“一二·九”运动后的寒假，李锐与文立微，（他们是岳云中学同班好友）在长沙相聚，两位热血青年归途在武汉曾合影留念，还互拍了几张便照。立微摄于渡江轮上的背影照，寄回家后，舅父将它连同立微珍爱的卢沟桥、万里长城、长江小孤山等风景照，珍藏至久远。那背影照后面，舅父工整地记上：国道之友李君为国道摄于汉口舟中。40多年后，李锐同志再次见到此照时，挚友已壮烈牺牲，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的三表兄立微于1947年患右股骨骨髓炎，因乡下误治转为痼疾，不能行走。舅父千方百计，甚至变卖已经不多的粮

食，赴长沙诊治，经两年治疗，舅父吃尽千辛万苦，向许多人告贷，饱受无钱缴费取不出药和常常断炊之窘。到1949年夏，虽债台高筑，但立微的腿疾终得痊愈。立微表兄现服务于湖南医学院附一院急诊科，对病员体贴入微，诊治时细心认真，受到普遍的赞誉。应该说，父亲那时带他求医之艰难，为他今天的良好医德，奠定了无形的基础。舅父对我们这些外甥子女，也关怀备至。我家境无力供小孩读书，舅父便把我两个姐姐带到长沙岳云中学附小就读。我小时他教我右侧位睡觉，并解释这可减轻心脏负担，利于肝腿放松，这使我刻骨铭心，右侧位睡姿保持至今。我二姨夫妇去世早，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孤儿，舅父长期收养，送其上学，直至结婚安家。我的堂兄是木匠，舅父专门带他到省城木器店观摩学习新样新艺，这位堂兄后来成为后山手艺超群的木工老师傅，他加工的家具很受乡邻欢迎。

(五)

我同舅父的最后见面是1950年夏秋之间。那时，我得数享受人民助学金复学于衡山县立中学。舅父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书，顺道到学校看我。他告诉我，我家杀了一口猪，母亲请他捎几元钱给我零用。他还谈起，“衡山县中”的前身就是他早年就读的“高等小学堂”，“研经书院”篆书盖字石匾，在他读书时就高悬于此。他勉励我珍惜时光，好好读书。他对我说要买些书看，他已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现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中山先生的遗训，自己要好好做些事情。他这次特别讲到要继续设法找寻立微的下落。这时，虽然他仍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脚穿草鞋，腰系围裙，但精神很好，说话时

隔一年，当我从湖南省团校第八期毕业回校，一位老师告诉我舅父已经去世。

舅父的一生是勤劳严谨、乐善好施的一生，他自取“文谨厚堂”，意欲勤谨忠厚的家风代代相传。远在台北的立微表兄年前寄来的“忆父九德公事略”中写道：“……父亲为人忠厚谨慎、好客、富于情感、乐于助人，做事细密、耐烦、坚毅、忍让，稍欠长远完整计划，不喜理财，自称‘文谨厚堂’，我拟改称‘文敬业堂’，意在鼓励子孙‘敬事精业，诚挚勤奋，光耀门第，报效国家’，一代强似一代”。

舅父学过国术（即武术，他的大影集里，有一套多达数十张的自拍照，每张一个动作，宛如电影的分镜头），经常锻炼，所以他的体魄强促异常，按说活到八九十岁绝无问题。但他仅享年62岁，终年又极其悲惨不幸。应该说这是当时人民共和国还不成熟，乡村政权建设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真正贫苦的民众尚未觉醒并把握自己的命运之前，少数兵痞流氓混入乡村执掌政权的缘故。现在看来，老人家成了这帮人保护自己过关的无辜牺牲品。由于舅父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无丝毫劣迹，土改一开始，已主动将田产、山林、屋宇、衣物悉交农会。这帮人只好一味威逼舅父交出所谓匿藏的金银宝来，棍棒交加，以死相胁。当舅父除了一身债，确无分文时，悲惨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后来，混迹初级政权机关的少数坏人虽已清除，然舅父身受的不幸却永远无法挽回。但是，凡具有人类美德的生命都是幸福的生命。倘若舅父他老人家的生命能延长二三十年，延长到人民共和国成熟起来，延长到目睹祖国日益强盛、家乡日渐繁荣，延长到得知梦寐以求的长子立微是知名的革命烈士，延长到目睹海峡两岸已顺乎民心建立多种交往（假若他还健在，肯定会为祖国统一致信海峡对岸的亲人故旧），延长到读上次子立微夫妇从台北寄回的平

安家信，延长到看见自己的子女都学有所长，都在为国贡献光和热，延长到……从而带着对新生活、对新世界的无限憧憬，再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切就完美了。

黎澍同志早岁拾遗

张生力 湛 震*

黎澍同志这支笔，始终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写作，整整写了半个世纪。他象一个坚守阵地的战士，直到临终前还在伏案。在他坎坷的一生中，他心中有多少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在思考啊。这在他早期活动中已有初步的表现。我们仅就自己所了解的一些史实，对《早岁》一书作些补充。

黎澍同志童年时在醴陵开元学校读书。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还在北伐之前，就曾请一位法国留学生来教唱《国际歌》。然而因为推倒神像，把神庙改建学堂，某些顽固分子借此煽动农民，一把火把学校烧毁了。马日事变后，学校的教师有的被杀，有的被捕，有的逃亡。1928年，黎澍到长沙长郡中学读初中，知道那位爱讲《水浒》的国文老师匡宣民被关押在长沙狱中，他每个星期日都要去探监，代办一些事，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直到老师“下落不明”为止。当时湖南在白色恐怖中，有一次何键竟下令杀了三个女学生，年龄最小的不过十四五岁，并在广场陈尸示众。鲁迅先生曾为此写过一篇杂文，悲愤地说，革命从来不是杀头能够吓退的。黎澍同志那时也不过十五六岁，还未参加革命，但他为了敬爱的小学老师，竟不怕株连，也不受反共的校规约束。

1931年秋，黎澍同志和张生力同时考入湖南省立一中。那

*张生力曾与黎澍同学，后任《观察日报》记者。湛震系老报人。

衡一中设在长沙城南书院坪，原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母校的旧址。据说，教育当局迷信风水，认为书院坪多出怪事，就把一师迁走了。一位老传达是一师留下来的，常对新生们闲话城南轶事，沉默寡言的黎澍，也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内心是景仰这些怪事的。“九一八”事变后，一中的学生相当活跃，不仅在校外开展反日宣传，而且请作家孙俚工来讲《文学的反抗性》，后来又请齐鲁大学教授罗天乐来讲《欧洲战略外交形势》和《经济制度之比较》。这些都曾使黎澍同志感到兴趣。遂同李品珍、张生力、张海秋等同学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1933年他在《一中学堂》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题为《丈夫，那混蛋》，为女性鸣不平。

1933年6月，一中爆发了反对校长彭晋云的学潮，同学们平素就有两句口号：“有理的服从，无理的反对”。彭晋云无理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和体育干事，激起全校同学罢课，向教育厅请愿，终于把他赶走了。这次学潮的导火线是校内的体育活动问题，实际上穿插着国民党内湖南省甲、乙两派的内哄（甲派即CC，乙派是何键为首的地方势力）。同学们很大真，只凭“无理的反对”这一条行事。黎澍同志所在的普十一班最为积极，他的好友杨隆誉（即杨赓同志）一马当先，时有“杨大炮”之称。黎澍同志却比较冷静，学潮是参加了，并不热衷于放“大炮”和请愿。1934年1月，张生力所在的师九班因反对军训，全班被解散，转到衡阳五中毕业。同年5月，普十四、普十五两个班又因反对军事教育，全校总罢课，全校被解散，重新登记入学。这两次学潮都是校长吴晦华处理的。而此公主持校务前，却有“好好先生”之称。黎澍同志在办理重新登记入学手续后，曾写信给在衡阳的张生力，慨然叹息：“搞教育的人，一定要有点骨气，否则就会带坏学生”。

1934年秋，黎澍同志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冬，加

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了地下党。这年暑假，黎澍、于刚、李锐、郭健、肖敏颂、曹国枢、曹国智、陈德明、魏泽同等，先后从北平、武汉回到长沙，传播“一二九”运动经验，开展救亡活动，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张生力在黎澍、吴磊伯两同志的影响下，遂在“北大”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民先”队。西安事变后，北平新旧学联斗争激烈。黎澍同志认为，“民先”队员有些作法受了“左”的影响。1937年“五四”纪念这天，右翼教授陶希圣在“师大”操场主持一个集会，部分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赶去冲击会场，高唱西班牙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战歌，陶希圣见会场已乱，连喊“打倒保卫马德里的卫士”！大批童子军用棍棒和石块打击“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张生力也是挨打的一个，黎澍同志没有参加，曾对张说：“何必去冲击会场，右派也可以争取嘛！”七七事变前，北平地下党曾想利用青帮掩护党的活动，动员“师大”教授谭丕模同志（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开设香堂，吸收一批地下党员入帮。“北大”的张生力、莫家鼎、常振誉等同志，在同一天去谭家拜师，被列入青帮“悟”字辈。黎澍同志不肯参加，他对张说：“人各有志，独立思考。何必借助于封建势力闹革命”。五十年代审干时清查这个问题，才知道是北平地下党布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沪宁等地许多地下党员来长沙，都想为抗日民主运动出点力，一时长沙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其中如《现实》、《前进》、《民族呼声》等，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黎澍同志则决定办一个通俗刊物。他和杨隆普同志合作，于1937年11月12日创办《火线下》三日刊，颇能针对下层社会的思想问题，有的放矢，给人以清新、明快、实际的印象。由于刊期短，需稿急，他常在斗室中忙得不亦乐乎。忙了一个多月，他得出个结论：与其办三日刊，何不索性办日报？同

样是忙，效果会大不一样。因此决定创办《观察日报》，并得到党的全力支持。在经济方面，则有唐文燮和邓先生两同志的资助。事后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观察日报》一出，同样的中央社电讯，编辑手法不同，效果也就两样。再加上进步的评论，通讯和通俗的副刊，令人耳目一新。长沙原有一家《力报》，比较进步；这时又有《大众报》（张天翼主编）、《抗战日报》（田汉、廖沫沙主编）和《观察日报》几乎同时崛起，新闻界的阵容就坚强多了。

《观察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同年5月，经中共湖南省工委在内部正式宣布为党的机关报。不久便受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注意，张治中确实想团结一切力量，发动民众起来保卫湖南，于是成立了一个“湖南民众抗日统一委员会”，除国民党的党政军负责人外，还邀请各党派、团体的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也是委员之一。新闻界只有两名代表，一是历史最久的长沙《大公报》总编辑朱石忠，另一位就是历史最短的《观察日报》社长唐文燮。

《抗战日报》这时已停刊，故未邀请。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则已撤到长沙出版，竟不在邀请之列。由此可见《观察日报》在张治中心里的份量。直到1939年1月张治中行将离任时，他的秘书王次青还在省政府的《国民日报》上转载《观察日报》一篇社论，并且加了按语，认为“立论极中肯綮，当时虽系对张主席而言，要亦不失为今后之参考”。

《观察日报》之所以受到张治中这样重视，原因之一，就是黎澍等同志善于抓住时机，展开怎样保卫大湖南的讨论。当武汉危急之际，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那些“华威先生”（张天翼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们，还在千方百计的加紧限制民众救亡运动，使本来十分活跃的“湖南文抗会”陷于瘫痪，使革命青年有“长沙犹是沙亡淮”之叹（见李锐诗）。而国民党包办

那些所谓民众团体却死气沉沉，徒有虚名而已。这在“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现得最为刺目。正如《观察日报》记者张生力一篇特写所报道的，“某某部某某会的旗帜，在散会前十分钟才由两位健步的工友打着匆忙赶到”，这使张治中十分愤慨。第二天，王次青即在《国民日报》发表社论，痛斥那些包而不办的“华威先生”们，“站在某一个地位上自己不负责任，这是最大的罪恶。”“照这样的情形，如果战争进入湖南省境，那长沙就会变作一座死城。我们的抗敌名流，那时也许会早就不知去向！”黎澍看到此文，极为赞赏，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湖南民众为什么还没有起来》的社论，积极响应。接着又发表一系列的社论和来论，对国民党有批评，有建议，主张放手发动民众，加强战备，保卫大湖南。这场讨论赢得了张治中和国民党内开明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却无法改变国民党顽固派惧怕民众和苟且偷安的心理，结果是在汪精卫的“焦土抗战”的口号鼓惑下，在蒋介石仓皇失措的一纸手令下，当时有40万人口的长沙市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火城，一片焦土！

《观察日报》可说是黎澍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他从来不作自我宣传。由于在“文革”中仅在江苏一省即有8人因《观察日报》而受到株连，他为了对历史负责，才写了一篇回忆录，说明《观察日报》是共产党领导的报纸，说明参加工作的有那些同志，包括几位老印刷工人，而对于自己则讲得很少，他着重讲的却是自己那时如何缺少经验。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即黎澍同志对于当时党内个别领导同志的“左”、右倾思想的抵制。湖南省工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聂洪钧同志，因受王明思想的影响，主张在湖南争取省委公开活动，在《观察日报》用他的真名发表文章。黎澍不赞成这种自我暴露的作法。8月13日，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时，聂要在报社印刷，并夹在报纸内分送各地。黎只同意印，

不同意随报发出，以免国民党顽固派据为口实。由于聂的坚持，有部分报纸还是夹带了宣言（现存湖南省图书馆的合订本中即夹有宣言）。聂还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少登一些揭露性的稿件；黎澍和杨赓同志还是登了一些。如《锡矿山工人的生活》、《铜官工人的生活》、《征兵与逃兵》、《非法勒索的催征员》等等，都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阴暗面。长沙大火时，报社迁邵阳，黎澍同志则去茶陵筹办《开明日报》，于是聂的主张得以贯彻。《观察日报》在邵阳复刊之初，即以整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这样连载十多天，充分作了自我暴露。因此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批评。从此，《观察日报》就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便报道湖南各地的群众活动，以免顽固派借口加以迫害；又不便放手批评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生怕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1982年，黎澍同志和湛震谈起邵阳这段时期的《观察日报》，认为“这样的报纸根本就不必办”。尤其使他扼腕的是：直到报纸被迫停刊时，编辑部的文章中还对坚决反共的薛岳抱有幻想。

1939年8月，黎澍和刘岳厚同志合作的《开明日报》在茶陵创刊了。茶陵是湘赣两省交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当初估计，日本侵略者会打通粤汉线，茶陵就可能成为湘赣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之一，所以才把报纸办在那里。以后情况变了，报社便在1940年迁到衡阳。这张报纸仅有两年历史，却遭受国民党多次迫害，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即1941年1月17日深夜，一群特务闯入报社，绑架了总编辑骆何民等12人。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仍坚持出版，并且公布特务的罪行，对国民党的摧残舆论提出了强烈抗议。刘岳厚是位国民党党员，竟如此铁骨铮铮，实在难能可贵。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少有的。黎澍同志这时早已被迫离开了湖南，但他仍时刻关心报

纸的命运，在紧急关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坚决的支持。《开明日报》虽是一张地方报纸，当时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金仲华同志主编的香港的《星岛日报》，经常有一版介绍国内报纸的评论，其中《开明日报》占了相当的比重。刘岳厚同志还同侨居美国的李国钦先生有旧，李为了沟通中美友谊，办了一个通讯社，常向《开明日报》供稿，刘即请李在美国推销《开明日报》，一度使这张日报在纽约华人中有些影响。

黎澍同志无论在《观察日报》或《开明日报》，都很少时间参加社会活动，表面上并不活跃。但他待人诚恳、热情，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常使人得到启发，因此他很能团结人，争取人，长于统战工作。他办这两张报纸，都曾得力于上层社会的支持。例如唐文燮同志的父亲唐赞宇先生，原是何键的军需处长，后来经营煤矿、盐号、米店、钱庄，等等，是一位爱国的资本家。黎澍同志不仅和唐文燮友好，而且得到他全家的支持。《观察日报》的印刷厂是唐出资建立的，后来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迁到郊外，由唐家让出一幢楼房，供编辑部使用，另建一列平房供工厂用。地下党的领导人如谭丕模（省委宣传部长）、李仲融（文抗会负责人）等同志，常坐唐家的小轿去报社“躲警报”，其实就是在那里开会、布置工作。刘岳厚同志那时还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也住在报社附近，黎澍同志经常去谈天，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才有后来的《开明日报》。黎澍同志转移到桂林后，有一段时期住在桂林青年会的旅馆部，从事地下活动，开支较大，而他并无固定收入，主要是靠唐家的接济。1949年初，唐文燮同志又在黎澍的鼓励之下，在长沙出资创办《法报》，编辑多是“观察”和“开明”的老友，常得到黎澍同志从香港寄来的稿件。在解放前夕的长沙，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50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和黎澍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尽管

条件艰苦，大家都有那么一股子劲，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

《观察日报》是没有工资的，《开明日报》的工资则是一律15元，比不上政府一个起码的职员。茶陵本来偏僻，报社又在城外，可是大家生活得非常愉快，有时间去汽车站附近一家小店，每人要一碗米粉和一个五香茶叶蛋，热情的老板再给几滴香喷喷的麻油，大家海阔天空，边吃边谈，津津有味，真是“早岁不知世事艰”。想不到两个报社的一些朋友后来都历尽坎坷：《开明日报》社长刘岳厚同志是党的忠诚的诤友，被错划为右派；《观察日报》后任总编辑杨庚同志竟死于非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黎澍同志对许多同志的落实政策，总是尽力而为的。如为了《观察日报》社长唐文燮同志的房产补偿问题，《观察日报》编辑张生力、冯秀藻等同志的党龄党籍问题，就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历史事实。《开明日报》有位同事，过去曾与黎澍同志为难，1949年他去北京，黎澍同志还是介绍他到《光明日报》工作，使能发挥其所长。他对朋友这样爱护，并且不惜因此受谤。他虽与世长辞，但这种精神是不死的。

忆教育家向绍轩先生

陶 蒲 生*

噩 耗

《大公报》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五月二十日第三版登载了下面一段消息：

“国立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向绍轩于昨（19）日上午七时，由本市南门外住宅出发访友，经通大椿桥铁道时，突被由长沙南门小快车撞压毙命……向院长，辰溪人，早年留学英国，获爱丁堡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各大学教授，诲人不倦……今遭不幸，哲人遽萎，诚国内学术界一大损失，良堪痛悼云。”

1946年5月中旬，国立中央大学由重庆复员南京，我乘这个机会，和一些湖南同学结伴回到家乡长沙。一到长沙，就得知上述噩耗，真使我悲痛万分！我和妹妹陶舜生都是向老的学生，立即赶赴长沙南门外大椿桥向老住宅悼念，走进肃穆的灵堂，一眼就看到了在长大的白绋孝帐正中，悬挂着向老先生的遗像，那正是他老曾经送给我们的照片的放大，我们向遗像三鞠躬默哀致敬，我们久久地凝视着遗像，不能离去，不能离去。向老，您虽和我们永诀了！但是，您那笑容可掬、慈祥谦和的面貌，您那鹤发童颜，精神抖擞的神态，您那豁达开朗的气度，

*陶蒲生系向绍轩先生的学生，曾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您那勤俭朴实的作风；您那学而不厌，海人不倦的精神；您那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的忠诚；以及您那胸怀祖国、勇匡正义的一身浩气，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向老：我们永远纪念着您！

我们的好校长

1938年上学期，向绍轩先生任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校长，当时我们正在桃中读书，由于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目睹国家危亡，不禁心潮激荡，热切地希望新来的校长赞成和支持我们抗日救亡。

向校长当时已五十开外了，满头白发，总是乐呵呵、笑嘻嘻地，他身材伟岸，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有时还带点跳跃式。他整天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忙个不停，有时嘴里还哼唧带着比较浓重的辰溪口音的京剧，显得顶快活的，呵！一个多么豁达乐观的长者，这是我们对向校长的第一个印象。

向校长是个坚决赞成抗日的爱国主义者

当我们从进步朋友处得知向校长原曾随周佛海在江苏省教育厅工作，以后因不满周佛海投降日本，回到湖南任桃中校长时，不禁肃然起敬！我们在以后的不断交往中，愈益敬爱向校长。

向校长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思想开明，坚决拥护抗战。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主张严惩奸汉，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加强国际统一战线，联合苏联、英美和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战胜德、意、日帝国主义，当我们在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他恳切地说：“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当前，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他痛感国家危亡，

腐败，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经济廉洁，政治英明”“经济廉洁是政治英明的基础，政治英明又是经济廉洁的保证。”他认为“国民党坏，坏就坏在层层贪污腐化，解放区好，好就好在经济廉洁”，他主张“用人唯贤”，推行贤人政治。

向校长还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教育家，他热爱学生、热爱青年。他认为青年是未来的主人，国家的栋梁。他主张“有教无类，唯贤唯能”，只要是有志青年，他都全力培育。他在桃中时，帮助了许多同学入学升学，蒋盛璋同学没有钱入学，他资助。陶舜生中途不能插班，他特准了，等等。他的学生很多，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向校长主张“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生与群众打成一片”。“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我们在桃中时，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他是默认的。我们经常举行时事报告、讲座、座谈和讨论，以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觉悟，鼓舞抗战热情，增强学习自觉性。还经常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走出学校，深入街道田野、工厂、医院，讲解抗战形势，表演活报剧、教唱抗战歌曲，写墙板、办民校、慰问伤病员、组织大型公演、义卖，发动游行示威等等，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在实践中使同学们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所有这些，向校长都是赞成和支持的。

向校长谦和民主，平易近人，他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既是严师又亲如父女、朋友。记得有一次，学校在潭湾举行运动会，有几个顽皮同学高喊“欢迎老校长来一个”，向校长竟欣然同意，与同学们比赛“跳播摆”（即一只脚向前跳，看谁先到）。他老50高龄，哪里是小女孩的对手，当同学们三蹦两跳到达终点时，他老才蹒跚起步。但是他老竟以惊人的毅力，十分认真地拐着一条腿，一步一步稳健地跳到了终点。这是师生间水乳交融的情感多么生动的写照，又是向校长意志坚

强，遇事严肃的深刻的现身说法。

向校长是艰苦建校的典范。1938年秋武汉失守，桃中日夜遭到敌机轰炸，向校长毅然决定学校西迁辰溪。他亲自率领600余名学生，分乘几条窄小民船，溯江而上。一路，秋风萧瑟，浪险滩多，同学们像压缩并干挤在一起，身不能翻，腿不能伸，整天吟唱着《流亡三部曲》，寄托着悲愤和未来的希望。400里的沅水，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辰溪潭湾，向校长和同学们食住在一起，风餐露宿（晚上校长也只能蜷曲着身子睡在船板上，真够苦矣），还要为同学们的健康、安全、前途操心，一个多月的辛劳，校长瘦了，老了，憔悴了！

潭湾山清水秀，但却是个十分古老而贫瘠的山村。开始，我们只能挤住在破旧的民房和祠堂，坚持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的老校长为了几百个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却硬是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造起一座座教室大楼，一栋栋师生宿舍。他节衣缩食，自奉极薄，却把一大片桔林推倒，建起校舍来。无数个晨昏，他风里来，雨里去，挪借经费，筹运建筑材料，指导设计施工，排除各种困难，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为着桃中的存在和发展，茹苦含辛，日夜奔劳着。

我们的老校长，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爱国主义者。

疾风知劲草 危难识高贤

1937至1940年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桃源女中的同学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我们的老校长和全校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习努力，思想活跃，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这对当时民智的启迪和社会风气的转变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是，桃中的进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8年秋，武汉失守以后，抗战形势更加艰巨了，国民党反动派却反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秘密制定“防止异党活动”等防共、反共、溶共措施，甚至发动武装进剿。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陈兵20余万，进攻湘鄂川黔我根据地。他们安置了七个宪兵团在湘黔公路上，辰溪就有一个兵团，团长李楚藩。因此湘西及辰溪的形势随之逆转，桃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在老校长和进步力量的团结斗争中，挫败了宪兵要搜查桃中的阴谋，掩护了进步教师、地下党员向光涟的出走，撤除了反动军训主任杨长高的职务，也曾和桃中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杨一农开展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等等，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1940年以后，敌人更变本加厉地派遣特务、密探，国民党秘密监视桃中的进步活动，造谣威胁“桃中赤化了”、“要抓△△△”、“要抓它一大批”，“向绍轩是汉奸”、“是共产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辰溪的反动派要向我们开刀了。

1940年6月中、下旬，正当我们毕业考试刚刚结束，学校里突然接到辰溪县党部的密令和黑名单，谓陶蒲生、丁时进是异党首要分子。向校长迅即告知陶、丁，示意赶快离校。于是，陶、丁在进步老师孙国华的掩护下连夜离开了辰溪，避免了危害。随后，向校长又顶住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亲自与辰溪县党部书记长杨兵高协商，（杨曾是向校长的学生）以办“妇女训练班”为名，符保护青年之实。他老亲自搬到县党部和这一批“异党和异党嫌疑分子”（共约十五人，其中有地下党员李大信、田楚明、顾碧仙、陈人瑾、吴家清、卓尚政、谭承辉、陶舜生，非党群众刘惠芳、唐家英、黄海冬、杨玉润、蒋盛璋、赵慧修）朝夕相处，白天给同学们讲授《大学》，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晚上，跟同学们在一起备课、闲聊、吟唱“借东风”等。同学们睡在楼

上，向校长就睡在楼下一间小房里。向老说：“这样安全些”。最后，向校长担保这些学生是爱国青年，不是“异党分子”，没有参加“异党组织”。向校长的威望和正义，迫使杨兵高接受了他的担保。一个月后，这些学生被无罪释放。

桃中出事后，向校长被省教育厅调离桃中（实系撤除桃中校长）。向校长决定去重庆，同学们送他到车站，祝他老珍重。他老满面笑容，精神矍铄，爽朗地说道：“在我的脚下，路都是弹簧”。这是多么无私无畏富有哲理的教导！

向校长到达重庆后，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担任特约编纂，对我们桃中同学的爱护和帮助，一如既往。1943年初，我到重庆想找机会去延安，因为党的关系未联系好，我便决定暂时工作，准备升学。我找到向校长，他即介绍我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为他抄写《易经》注释，向校长对我倍加爱护，尽量使我有充分的业余时间自学，亲自为我补习英文，后又介绍我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为我补发毕业证书，鼓励我升学深造。1944年秋，我终于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向校长对一大批桃中同学，如蒋盛璋、张郁明、辛玉玲、张迺、向建华等等，都竭尽全力帮助她们升学和深造。在向校长的指导和关怀下，他们有的考入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有的考入社会教育学院……，前后约有好几十个人，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继续深造和从事革命工作。向校长这种爱护青年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向校长还有一件重大的义举，是我直到1970年后才比较清楚的。大概是1971年，我和涂西畴同志（原湖南大学副校长，后来是湖南财经学院院长、顾问、教授）先后被解除了“文革中的专政”，彼此谈到抗战期间辰溪的地下斗争。涂老讲起了向绍轩先生与陈策同志的深厚友谊。涂老说：1938年，我在辰溪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抗日武装。是年秋，辰溪县筹建抗日自卫团，县长朱毓麟兼团长，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梁克武兼副

团长，陈策任专职副团长。陈策是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曾随贺龙参加北伐和长征。1937年，又是贺龙元帅派遣他回辰溪。他回辰溪后，地下党要他打入自卫团任专职副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是负军事实责。许多人都在争，因为得到复庵（即向绍轩）的提名推荐，向复庵在辰溪声望很高，他一提名，许多父老都附和，便顺利成功了。1939年4月，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加封宪兵十一团团团长李楚藩为辰溪警备司令，4月底李就以警备司令部名义召开会议，诬陷陈策同志“私卖军火”，将他扣押入狱，判刑15年。在这个危急关头，又是复庵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亲戚关系，多方奔走，出面保释。策老说过，复庵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已意识到他是共产党人。但是，复庵却敢于向李楚藩说硬话：“陈策不是共产党人，我愿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陈策同志才得以安全出狱。这对涂西畴和其他有关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由上可见，向老保护桃中进步同学，推荐并保释陈策同志，都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之时，他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身为国民党人，却敢于挺身而出，申张正义，力挽狂澜，为共产党人说话，就是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殷切地期望祖国的复兴，民族的振奋。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抗日的力量，他对国民党顽固派那种“抗日爱国有罪，反共灭共有功”的逻辑十分痛恨。因而他能临危不惧，见义勇为，铁骨铮铮，威逼敌人。向老先生平时待人处事，谦和容忍，但一遇大是大非，他那凛凛的浩然正义便勃然而发。疾风知劲草，危难识高贤，正是我们的老校长的高尚品质的写照。

共产党一位难能可贵的朋友

向绍轩先生在几次国共合作时期都表现是我党的好朋友。

现在，向老先生逝世已经40多年了，师母亦于解放初病故。独生子向祖钰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学习桥梁工程，迄未回国，据说五十年代病歿海外。为了纪念他，研究他，谨就所知有关他的一生的一鳞半爪的情况简介于后。

向绍轩，字复庵，湖南辰溪县石碧乡向家人，1887年生。1908年毕业于湖南经正学堂（即明德学校，经正与明德是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二班，旋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以后公费留学英国专攻经济学。191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回国后，先任湖南明德学校专门部主任，1919年春以后历任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教授，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江苏省教育厅科长；1938至1940年回湖南任省立桃源女中校长；1941至1945年任四川北碚国立编译馆特约编纂；1945年任湖南大学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冬至1946年5月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同年5月19日不幸因车祸逝世。

向绍轩先生思想开明，品德高尚，对政治经济学及中国古代经史百家学说很有研究，可惜著作尽皆散失。

据说向绍轩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与我党一些同志关系密切，早年与林伯渠同志友好，以及与我党地下党员张裕卿更是莫逆之交和姻亲。1926至1927年北伐战争时，曾在贺龙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与贺龙关系很好，交往密切，因而受我党的影响较深。抗日战争时期，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不畏艰险，保护进步力量，是国共两党之间一位难能可贵的好朋友。

向绍轩先生的生命是伟大的，他留下来国共两党合作共事、肝胆相照的精神永放光芒！

《力报》在沅陵始末

冯英子*

1943年的秋天，我在江西吉安接到严怪愚的来信，说《力报》决定在沅陵复刊，要我赶去担任总编辑，他对我说：“邵阳之约，不可爽也。”原来1940年时，我们一起在邵阳办《力报》，这年5月，《力报》为湖南省政府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八个字的莫须有罪名封了门，还逮捕了康德、严怪愚和我三人。我和严怪愚出狱后分别的时候相约：只要《力报》有复刊的机会，我们不管千山万水，一定来为它工作。他对我说的八个字，就是由此而来。

原来那年春天，严怪愚到了沅陵，碰到了朱德龄、李宗理、陈永言等人，朱是长沙的老报人，此时避难在沅陵，办了一个群力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有浇字设备，有对开手摇机，可以印刷对开报纸。李宗理、陈永言都是严怪愚湖南大学的同学，此时李在沅陵作税务局局长，出点钱不成问题，陈则在沅陵大街上作民众戏院的经理，在沅陵的社会上很吃得开。严怪愚把这些条件揉合在一起，有人出钱，有人出印刷，办一个报就不成问题，于是他们决定在沅陵出《力报》，当时议定，由李宗理作董事长，朱德龄作社长，严怪愚作副社长，陈永言作总经理，约我去作总编辑。

这时我在吉安也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1942年我到吉安不

*冯英子当时任《力报》总编辑。

满一月，即被中统特务非法捕去，虽然一个月后放了出来，但特务经常来“拜访”我，使我天天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到1943年的夏天，他们改变了方法，想拉我去江西民国日报作总编辑，委以高官，许以厚禄，明拒不行，当然最好是悄悄地溜掉了。怪愚这封信来得很及时，我什么也不去考虑，毅然首途。

那年秋天，我从江西吉安到泰和，经界化陇而到湖南耒阳，再到邵阳，沿湘黔路到达雪峰山畔的安江，再从安江搭一条木船，沿沅水东下，约莫跑了两三天时间，才到达沅陵。那时已由陈永言负责，在教场坪建筑一幢五开间的报社，我到的时候，建筑已将结束，报社大体的筹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

沅陵《力报》于1943年6月出版，日出对开一大张，我为它写了《发刊词》，我们把这个报当作邵阳《力报》的再生，我的发刊词重要也在说明这一点，而且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义，把副刊定名为《草原》。当时除我担任总编辑外，编辑部人员中，有蒋用宜、孙雪舟、周艾从、朱果毅、陈伯谅、周汉萍、柳嘉禾、崔傅耿、郭静、张良和、程扬周、王星池等人。蒋用宜是怪愚湖南大学的同学，能写新诗，他是江西铅山蒋士铨的后人，家学渊源，严怪愚请他来编副刊；孙雪舟是上海来的流亡青年，排字工人出身，艾从、果毅从芷江的《中央日报》转来，果毅是朱德龄的公子，崔傅耿原来是溆浦公安局的一个警官，看到《力报》之后，千方百计丢掉了他那个“官”，到《力报》来了。郭静、张良和则是邵阳《力报》的老人，而王星池却是当地的一个店员，这么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班子，在沅陵办出一张对开报来，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沅陵除《力报》之外，还有三家报纸：一家是从长沙迁来的、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由吴忠亚作社长，吴忠良作经理，日出对开一大张，社址也在教场坪附近；一家是第六战区政治部办的《前卫日报》，由常健作社长，

出四开一张，社址也在教场坪，还有一家是由中央社沅陵分社社长匡文炳办的《中报》，日出四开一张。《力报》出版之后，由于言论公正，泼辣，言人之不敢言，而且消息灵通，经常登有不少著名人上的文章，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每天的发行数量竟然超过了四千份。在当时沅陵各报中，取得了比较特出的成就。

我说《力报》常登著名人士的文章，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力报》出版之前，我去了一次桂林，向当时在桂林的朋友索稿，不久，柳亚子先生即给我写了一首长诗，我把它登在《力报》的副刊上了，这首诗如下：

“苏州旧府属县九，	吴江吴县联文酒。
天平邓尉好湖山，	垂虹钓雪钟灵秀。
万里从亡吴县冯，	一朝来访吴江柳。
为道江城陷落初，	同仇奋臂争成偶。
何意中朝党论纷，	宋家炎绍而今又。
晚节披猖程万军，	先几早识仇非友。
间关辛苦走渝都，	报国何曾分左右。
少年英绝总输君，	老马识途吾岂叟。
君今奔走已七年，	主持舆论功勋茂。
创刊力报始长沙，	一炬无端易星斗。
鼎足三分魏蜀吴，	诎比陈思泣箕豆。
邵阳衡阳复桂林，	不信弟昆异肥瘦。
姚王监谤尚年年，	邵阳寿命怜非久。
却看薪尽火还传，	沅陵又继邵阳后。
正统由来天命尊，	安回衡桂争身手。
余脉还看衍芷江，	湘水黔山得地厚。
君今远来索我诗，	我诗近被人欺负。
花影入帘崔护桥，	蚍蜉撼树杜陵寿。

绝倒葬都十七郎，痴心我尚恋窗牖。

谤议纷纭一任它，酒酣耳熟诗神吼。”

这首诗，柳老既写了我的历史，也写了《力报》的历史。我们原来打算在芷江也办个《力报》的，所以他诗中有“余脉还看衍芷江”之说，可惜后来因为形势变化，这个想法落了空。不过由柳老的诗，可见《力报》当时极得文化界朋友的支持，我们也很想尽其全力，在沅陵打出一个天下来的。

沅陵《力报》一出版，如当年的邵阳《力报》一样，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它的言论常为重庆的《新华日报》所转载，引起了蒋介石侍从室的注意。有一次，《新华日报》转载了沅陵《力报》一篇题为《拖不得》的社论，蒋介石竟然指示陈布雷，下令查处（此事后见于敌档）。但是，为什么在沅陵这个地方，《力报》能存在和发展呢？这里，不能不讲一讲它的背景。

沅陵这个地方，虽然是上湘西的首府，但一般说来，同国民党当时的陪都重庆，相距遥远，有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地方势力对于国民党中央，中间似乎隔着一层，因此地方点了头的事，国民党中央也只好眼开眼闭，任他自流，这就使得在沅陵办报，有相对的自由。其次，沅陵《力报》创刊之初，以李宗理为董事长，这不能不是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李宗理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他原先在芷江的补训处作处长，他有一个哥哥叫李宗溥，是沅陵的税务局长，此君挥金如土，一掷千金无吝嗇，有一年忽然得暴病死亡，谁也不知道这个税务局长亏空了多少公款，谁也不敢去补他的缺，这时有人想到了李宗理，他们既是弟兄，由弟弟补哥哥的缺，顺理顺章，真是竟有富贵逼人来，李宗理一下弄到了这个肥缺。原来沅陵的税务局，管十三个县的统税，十三个县的税收人员，有三百多人，李宗理对每一个卡子采取包干的办法，即这个卡

子，规定每月交多少税收，余下全归税员所有，他也不再付任何工资和办公费用，这样，十三个县三百多人的工资，就由李宗理一个人饱入私囊，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再者，下面交上来的税收，李宗理扣着不上交，把它囤积物资，半年以后变卖了物资再上交，那就是他得了大头，国家只得个零头。光这两笔钱，那个税务局长油水之足，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李宗理的官虽不算高，但钱却是很多很多，有了钱，当然就有说话的地位，报纸上出一点小小的纰漏，当地自然也只能眼开眼闭了，那时沅陵新闻检查处的处长叫周幼襄，此人对工作也只是得过且过，有一次他同严怪愚说，你们《力报》的颜色太红，是不是写篇文章骂骂共产党，表个态。怪愚把他的活转告了我，我说骂共产党，不是破坏了国共合作吗！我在的时候，不能做，将来我走后你们再去办吧。周幼襄看我们没有动静，也只好算了，后来碰到我时，依然嘻嘻哈哈，不提此事了。

1943年的冬天，湘西的“土匪”闹得很凶，其中有一个叫彭春荣，因为面孔很长，绰号叫“叫驴子”，听说手下有三五千人，有一次写信给永顺的专员仇硕夫，说明他们几月几日要进城，叫仇回避。据说仇果真走了，彭春荣进城之后，开仓济民，做了几件好事。而且传说他的部队纪律很好，从不扰民。那年冬天，他们到达距沅陵十五公里处，有进窥沅陵的企图，人心惶惶，达于极点，我写了一篇社论，说为什么土匪多，实在因为高球之类的官太多了，民不堪命，不铤而走险怎么办？这篇社论登出之后，沅陵的县长白纯义大为不满。李宗理知道之后，有一天在他家里请客，白纯义和我都在座，席间，李特别替白和我介绍了一下，指着我对白说：“这就是我们的总编辑，请多多照顾”，白也只好打几个哈哈，不提此事了。

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和人事条件，使《力报》能在沅陵这个地方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但是李宗理对报纸的经济支持中

竟有个限度，而在内地办一张对开报纸，尽管发行超过四千份，仍不足以自给自足，在不断亏本，不断要求李宗理支持的局面下，首先引起了李宗理的怀疑和不满，先是对陈永言，后来是对朱德龄。陈永言是沅陵民众大戏院的经理，按理说，这样一份工作如在地方上没有实力，是难于担任的，但陈却是一个白面书生，而且还有点公子哥儿的样子，原来他的妈妈，原是凤凰县的“风头大姐”（一种帮会的首领），他只是得着妈妈的一点荫庇而已。他是《力报》的总经理，《力报》不断亏本，他不断向李宗理要钱，于是首先引起了李对他的怀疑，怀疑他在经济上有不可靠之处，陈一怒而撒手不管，在龙头井那里盖了一座小屋，取名“晦庐”，韬晦养性去了，跟着是李怀疑朱是否有什么问题。而在这中间最为难的是严怪愚，这个班子是他揉合在一起的，一旦发生裂痕，他怎么办呢？严怪愚的法宝是“回家”，他回到邵阳去了。于是真正留下来的只剩下朱和我两个人。我是一个职业新闻记者，只要报纸还能出版，就要想法顶住，好在李宗理对我还比较放心，因此后来我既是《力报》的总编辑，也是《力报》的总经理。几乎一个人顶住了这份报纸。

大概是1943年底这一段时间，是《力报》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印报的纸张，差不多到前一天的下午才能弄到，每天清晨，烧饭的师傅把我叫起来要当天的菜钱。我每天下午下山（因为校场坪在山上，而营业部在大街上）张罗纸张伙食，晚上则在编辑部值班，看稿子、写言论，而刚刚睡下去，烧饭师傅就来叫我了。那时报社中上上下下都是穷光蛋，而抗战后期的伙食又特别坏，米中尽是石子和谷粒，饭菜中则连一点油水也没有，幸而附近有一家叫“小乐意”的饭店，老板是无锡人，老板娘是南昌人，我很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样子，常常去光临它，而且也总是欠账，久而久之，编辑部中的人，十个有九

个都是他们的主顾了，每月发工资的时候，老板娘就来收欠帐，工资的十分之六七，都变成“小乐意”的收入。

有时编辑部的人，弄一包花生，几只桔子，一瓶老酒，消磨二三个小时，就是最大的愉快，不过那时谁也不觉得什么叫穷，因为大家差不多，半斤八两，我这个作意编辑的，也不比谁阔绰，抗战么，不应该这样么？相濡以沫，相贱以气，尽管这个生活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来，仍不胜神往。

大概到了1944年的春天，李宗理约了严怪愚和我，决定另外去筹备一家《中国晨报》，商定把《力报》交给朱德龄一个人去负责，这样，我才结束了在沅陵《力报》的工作，不过朱德龄先生仍要我挂一个副社长的名义。抗战胜利之后，沅陵《力报》迁回长沙出版，我仍是他的挂名副社长。

李宗理在沅陵时，先是住在沅陵大街上，民众大戏院的对面，后来因邻居失火，搬到沅水对岸靠近酉水的太常村，再后来又搬还沅陵的龙头井。抗战胜利后，他搬回长沙，在上麻园岭造了幢很漂亮的房子，而且利用《中国晨报》叩开了王耀武的大门，弄了个“立法委员”。这些因与沅陵无关，我不写他了。

回顾《新潮日报》

曾楚樵*

《新潮日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湖南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它拥有一批富有经验的专业报人，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编辑部集合了一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多数为地下党员。印刷工人中地下党员亦复不少。在大家协同一致的努力下，报纸自然显示出特色，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但《新潮日报》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霍揆彰投资创办的。霍是职业军人，对报社的工作，起初掌握颇紧，唯恐大权旁落，以后却很少过问，越到后来竟至失去了联系，正是所谓“一紧二松三不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霍揆彰本人的职业有关，有点鞭长莫及；而办报本是一件赔本的事，为避开经济负担，他也就只好不闻不问了。

然而霍揆彰这块牌子对报纸的生存却起着作用。在当时那种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这块牌子与没有这块牌子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报纸还是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警告，处境相当危险；再加上战争和经费的危机，它竟至两度被迫停刊。报社工作人员始终同心协力，坚持在艰难困苦中求生存，前后历时将近十年之久，实在是很难得了。

回顾《新潮日报》的历史，如按“所在地”来划分，则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常德阶段、沅陵阶段和长沙阶段。我

*曾楚樵当时在《新潮日报》两度任职。

在《新潮日报》是两进两出。头一次是1943年的上半年在常德，到报社做过两个多月的新闻编辑；第二次则是1945年夏至1947年6月，开始是在沅陵参加复刊的筹备工作，以至正式复刊，然后迁长沙，从编辑、记者到经理，各类工作无所不为。两次加起来不过两年多一点，而《新潮日报》的三个阶段，可说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作为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歇脚点，四十多年前的许多耳闻目睹的旧事常常萦绕在脑际，而且时间愈久愈觉分明。现在写下来，或许有助于关心“新闻史”的同志作些参考吧。

霍揆彰资助 创刊于常德

《新潮日报》以1939年冬创刊于常德。具体的月日，已无资料可查。其时，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驻防洞庭湖滨湖一线，总部设桃源县城郊。这个集团军的代理总司令霍揆彰（1941年秋正式任“总司令”），为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决定在常德创办一张报纸。考虑到主客观条件，先以四开发行。起个什么报名？经“智囊”们研究，鉴于霍的基本部队是国民党的第五十四军，霍已在南岳创办了一所中学，用了“五四”这个番号，叫“五四中学”，而五十四军的“五四”又与五四运动的“五四”有着奇妙的巧合。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不是出版过《新潮》杂志吗，借用一下何妨？“新潮报”（最初无“日”字）这个名称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要办报，得先组织一个班子。起初以为只要有“笔杆子”就可以了，于是从总部调集了几支“笔杆子”。谁知这些先生写个公文、做点应酬文字不在话下，而要办报，谈何容易！报纸发行了几个月，当然难于形成气候。

恰在这时，原《北平新报》总编辑黄定戎先生从华北辗转

回到了湖南。黄从学生时代起，就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国内新闻界同行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年龄不过三十多一点。他回湖南后，仍不离本行，在长沙继续与朋友们合办过几种抗战周刊，但都因经费困难而一一夭折了。国民党中央社驻霍揆彰总部的特派员丁继昶，与黄相识。为了让《新潮报》走出困境，丁向霍推荐了黄，这样，黄便于1940年春，来到常德，就任了《新潮报》社长。

黄到任后，面临着一大堆难题。首先是要组织编辑部。幸好黄在《北平新报》的同事洪君实也已回湘，便把他请来担任了总编辑。另在当地物色了几位有志于新闻工作的青年，其中之一便是田心洁。田是文学爱好者，诗歌、散文、小说都颇擅长，常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作品。于是让他出任了副刊主编。另一位是文杰，他熟悉地方情况，便任外勤记者，专负责采访本市新闻。原有编辑人员有留有去。加上校对人员，就这么七八个人搭起了一个编辑部。经理部怎么办？霍揆彰早已派了他的堂弟霍仲华任经理，寓大权不可旁落之意。而其实，报社经理工作未必是霍氏所长。所以，例如发行工作，是报纸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印刷厂工作的好坏更直接影响报纸的出版，这类管理工作仍得黄定戎亲自过问。最棘手的问题是，报社原设市内大高山巷，每天都受着敌机的威胁，一日数惊，以致难于保证正常工作。幸而黄定戎有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老同学张杰先生在城外的“三间港”（相传三间大夫曾流放到此），有幢木质结构的私人住宅，相当宽绰，便以其中的大部分房屋无偿借给报社使用，而他自己一家却局促于一隅。这幢住宅位于一片小小的高坡，周围绿树成荫。宅前是一条曲曲折折的港汊，终年积水很深，不涨不落，又不见流动，宛如池塘一般。“三间港”之名大约即由此而来。再外围便是广阔的农田了。张杰先生此举非同小可。抗战时期，常德被频繁

遭敌机狂轰滥炸（还不包括以后的“常德会战”所造成的破坏），到处是断壁残垣，疮痍满目，而《新潮报》的人员和器材设备得以幸存者，不能不说与张的慷慨相助有关。张杰留学法国，一度任常德县中校长，不涉仕途，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在常德这样的小地方，报社人力物力又如此艰难，报纸要办出一点特色是很不容易的。就以新闻来源说，除每天由电台收录“中央社”电讯外，就再无别的渠道，当然谈不上向外地派驻记者。唯一可以使力的地方就在副刊和地方新闻。多亏副刊主编田心洁和外勤记者文杰，以他们勤奋的工作为报纸赢得了读者。副刊搞的是文艺，在田心洁主持下，稿件竟能源源而至。记得曾以《暑假生活的回忆》为题，举办了一次中学生征文比赛，来稿达一百多篇，优胜者除在副刊上辟专栏发表外，另寄赠一二个月不等的报纸作为奖励。此后，报纸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生活的报导，在中学生中赢得了大批读者。地方新闻也是不易写的，动不动会造成麻烦。好在有霍揆彰这块牌子，真正引出麻烦的事并不常有。对于“中央社”电讯，尽管无法改动，但仍有选择、删节的余地，从中体现出编者的独立见解。特别是新闻标题，更可以由编者独运匠心。例如抗日战争中，“中央社”讳言：“撤退”，而用“转进”，即掉转枪头前进。这明明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遇到这种场合，便在标题上动点手脚，例如在“转进”二字上加个引号。

电台的工作相当出色。报务员仅二人，轮流当班，每人每天要收几千字的新闻稿。他们记录时甚至可以不计电码，而直接记成汉字，省去转译之劳，其熟练程度有如此者。

报纸的发行工作主要由涂建陶先生经管。他是常德人，学徒出身，熟悉印刷业务，又了解地方情况。在他和几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除本市外，发行网遍及滨湖各地。如安乡、澧

县、华容、南县、临澧、汉寿以及津市、注滋口等处都设有分销处，甚至远及湖北的百首、公安。总发行量最高突破一月份，这在当时要算是非常可观了。

报社的印刷厂虽极简陋，但设备仍较齐全。有铸字炉一座，除一号、大号、特号字需木刻外，二号以下都有铜模，只是缺字不少。有对开、四开、圆盘印机各一台。此外就是一间排字房。全厂印刷工人不过三十多人，由吕尧臣、杨吉新两位分任机房和字房班长。他们和工人一起，担负了繁重的印报任务。特别那时没有电力，一台对开机全靠人力摇动，其辛苦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了。

印刷厂对外也办理印刷业务，在大高山巷旧址设营业处，承印各类表册之类，增加一点收入。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难岁月里，报社居然做到了自给自足。

除《新潮报》外，常德还有一家名为《民报》实为官报的国民党党报，由国民党常德县党部主办，也是四开版。与《新潮报》相比较，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正当《新潮报》初步站定了脚跟的时候，霍揆彰忽然变了脸色。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他担心黄定成不好驾驭，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猜疑。黄是个正直的人，眼见处境不利，便断然于1943年夏借故请辞，他这一走，以洪君实为总编辑的编辑部也相继解体。至此，《新潮报》便岌岌可危。

但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当时沅陵省立第九职业学校校长陈云章先生早有办报的念头，得知《新潮报》陷入危机，便找霍揆彰商量，愿适当投资，充实人力物力，改四开为对开，希望办成全国性的报纸。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自然得到霍的支持。于是商定由陈云章先生兼任社长。经过紧张的筹备，在短时间的休刊之后，一张以《新潮日报》四个字为报头的对开报纸，又以新的面貌于1943年秋在常德重新发行。

此时，报社扩大了规模。城内大高山巷旧址整修一新，报社的工作重心又回到了城内。与此同时，组建了一个新的编辑部，以老报人陈楚先生为总编辑，人员增多，内部分工也较为细致。

但事与愿违。报纸改版不出半年，日军于11月份南犯滨湖地区，南、华、安三县相继沦陷，常德告急。这时，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负责守卫常德，表现了较高的抗战意志。《新潮日报》在战火中一面坚持出版，宣传抗战；一面大力开展支援前线的活动，鼓舞士气。例如报纸曾以“不让他们通过”为题，发表社论。这个题目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凡尔登保卫战的一句著名口号。这张报纸一次加印了三千份，很有影响。报社又大力组织慰劳前线官兵的募捐，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有一位安徽籍的王姓小青年，以擦皮鞋为生，也亲手把他的五十元积蓄送到报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打胜仗，好早日回安徽老家去。”对这样感人的事例，报纸都及时作了报导，写了评论。为了在工商界及其他上层人士中募集捐款，报社还专门在“常德剧院”举行了有各界人士应邀参加的“义卖”大会。会上，陈云章社长手持事先精印好的报纸，慷慨陈辞，以“劳军义卖、慷慨输将、弦高遗风、功在抗战”十六个字相号召，一时应者四起，以一百元认购者有之，五百元者有之，一千元者亦有之，而常德被服厂厂长杨隶文先生独以五千元认购，达最高额，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会上还约请了戏剧界一些知名演员如京剧青衣陈梅艳女士等参加义演，一些中学生也应邀演唱救亡歌曲。对这次义卖活动，报社记者柳嘉禾先生以《义卖记》为题在报上作了生动的描述。总计这次募捐活动，共集资二十七万余元，由报社同有关部队购买了大批实物，分发到了官兵手中，使他们受到鼓励。以后的常德保卫战是逐街逐巷进行的，终致弹尽援绝

而失守，但在战斗中确实不乏英雄牺牲的感人事例，而这与报社的工作，常德市人民的积极支援不无关系。

有一件往事值得一提。常德会战正值开罗会议召开之时。会上，美国总统罗斯福问蒋介石：常德城能守住吗？蒋答：“守城将领是我的学生。我平日教育学生精忠报国，不成功，便成仁。”常德失守，余程万既未“成功”，又未“成仁”，给蒋介石造成了难堪，所以他一回国，一气之下，便下了“逮捕法办”令，余程万被关进了重庆土桥军事法院的陆军监狱。陈云章社长考虑到余程万的失败有其客观原因，曾面晤重庆《大公报》的王芸生先生，反映意见。王对余程万亦深表同情，便亲自撰写社论，为之鸣不平，其中有云：“苦守常德城的余程万师长尚身系囹圄，而轻失桂柳的将领，竟逍遥法外，事之不平，宁有如此！”藉助舆论之力，余程万终于获释。

11月中旬，常德会战发生，报社只好仓皇停刊。所幸经陈云章社长及报社职工多方努力，将报社全部器材安全撤退到沅陵。

沅陵复刊到迁离沅陵

如果单从时间上看，《新潮日报》从在沅陵复刊到迁离沅陵，总共出刊不过四个多月，值不得当作一个阶段看待，但，第一，如本文开头所说，按“所在地”而言，沅陵的确留下了报纸的足迹，需要加以介绍；第二，这四个多月恰好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具有关键意义；第三，这段时间报社人事易动较大，有值得一书者。因此，只好不厌其烦，缕述如下：

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沅陵作为湖南的后方城市，人文荟萃，颇集一时之盛，新闻界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沅陵发行的报纸就有四五家之多，连“中央社”也在沅陵设有分

社，名为“沅陵分社”，实起着“湖南分社”的作用。事实上，抗战胜利后，沅陵分社即迁长沙，改为“长沙分社”。

此时，仍任九职校长的陈云章先生一心筹划着两件事：一是如何运用九职雄厚的技术力量（当时建筑师曾子泉、潘潜、李植基、米谷荪诸先生均在九职任教），为战后长沙的重建作准备。另一件就是恢复《新潮日报》。陈先生实际上是无法兼顾《新潮日报》的工作的，于是将复刊的任务委托给了他的令弟陈述元先生。述元先生从是年春末开始，选了沅陵义仓街的“义仓”为社址，着手筹备，从所里（今吉首）商学院请来了戴淳隆、丁文朴两先生主持笔政，申亚平先生也来编辑部工作。唯总编辑一席不易物色。有了一点眉目之后，便大胆开锣，公然于七月份正式复刊。而实际上，开始阶段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借助于滞留沅陵的新闻界朋友自告奋勇来完成的。他们以满腔的热忱主动承担任务，不取分文报酬。述元先生之“敢作敢为”，新闻界朋友之“见义勇为”，有如此者。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事情果然又有了转机。恰在这时，前任社长黄定戎先生从家乡来沅陵了。陈云章先生如鱼得水，力劝黄先生重返报社主持工作，并征得了远在重庆的霍揆彰的同意。果然霍电邀黄赴渝面商。黄于7月份去渝，由霍提供经费20万元。黄又藉此机会从重庆延请了他的一位老友董祚楷先生一道回沅陵任总编辑。这样，陈云章先生又把《新潮日报》这副担子交回了黄定戎先生。

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全国一样，整个沅陵城万人空巷，欢庆胜利。报纸连续增出号外，人人欣喜欲狂。报社迁长沙的打算是早已定了的。陈云章先生最先回到长沙，征得国民党将领夏楚中的同意，借了他在又一村五垅子一处简陋的、幸免于战火的旧房作为报社的临时社址，然后由报社派人先赴长沙安排搬迁事宜。他们乘汽车取道安江（今黔

阳)过雪峰山,经邵阳抵长沙,老牛破车,走走停停,风餐露宿,全程历时竟达九天之久。一切办理停当之后,整个报社的大队人马和机器设备,便于11月初,由黄定戎率领,买舟东下,由沅江入湘江抵长沙。

在长沙与《晚晚报》合并

抗日战争前后,《新潮日报》虽几经播迁,而它的职工队伍却一直相对稳定。在沅陵复刊之后,常德时期的许多老职工即陆续回社;迁长沙后,原有老职工又都闻讯赶回。只要到印刷厂走一走,就能听到一派常德口音。可见他们与报社都有剪不断的感情。

只有编辑部例外。这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各有各的愿望和抱负,特别是外省人,他们饱尝了八年离乱之苦,回乡心切。因此,抵长沙后,原编辑部人员便都纷纷离去。董祚楷、戴淳隆、丁文朴诸先生先后离去,陈述元先生亦重返高校教学岗位。但另一方面,湖南籍的报人却又从四而八方归来,以此,在很短的时间内,黄定戎先生就重组了以李幻如先生为总编辑的编辑部。傅白芦、周沙尘、傅紫荻、梁中夫、蔡克诚、杨人鸿、龙国屏、唐厚章、罗厚仁诸先生先后加入。人数不多,而阵容整齐;他们在省内外新闻界又广有影响。这样,《新潮日报》的影响力也就大为增强。

但报社的物资条件极为艰困。五堆子这所房子地势低洼(即古之“赐闲湖”地区),阴沟早已堵塞。每遇大雨,整个院子便积水盈尺,几天都难于消退,与所谓“水牢”无异。家属根本住不进来,即职工本人亦难安排住处,只好在先锋厅租一间破旧的楼房作为编辑人员集体的栖身之所;楼下则是一间竹器作坊。吃的除萝卜白菜外,别无他味。尽管如此,从编辑部

印刷厂都无怨言。

到1946年春，霍揆彰买下了小吴门外校场坪东南角上一栋两层五开间的砖木结构楼房，供报社作正式社址，这才改善了工作条件。于是在院内加盖了一间简易的厂房作字房、机房之用；又将霍的秘书颜伯诚书写的报头“新潮日报”四个字放大，雇工装饰在高高的院墙之上。那时校场坪还是一块荒芜的广场，远远望去，这招牌确是醒目而且美观。这样，战后的《新潮日报》才算粗具规模。但这一次便是霍揆彰对《新潮日报》最后一次投资了。此后不管《新潮日报》经济上遇到何种困难，他一概不闻不问。只在1946年夏，张梓敬先生应黄定成先生之请，愿投资合办，霍亦表示同意，便趁霍回长之机，假紫钗路沙利文餐厅设便宴，签订协议，张当即交付了几两黄金。谁知霍忽然疑虑重重，协议墨迹未干又不予承认。交出的几两黄金，便算作梓敬先生的慷慨解囊。

政治与经济确象一对连体的婴儿。霍揆彰对《新潮日报》的经济状况既已不闻不问，《新潮日报》在政治上也就多了一点自由。例如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残酷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新潮日报》便作了如实的报导。而其时霍揆彰正担任着云南警备总司令。又例如湖南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新潮日报》派出记者深入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实地采访，并作了详细报导。所有解放战争中的军事消息，不管“中央社”如何诬蔑，《新潮日报》一律以“共军”、“国军”相称。反映在社论中，则坚持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由此便两度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警告。但他们碍于“霍揆彰”这块牌子，又不便采取断然行动。本文开头提到的霍揆彰这块牌子对报纸的生存起着作用，其意义就在这里。但总的形势始终十分严峻，报社常常处于戒备状

态。特别是作为社长的黄定成先生不得不特别警觉。编辑人员常常进进出出，调动频繁，为的就是应付这种局面。

但报社面临的经济上的困难终于无法克服。报纸的命脉在发行，而战后的长沙仍然是民穷财尽，百业萧条；要扩大发行，殊非易事。当时在城内发行靠的是私营的“派报社”（实为代销点），而外地呢，《新潮日报》最好的依托是原滨湖地区的老订户。经过不断努力，发行量始终徘徊在二千至三千份之间。战后长沙市的报纸如雨后春笋。比较而言，这个发行数字就已经不错了。因此，报社的经费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以致常常发不出工资。黄定成先生不得不四处求援，东挪西借。有时达到版排好了而纸张尚无着落的程度。而彼时国民党热衷于扩大内战，市场物价飞涨，群众生活朝不保夕。虽经报社全体同仁艰苦坚持，终于难以为继。到1947年6月，报纸不得不第二次宣告停刊。

但陈云章先生不愿见《新潮日报》就此完结，决定再作一番努力，希望“起死回生”，此举自然得到原报社同仁的支持。但终因经费筹措非易，最后只好与《晚晚报》合并，改为两报合刊。这固然反映出两报的融洽无间，但终归是我国新闻史上少有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在旧中国，许多新闻工作者虽希望做点事业，但处于那样的社会环境，只能望洋兴叹。

中共湖南省工委系统解放前夕在萍乡城区的斗争

傅白芦*

解放前夕，战斗在萍乡城区的地下党组织隶属于湖南省工委系统领导的部份，在建立、发展地下交通线，团结、教育、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矿，迎接萍乡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然而，在“文革”期间，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把这个地下党组织视作“黑线”、“黑窝”，把参加地下斗争的同志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来自南昌、宜春、萍乡、高坑的外调人员，三番五次地勒令我“交待”萍乡解放前夕从湖南去的地下党的活动情况，这就迫使我作过一些系统的回忆。现按照当年外调者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结合最近几年得到的可信资料，将残存的一此“交待”材料稍事整理如下。由于时间久远，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有些事情是还有待于当时亲历诸事的同志为之纠谬匡误，补苴罅漏。

“你是怎么回到萍乡来的？”

1949年4月，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在解放军行将渡江的

*傅白芦当时受中共湖南省工委委托在萍乡城区从事地下斗争，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总编辑等职。

形势下，移驻湖南。长沙面临黎明前的浓重黑暗，一场血腥镇压很快就将来临。党组织通知我暂时隐蔽。考虑到能够进退自如，经组织同意，我先去醴陵。长沙如工作需要，可以立即赶回，如湖南情况更紧，可以去江西萍乡老家。

4月17或18日，我到达醴陵湘东中学肖项平（炳实）家里。

肖项平，萍乡上栗市人。我和他相识于1946年初的回乡期间，当时他在萍乡中学教书。据弟弟紫荻和在萍中初中教英语的周吼生（均为萍中进步社团长江文艺研究会会员）告诉我，肖是萍中进步教师的优秀代表，和孟琦、孟文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英语极好，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过，此时已失掉了党的关系。我表示，很愿意结识。不久，吼生陪同他来我家里，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我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并将带回来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印刷品以及我们在长沙编辑出版的《人民世纪》周报送给了他。自此，我一直很尊敬他，经常联系，并以师事之。解放后，李立三邀他去北京全国总工会负责全国教育工会的工作。去年，读曾雍大姐的《只身入虎穴——记刘思慕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一文，才知道1935年在上海发生的轰动中外“怪西人案”中，思慕就是经肖介绍参加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肖当时是远东情报局上海站中国方面负责人。记得夏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曾说到，三十年代周恩来也和他谈到过肖炳实。可见，紫荻他们对肖的情况的介绍并非虚妄。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向中华书局的朋友打听肖去世前在书局任副总编辑时的情况。他们说，这位老同志在书局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趁此机会，建议萍乡广为征集资料，替他写一篇传记。因为这样的同志才是值得永久纪念的。1946年上半年，长江文艺研究会在他的指导下，出版了大型墙报，大概取名为《每周文

汇》吧，主要转载我所供给的党领导的进步刊物的文章，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但触怒了学校和地方当局。这年暑假，紫荪被勒令退学，肖也被迫离开萍中转到醴陵。1948年下半年，余志宏来《晚晚报》找我，说他曾回醴陵，了解到肖项平很不错，作过接触，但肖对他似有戒备，不愿深谈，要我写个信介绍他再去见面。我遵嘱写了信，记得其中有云：“志宏兄系弟子挚友，可作推心置腹之彻夜谈也。”大概不久，肖接上了党的关系。因此，1949年4月我到醴陵时，他以为我是省工委派去的，问我要组织关系。我告诉他，是暂时隐蔽，未带关系。他还说，你的老朋友孟树德也在这里。

孟树德，的确是老朋友。1946年春夏之间，我们曾在邵阳昭报共事，他是采访部主任，我是编辑部主任。此前，他曾向《人民世纪》投稿，给我留下过较好的印象。昭报共事时也相处得不错，因而知道他参加过党，后来失去了关系。昭报被国民党查封后，他去中央日报湖南版作农村特派记者，我去《新潮日报》做主笔。我曾向地下党的同志介绍过他和他的妻兄余志宏的情况。1947年下半年，长沙市工委的官健平向我表示，希望和孟、余认识，要我和他们商量并约定时间，以后又由我带官同往余的住处见面谈话。1948年九十月间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和晚晚报副社长康德先后告诉我，国民党省党部对孟甚为注意，以离开长沙为妥。我报告了党组织并通知了孟本人，因此，孟于10月撤离长沙。1948年底，我参加长沙新闻界粤港访问团去广州、香港采访，华商报的同志和病居九龙的蒋牧良说，孟在九龙一家医院割“盲肠”，我曾和李冬阳一起去看他的病。他大概是1949年2月到醴陵住在东乡他岳家的。

4月我到醴陵时，由于肖项平在当地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有威信，对醴陵情况较为熟悉，党组织的主要工作似由肖在处理。大约过了几天，孟从萍乡回到肖的家里找我，于是重逢。可能

是肖和他已经商量过，都希望我留在醴陵协助工作，我当然是同意的。由于我未带组织关系，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他们又为我办了一次入党手续。

他们委托我的任务是两条：一、建立从萍醴边的金鱼石经萍乡湘东、萍乡城区到高坑萍乡矿务局的地下交通线；二、在萍乡城区开辟工作。因是，我在醴陵逗留时间很短，仅在湘东中学进步学生的一个小规模集会上作过一次形势讲话，之后，即于4月21日我军渡江后的两三天内，回到萍乡城区的家里，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长沙的同志。

“你们搞了些什么事？”

（一）关于建立地下交通线。

我先去醴陵王仙，在距离湘东也不远的金鱼石找到了文光绍。文原为萍乡中学学生，是肖项平发展的党员。当时在王仙的一个小学里教书。我和文沿着萍醴两县，亦即湘赣两省的交界地段“散步”观察，觉得在这种边界地区活动很方便。因此商定由他在这里建立一个工作点，开展党的活动，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传递情况和文件，接待萍醴两地过往的同志。文光绍介绍了他的一个要好的萍中同学，名叫刘天泉，住在青山埠。

我去了青山，找到了也在小学教书的刘天泉。根据文介绍的情况，我们有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后来又从侧面了解，他确有进步要求，对国民党统治不满，为人沉着，和当地群众有一定联系。因此，又到 he 家里为他办了入党宣誓手续，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大体是：广泛搜集社会特别是水口一些煤窑的情况；设法掌握学校的刻钢板、油印的全套工具，为印刷文件、传单作好准备；在煤窑工人和附近农民中交朋友，开展形势的

宣传教育工作，传递从金鱼石来的消息和文件，向湘东方向慎重发展组织，等等。并且告诉他，暂时和我单线联系，以后俟情况发展再定归属。

在城区，则将我的家作为交通联络站。

设置在高坑的萍乡矿务局里，大约早在1948年的八九月间，已由湖南省工委派去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是郭昌荣，是作为湖南大学毕业分配到泉江电厂工作的。还有一位彭甲，是省工委委员刘亚球将他从湘潭转移到安源做工的。他们已在矿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孟树德在1949年4月初和郭昌荣取得了联系。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就是为了通向这里。5月下旬，孟第二次来萍乡，我们一起去高坑找老郭。到高坑后，我发现了新情况：军统赣西站负责人刘炳光兼任矿务局子弟学校的校长。这说明军统的黑手早已伸进矿区。刘在萍乡一向以从事小学教育掩盖其特务面目，对萍乡的老人说来本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外地来此工作的人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知道其底细。这对于我此后与郭等的联系带来了不利。我当即向孟、郭等通报了这一情况，希望他们提高警惕。考虑到孟、郭等的安全，当晚我以探访老友为名住到子弟学校老师汤楚和那里。此后，矿区同志可去城区找我，我就不到矿区找他们了。无论从当时说或从现在看，这样做是必要的。

这样，交通线的建立任务算是基本完成。以后，醴陵县工委成立，省工委派出的组织员（或联络员）游德优，就是在这条线上活动的。

（二）关于城区党组织的工作。

1、建党。由我直接发展的党员，除前面谈到的刘天泉外，还有：周以存，四川人，武汉大学毕业，在学生时期曾与党有关系，当时是鳌洲中学的进步教师，1947年或1948年，我们已经认识，我对他已有所了解。李汉华，醴陵人，萍中高中

毕业，后在华中艺专读书，在武汉时已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时已在萍中开展进步活动。张学棣，萍中高中学生，当时已和李汉华一起在学校开展进步活动，他是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党的。谢道兴，萍乡南坑人，一个贫苦缝纫工人的儿子，当时在萍乡群报工作。罗树人，萍中毕业后在五陂下小学教书。颜志超，潞洲中学高中毕业。还有谢道兴和我两人发展的刘明德，他原是国立第十三中学高中学生，当时在农村教小学。他们先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和青年团员，这些不是我直接发展的人员，现在已记忆不清。关于建党情况，我在“文革”的一份“交待”材料中这样写着：“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我首先没有在工人、农民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现在当然要说成是一个错误。但是，我当时认为，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不可能给我以时间去工农中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从中发现积极分子。而在城镇中，往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形势的觉察较为敏锐，觉醒较快，一旦觉醒又顾虑较少，斗争较为坚决，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反内战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对于上述人员，我都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了解，了解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了解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没有做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他们都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怀有程度不同的不满，而对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则怀有感情和热诚；他们在解放前后都做了不少的有益的工作。我的觉悟很低，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介绍他们搞革命、入党是个错误。我请求，不要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就把他们一概否定。”

2、建立交通联络站、城区党的机关和地下印刷点。前面已经谈过，联络站就设在我的家里。其实，它又是党的机关和地下印刷点。当时，工作尚无基础而又急需开展，在萍乡城区要找一个地利、人和的据点，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思虑

再三，只能采取“豁出去”的办法，把机关设在自己的家里，这多少也有点不顾一切的味道吧。因为从地利上考虑，我父母开的一家夫妻小店，位于武官巷的斜对面，不是闹市，也不算偏僻；由于物价飞涨，市场萧条，虽然已经濒临关门，但还是卖点油盐杂货，不时有顾客进出，不会因为来几个客人而引人注目。我家对面有个铺面较大的裁缝店，它的楼上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电台所占用，而且有士兵守卫，正好可以“把党的机关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从人和方面考虑，我父母出身贫苦，父亲曾因担任拥护红军委员会秘书而避难外地，亲表兄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亲叔父因参加老家吉安的土地革命斗争而惨死，我和颜质文是多年的患难夫妇，她因我的转移也从长沙带着两个孩子、还怀着一个毛毛先期回到萍乡，并且辞掉了小学教书的职业在家照料。他们对于我从事的工作，是完全支持而且尽力掩护的。我自己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时局不好，回家照料两老，以免又象抗战时那样的分离，这也是说得过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考虑，所以才下了这个狠心。这样，我家那座小店房的一层，就继续做点生意，二层仍然由一家六口居住，三层原是堆放破烂的，因而稍事清扫，除供过往人员住宿外，还用破旧门板间隔一个小房，作刻蜡纸印文件的地方。即使发生情况，待到他们爬上三楼，应变准备也就有时间可以做好了。自此，孟树德来这里食宿并治过病，游德优也在这里食宿并和有关人员碰头，矿区派出的人员来这里取印刷品，也有人在这吃晚饭。城区的周以存和党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常单个来这里商量工作或反映情况。有时，就坐在店门口的街边上大大方方的交谈，一如平常人家的待客，毫无故作神秘之处，倒也平安无事。长沙的党组织知道我返抵萍乡之后，趁叶炳和（晚晚报中的地下党员）来萍乡熊万全派报社办理晚晚报结帐手续的时机，送来一批铅印的印刷品，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燃

肩之急。除分送一部分给矿区外，立即组织翻印，这就是“地下印刷点”。所谓印刷，连一部油印机也没有，只有一块没有木框的刻写钢板，一管铁笔带几个笔尖，一块调墨的破玻璃，一个转不动的胶滚，一片竹篾穿上一根绳子，用脚踩紧绳子，靠竹篾夹住纸张。用过后就收拾干净，分别放进破烂堆里。如此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工具”却印出了一批党的文献，如：《将革命进行到底》、《目前形势与任务》、《铁的纪律》、《古田会议决议》、《城市政策》、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等，在地下广为传读，给萍乡的暗夜投一光明。从事这一工作的，主事是张学棣，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后来，别的一些地方也组织了翻印。现在的人们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3、在学生青年中开展学习和迎接解放的活动。在萍乡县立中学方面，由李汉华、张学棣负责；鳌洲中学方面，由周以存、颜志超负责，另有属于华中局长沙特别支部的夏敬文也在工作上给予配合；女师方面由李汉华负责，通过他发展的一个姓王（名字已记不起）的学生开展工作；五陂下方面，由罗树人负责，在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大家采取多种形式的读书会、学习会、座谈会的活动方式。阅读我们翻印的多种文献，座谈形势和任务……，适当传递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一些校园中，《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的好地方》等革命歌曲流行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的记忆中，萍乡中学建立了一个团支部，由学棣任书记（因此他不久转为党员），其中的活跃分子有赵安荣、宋华吉、曾慧玲等等，有的后来也转为党员。在暑期里，青年活动的中心转到位于武官巷的女师内，我曾到这个学校去观察过。迎接解放时，大量标语就在这里书写，秧歌队、锣鼓队也从这里出发涌向街头。对学校当局，我们采取团结大多数的

方针，只要不坚决与人民为敌，不妨碍和反对学生的进步活动，一般不轻易进行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以利于逐步争取他们转为对人民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也便于我们腾出手来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紧迫任务。现在批评我们只搞花花草草，不敢斗争，我不想作任何申辩。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路线将证明我是否有罪。

4、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当时我认为，这是党的地下组织的紧迫任务之一，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依靠群众尽一切努力作好调查研究的工作，而且作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特别注意通过两个渠道搜集情况。一是具有报社记者这种便利条件在群报工作的谢道兴；一是国民党政府原萍乡县县长曾敬持的女儿曾慧玲。然后根据其他同志提供的情况予以补充校正。由于大家的努力，很快掌握了萍乡党、政、军、警、特、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组织系统情况和主要人员的名单，汇编成较为系统的材料。以后，南下萍乡的市委、县委的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好资料，对于解放后工作的开展很有参考价值。萍乡敌伪档案保存到能够完整移交，和这一调查研究也极有关系。

5、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攻势，并进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由于已经掌握萍乡各方面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考虑到保护城市厂矿、学校、机关、敌伪档案和其他重要设施等安全接管的迫切需要，在解放大军已经渡江的条件下，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由我起草了致各界负责人的一封信。大意是：宣传解放军已胜利渡江，所向无敌的形势；劝告他们采取与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警告他们必须保护所辖部门的档案、物资财产及设施，等待接管，不得破坏捣乱；宣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记得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还加了“先遣部队”四个字。或由张学棣刻钢板，或由颜志超复写，用多种字形，印制数量达三百余份。如何发出，也经过再三考虑。如由进步群众分头送

出，殊多不妥，如从湖南寄发，也极不方便，而且延误时日，如购买大量邮票，又容易招致暴露。只好由自己的亲人颜志超和颜质文姐弟偕同肖年春，多次观察，趁邮局无外人时，把一批信件交给邮局窗口的营业员，请他交给邮政局长，还特别给邮政局长发一封专信，劝请他务必嘱咐邮递员妥善将这批未贴邮票的信件在当晚十二时以前送到，不得延误。在这件事上，他尊重了人民的意见，完全照办了，是应该感谢他的。这一政治攻势，对萍乡的上层人士震动很大，对萍乡的和平接管，不能说没有产生威力。与此同时，通过文光绍与黄道腴的某种特殊关系，建立了与黄的联系。我们请黄老先生运用他在萍乡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出面协同各界人士做维持桑梓治安、稳定人心等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地方保安队彭铭阶等的工作，不要搞骚扰、捣乱、破坏地方的活动。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不能说是无益的。黄老先生是很出了力的，也是应该感谢的。毛泽东说：对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解放后，经与南下的市、县委负责人商定，很快将地方保安队的人员解除了武装，集中住进宝积寺内。为此，黄可能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似乎感到某种压力，于是第一次来到我家里。我们谈得很好。他希望军管会将集中的人员放归家中，不要使人责备他言而无信，感到为难。我说了一些这样意思的话：道老为萍乡人民做了好事。对保安队人员采取这种措施，对萍乡人民有好处，因为他们中间良莠不齐，如有少数人铤而走险，就会造成新的犯罪；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如果他们继续在社会上活动，其中有民愤者，可能遭到人民的惩罚。现在将他们集中起来予以保护，可以经过学习，弄清他们的问题，然后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解放军对投诚人员的政策，分别不同情况，妥善予以处理，请不必为此过虑，黄道腴对此表示理解，并愿意

去做这些人的家属的工作。我也向彭梦庚等汇报了，请他们关注这件事情。我的记忆中，以后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可见，萍乡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通情达理，热心为地方办些好事的。我认为，我们在统战工作方面没有什么过错。

6、开展护矿、护厂、护路的群众性斗争。据我所知，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二十年代，安源党的工作是湘区党委开拓的；三十年代后期，是湖南省委派袁学之到安源重建党组织的；四十年代后期，湖南省工委把工作发展到萍乡矿区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根据省工委的意图，萍乡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萍乡煤矿。在近一年的工作中，郭昌荣等在党的发展，开展反搬迁斗争，掌握矿警队，争取经理郭象豫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萍乡矿区能够完整地由人民接管，这是很不容易的。

（建议请郭老撰写这方面的史料。他已离休，住湖南省煤炭工业厅内。）城区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支持矿区的斗争。除了前述输送印刷品外，周以存和我商量研究，根据萍矿党组织的意见，书写了致矿务局经理和几个协理的信件，指明他们必须采取或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或用金钱收买，或实行武装保卫的措施，以保证矿区的完整无损，信件是从城区寄出的。后来，周以存还转移到矿区，住进矿警队，进行秘密指挥，并调动矿警队部份人枪进城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在萍乡城区需要注意保护的，主要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档案资料，萍乡电厂、小西门铁路桥。档案方面，已通过黄道腴在开展政治攻势之际对有关负责人再晓以大义，务必妥善保管，不得毁坏。电厂方面由地下党员黄鸿阶，通过电厂内部职工做了切实的工作，可保无虞。解放时萍乡城区照常送电即为明证。小西门铁路桥，由颜志超以居住小西门之便，秘密组织附近一些青年群众，对桥进行监视，如有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以便策应开展护桥斗

争。并且在桥墩上张贴了标语，警告国民党军队，如敢破坏，必予严惩。在开展护矿、护厂、护路的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由于省工委“五·四”决议的传达贯彻，城区党组织也开始注意在工、农中的工作，在城区中注意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刘天泉在青山煤窑中、罗树人在五陂下附近的农民中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并组织了地下工会和农会。对于如何夺取枪枝武器，物色有军事才能的人员等等事情，也有过慎重的商量和讨论。正在待机行动之际，省工委7月指示下达，停止发展组织，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因此这个方面甚少建树。

7、其他。除了上述六项主要工作外，当然也做了别的一些事情，不必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恳留地质学家喻德渊。喻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修古藩的同学和好友，修多次向我谈到他。他在大学读书时是李四光的得意门生，曾参加过革命，后来失去了联系，1948年从国外返回祖国。1949年春，因抵制南京“中央研究院”搬迁台湾的爱国行动而回到了萍乡，但对今后去向颇为踌躇，甚感苦恼。作为晚辈和党的工作人员，我对这位前辈和爱国的学者深怀敬意，并想去看望他。6月间，修古藩夫妇为我作了妥善的安排，他们请喻到城郊修家冲的住宅小住，然后通知我前往。我陪他们一边搓麻将，一边聊天。喻从他所从事的事业考虑，是南经广州转香港出国，还是北上？还是去西南？确需作出审慎抉择。我谈到了萍乡即将解放的胜利形势；谈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特别谈到周恩来与李四光的亲密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我对此已略有所知）；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伟大艰难的建设任务；谈到战争正在进行期间外出可能遇到的危险。因此，恳切地请求他暂留萍乡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修氏夫妇从旁加以劝慰，也请他安心留在萍乡。因此，喻德渊欣然同意。畅谈竟日，傍晚我才回城。解放后，在向南下的市、县委汇报中，我谈到了这件事情，认为喻和修诸位

萍乡的学者堪称“国宝”，请他们多多关心照顾。后来听说，开国前后，喻已应中央之召赶赴北京，以后并出调长春地质学院。修后来也调北京，在那里是有名望的教授。非常抱歉，我还没有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解放后，我们还协助当地党委和人民政权作过支前、组织干部训练、初步清除匪特等等工作，还就如何策动盘踞在萍乡境内武功山一带的江西省保安一旅投诚的事情，向公安局局长牛河之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如建议找朱明俊去利用亲戚关系进行策反工作）。

所有这些，南下的市、县级有关负责人是清楚的，请予复查。

8月5日长沙解放，原来的地下党组织来电报将我召回湖南。10日左右，我返回长沙途中经过醴陵，向当时醴陵县委委员肖项平谈了所有情况（孟树德已去长沙开会），请醴陵方面速报省委，将整个湖南系统的组织关系，转往萍乡。

“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怪事？”

“你们的活动经费是哪里来的？”

我没有向上级组织领过任何经费；也不象在解放区可以由组织拨款开展工作，发给生活津贴；当然，更不象现在，可以由国家发给工资。我也没有向党员收过党费。按照党章的规定，每个党员本来是应该缴纳党费的。考虑到当时工作的需要，我曾告诉我所发展的党员，量力拿点钱来自行购买些纸张文具等等，作为缴纳党费。城区党组织在工作上需要钱用，主要是我和周以存拿出来的。周是中学教师，还没有结婚，稍为宽裕些，总是主动拿出钱来购买文具用品。我没有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也较为困难，六口之家糊口也不容易，只是离开长沙时

带了几十块钱工资，就把这点钱作为党费并补贴家用。除买蜡纸和其它文具纸张外，过往人员如孟、游等人的吃饭、病了买药都是我掏钱的。解放军先遣班返回部队时，也是我们私人去借钱借粮供给的。在艰难的地下斗争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也许年轻人会感到奇怪，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7月，矿区工人与国民党四十六军工兵连连长赖某的谈判中，用了一千二百块银洋收买他们以保全矿区，是矿区党组织通过工人群众向郭象豫和矿务局要来的。你们说我们曾向殷商巨富筹款，可以负责地回答，在我们的组织中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你所说的解放军先遣班是怎么一回事？萍乡是一次解放还是两次解放？”

在我看来，萍乡只能以7月26日作为解放的日子，不是什么两次解放。在此之前的7月22日，矿区郭昌荣去芦溪接到的解放军的一个先遣班到达高坑，受到矿区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些同志为胜利激发的热情所驱使，开出四辆大卡车簇拥这个班在黄昏时刻进到城区。城区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和萍乡人民一起拥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呼胜利。我立即找这个班的班长了解情况，原来，大部队按照计划还需要几天后才能到达。这就使我在热情中清醒过来，感到万分焦急。因为，国民党正规军队虽已撤走，但萍乡城仅处于中空状态，地方保安队的兵力大于我十余倍，虽然做了争取的工作，却并无绝对的把握，倘为他们搞清实情，或有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扑，这个班和城区党组织以及革命人民就都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我因此与周以存商量并且断然决定：（一）汽车返回高坑，宣传萍乡已经解放；（二）俟天黑后，将这个班迅速安置到大西门外一个小山包上的张学棣家里住宿，并在住处附近加强警戒；（三）请解放军派出几名战士，并调矿警队部分人员进城随同配合，分头在街道巡逻，既维护社会秩序，并形成

萍乡已经解放的气氛；（四）通知黄道腴先生，请他转知彭铭阶等，解放军已进城，保安队人员不宜上街，不能滋生事端，如不听劝告，后果自负；（五）深夜，我赶到群报社，与谢道兴商量，由我撰写一条新闻，在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记得新闻的大意是：萍乡人民欢庆解放，萍乡社会秩序安定，解放军已占领城外的重要山头、阵地，大部队且已源源过境（请查阅群报，如能找到这张报纸，这倒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新闻史料）。这完全是为了造成声势，以声威夺人，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这是当时形势之紧迫需要，谈不上是什么怪事。这个班在张家住了几天，找湖南和南昌来的两个组织的负责人碰头了解情况。我多次要他们催请部队及早进城，以防万一。然后由我们借钱借粮，使他们得以安全返回部队。后来，大部队进城，部队首长多次到我家里商谈工作，大概是因此之故吧。在“文革”后期，这个班的班长赵凤山任长沙市北区武装部部长，又是“支左”的地方首长。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出了我，从而知道我已“堕落”为“摘帽右派”。后来听说，他和其他一些人闲谈到我，可能如实地谈到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影响所及，使我以后的处境稍有改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令人殊为感动。

“你们在杨岐山搞了什么名堂？”

没有搞什么名堂。你们所指的，大概是从湖南去的自称解放军的一个游击队在六七月间被国民党乡公所冲散的事吧。据我所知，这个游击队并非党领导的武装，而是醴陵籍的国民党要员刘建绪的一些部属集结搞起来的。他们的意图大概是借此作点贡献以便投靠人民，在当时情势下，似也不必厚非。其中有一人，是长沙晚晚报的编辑湛震。他是个老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任刘建绪的秘书。后因“羊毫事件”牵连被捕入狱，以后回到了长沙，1949年和我在

晚晚报共事。他们到达杨岐山为时不久，就被当地乡公所冲散，人员略有伤亡，撤离也很匆促，还丢下一口小皮箱，内中有“晚晚报记者湛震”的名片。此事发生后，我很快得到了上栗市党组织肖年春（即肖项平之侄，烈士肖炳蔚之子，当时系萍中学生，与我有交往）的通知。当时，萍乡的国民党党、军特务系统很自然地由湛震联想到从长沙回来的晚晚报副总编辑傅白芦，因而加强了对我的注意和试探。于是，一些和我并不认识或只有一面之缘的可疑人物，忽然来我家“拜访”，表示“仰慕”之情（他们中的一些头面人物，我大体是清楚的。他们自己不出面，派出这些人来试探，进行“火力侦察”）。有的说了一些客套话后，忽然问道：“晚晚报记者湛震，是我的远房亲戚。傅先生可曾认识？”我回答说，很熟悉，是同事。他是福建省政府刘建绪主席的机要秘书，很为刘先生所倚重。有的在寒暄之余问到，晚晚报不知是何人创办？我说，董事长是警察总署署长、军统高级长官唐纵先生。我说的都是实话，而他们却如坠于五里雾中，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晚晚报在1948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其社长蓝肇祺（地下民主同盟盟员）即赴南京活动，通过鄱县同乡的关系请唐纵出任董事长，晚晚报乃得于6月复刊。但是，杨岐山的这一情况，促使党的组织作了相应的调整。醴陵方面有人主张我立即撤离萍乡回到湖南，我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敌人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们参与了杨岐山的事情，我们也确实没有参与此项活动；在我对他们派来人员的观察中，他们听了我的话后颇有“恍然大悟”的表情，作了对他们似乎有利的理解。如果此时撤离，无异“此地无银三百两”，甚是不妥。因此建议，我担任的城区党总支部书记和联系交通线的任务应予停止；总支书记由周以存继任，湘东、高坑的联系暂时切断；联系工作由醴陵另派人员；地下印刷点的工作转由张学棣等另行安置地点，党的文件

和书刊，由颜质文利用抱孩子回娘家之便，转移到颜志超的住处；我的行动虽然不如以前方便，但我对萍乡情况较为熟悉，了解也较深，可以多出主意，仍宜留在萍乡坚持工作，自当密切注意观察敌人动向，在必要时再行撤退。这个建议得到赞同，我就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怪事。

“为什么前些年萍乡地下党的历史材料上没有露出你的名字？是你想隐瞒吗？这能隐瞒得了吗？”

这就更不是怪事。第一，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当然不值一提。第二，我在湖南被昔日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打成了“右派”，当然更不应该被提及了。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隐瞒，这也是隐瞒不了的。现在，你们认为萍乡地下党有严重问题，不是很快就找到我了吗？我认为这不是应该由我回答的问题。请原谅。

“谈谈你们的组织系统，萍乡有不有统一的领导机构？”

这个方面我所知不详。可以就我知道的略作汇报。

中共湖南省工委属当时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省工委书记周礼，委员有刘亚球、罗正坤等，刘、罗是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留在湖南的，均系湖南人，都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老战士，堪称久经考验。

4月，我回到萍乡后，先在城区建立了总支，在城关镇、萍中、鳌中、五陂下、青山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或团的支部或小组。前面已谈过，城区总支原由我任书记，后由周以存继任。随着形势的发展，青山的小组划归湘东区，在湘东建立了总支，记得是由刘天泉负责。

大约5月中旬，醴陵县工委建立，孟树德任书记。下旬，他到萍乡城区转赴高坑，建立萍矿工委，孟兼书记，郭昌荣为副书记并主持工作。孟在解放前来萍乡，就只4月初、5月末

两次。游德优继我而联系巡视地下交通线上的工作，大约有两三次。矿区和城区的党组织自觉地做了大量工作。

大约6月中、下旬，城区总支改为萍矿工委的直属支部，仍由周以存任书记。湘东总支大概并入了醴陵县工委领导的王仙区委，好象赵安荣参加了王仙区委的工作。

也是四五月间，肖项平通过原萍中学生就读天津南开大学的陈世骥在浏阳文家市地区，又通过其侄肖年春在上栗市地区建立了萍浏醴边的区委。肖项平兼区委书记。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在萍乡来不及建立统率上述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你们说，湖南来的组织曾想“吃掉”南昌来的组织，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硬说有此类事，你们可以去找那个想“吃”的人去了解。

“你们地下党是条黑线，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以后还要继续考虑自己的问题，彻底交待。”

我在一份材料上这样回答：

“我不能同意这样的问题。我个人是‘摘帽右派’，可以任人羞辱，但我也不能侮辱自己。对于整个地下党的组织，用这样的语言对待，可说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之初，就处于地下状态；

‘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还列有‘党的地下组织’的专门一章，它是党的组织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之前，就是地下党员。周总理在到达中央苏区以前，也是地下党员。”……

萍乡城区地下党，从1949年4月下旬开始工作，到7月26日解放，不到一百天，时间很短，却也风雨如晦。我和我发展的一些党员，都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水平低，经验不足，缺点和错误肯定是存在的。工作能够得到开展，组织没有

遭受破坏，根本的原因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是全国行将解放的胜利形势的鼓舞，是萍乡人民的爱护和支持。而且，由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他们自顾不暇，又畏惧于“血债必须加倍以血偿还”的严重警告，他们才不敢胡作非为。这是我此时能够作出的唯一解释，这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至于我自己，那是极为渺小的，只有一份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忠诚，只有一个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决心，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中央社会部华中工作组地下活动述要

邓晏如*

1947年夏，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中央社会部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负责人吴克坚同志从上海派吴化之同志至武汉开展对华中地区的地下工作。吴化之是湖北人，1928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活动。1937年去延安，在党校、抗大、陕北公学院教课。1938年仍回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先前在西安、武汉、桂林、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他到达武汉后，首先凭吴克坚的介绍与潜伏在伪粮食部五丰面粉厂担任厂长职务的中共党员朱楚辛同志取得联系，接着由朱楚辛介绍我与他建立了工作关系，然后，我们分别联络一些同志，逐渐开展工作。

我原是党领导的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派往长沙开设兄弟书店，担任经理职务。1946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进行疯狂的破坏，兄弟书店被迫关门停业，撤至武汉办理结束事宜。同年7月，由邵荃麟同志（新知书店负责之一）托朱楚辛介绍我去粮食部汉口面粉厂任会计主任（后又调五丰面粉厂任会计主任）。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与吴化之建立工作关系后，便以上述职务为掩护，长期在他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吴化之同志是中央社

● 邓晏如当时是中央社会部华中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解放后，先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等职。

会部华中工作组的负责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除朱楚辛和我外，还有汪德彰、梁宜苏、胡家炜、黄宗熙、周玲、邓逸等六位同志。汪德彰，党员，是1946年4月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英同志从重庆派往武汉开展地下工作的。他曾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专员和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1948年2月，救济署结束后，由朱楚辛介绍至伪粮食部汉口米厂任总务股长。他与吴化之、朱楚辛原来认识，曾在重庆一道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虽没有组织关系，都知道对方是党员。当他正在等待组织上派人与他联系时，偶然在朱楚辛家里遇见吴化之，从此便在吴的领导下工作。梁宜苏，党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为党收集敌军情报。他曾在国民党空军总部教育处任科员，后调长沙空军第六十六电台任领班，1948年元月调汉口空军第四军区通讯大队任参谋，驻电台办公。他是由我介绍与吴化之建立工作关系的。胡家炜，湖北人，与我有点亲戚关系，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因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追捕，于是逃回武汉，在我影响下参加地下工作，武汉解放前夕，由吴化之吸收为共产党员。黄宗熙，当时在武汉电信局任电话修养室主任，思想进步，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他与胡家炜曾在重庆大学同学，交谊较深，由胡引荐参加革命行列。工作一段时间后，由吴化之吸收为共产党员。周玲是我爱人，她与邓逸都是三联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干部，也是在我影响下参加武汉地下工作的。以上同志，来自各方，所处的地位虽不相同，但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满腔热情，在下列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策反工作

我们的策反工作，是由吴化之亲自部署进行的。大致情况

如下：一、对张轸的策反工作。吴化之在华中地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与各方面紧密配合，策动张轸起义。张轸先后任武汉行辕副主任、“华中剿总”副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五绥靖区司令、十九兵团司令等职。他与李世璋（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交谊很深。吴化之经吴克坚介绍向李了解张轸的情况，并通过李的关系与张建立了联系。1948年至1949年3月，吴多次去信阳和在武汉与张面谈，分析国内战争形势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劝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张对起义问题，开始态度暧昧，以身边有蒋介石的亲信和部队难以驾驭为由，不愿积极行动。直至东北、淮海战役消灭近百万敌军和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之后，经过我党各方面努力争取，他才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劝告，于1949年5月15日在武昌以南金口、贺胜桥一带率部光荣起义。二、对程潜的策反工作。我们对程潜的策反工作，是通过彭源翰同志进行的。彭源翰是汪德彰的姐夫，醴陵人，与程潜同乡，关系较深。1947年在武汉行辕任上校科员，1948年8月在长沙绥靖公署任少将专员，均在程潜身边做事。1949年初，吴化之要汪德彰邀请彭源翰至武汉面谈，要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程潜的工作，争取程潜起义。彭接受任务后，注意掌握有利时机，推心置腹向程潜进言，对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三、对晏勋甫的策反工作。吴化之通过晏道刚的关系与晏勋甫建立了联系。1949年2月，晏勋甫任武汉市市长，家住汉口长春街，吴化之多次在此与晏面谈，宣传党的政策，要他认清形势，决定去从。但晏在白崇禧的胁迫下，长期犹豫不决。武汉临近解放时，吴化之要我和胡家炜以中原军区的名义给晏写了一封敦促信，指明出路，讲明政策，劝其悬崖勒马，立功赎罪。由于大势所趋和各方面做工作，晏勋甫终于醒悟过来，没有跟白崇禧逃跑，留下来为人民作了一些好事。

搜集情报

我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搜集敌人的情报。当时的情报来源，主要有五条渠道。一是国民党武汉空军军区电台。梁宜苏是这个电台的骨干人员，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主动承担搜集情报的任务。二是武汉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该司令部的司令罗机，邵阳县梅洲坪人，与我同乡，我们利用他的关系，把邓逸安插到这个司令部当文书，设法接触机密，刺探军情。三是武汉行辕联勤部电台。这个电台的台长邓昂（汉阳），与我同乡，又是幼年时候的同学，经过反复启发开导，终于认清了前途，为我所用。四是武汉电信局。黄宗熙是该局的中层领导，在职工群众中有一定威望，与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交往较多，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武汉电信局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的电讯设备条件，尽力为党搜集情报。五是统战对象。根据工作需要，吴化之、朱楚辛、汪德彰和我在各界上层人士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多种方式，与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张难先、孔庚以及一些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工商界的负责人晏道刚、陈经畲、华煜青、马哲民、刘梅生、王一鸣、刘仲容、曹美成等建立了联系，结识了各方面的人士，对掩护党的工作和搜集情报都起了一定作用。通过上述五条渠道，我们搜集了不少情报，比较重要的有：程潜预定从武汉撤退去湖南的日期和具体步骤；白崇禧决定派三个师的兵力进攻鄂豫解放区的部署；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兵力、编制、番号、训练、调动和给养情况；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败退时撤离驻地及损失的战报；白崇禧阴谋破坏工厂和公益事业计划；张轸部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情报，由于我们的电台没有架设起来，都未及时送出。白崇禧决定派三个师

进攻我解放区的情报，是我托武汉联营书店经理马仲扬（他的党组织关系在武汉市）设法向上报告的。汪德彰曾托中原局城工部吴永裕同志转送重要情报。有些情报，由吴化之亲自送给吴克坚或通过别的途径转送给中原军区。1949年3月，吴化之派我去上海，把一些重要情报送交吴克坚同志。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电台，能够直接向上请示报告，我们的工作定会出现另一种新的局面。

关于电台问题，有必要详细叙述。1948年4月，吴克坚决定在武汉架设社会部系统的地下电台，以沟通中央、上海与武汉的联系，并由徐淡庐同志将电台机器交给在民生公司的“民联”轮上以会计职务为掩护的秘密交通黄淳道同志伪装后运到汉口。电台机器是吴化之亲自到轮船码头提取的，先交给朱楚辛保管，没有多久，交给周玲保管。周玲先把它放在家里走道上，用劈柴护盖着，后来，觉得这样不完全，怕被人发现，便托朱执纯同志（原新知书店的干部，由我介绍至五丰面粉厂工作）拉到五丰面粉厂办事处做为行李存放到公家的储藏室内，我们朝夕监护，没有出什么问题。吴化之原来想把电台架设在拉线厂。这个工厂是我党投资兴建的，负责人是郑济安同志（朱易同志之妻，当时朱在解放区工作），后来发现此处有些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有不安全因素，便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正在这时，汪德彰的哥哥汪德耀从广州寄来一笔款于给他，吴化之知道后，要汪在老通城附近济世里买了一栋楼房（六间正房），拟将电台架设在这里。我们很快把架设电台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但由于上级迟迟未为我们解决报务员问题，故一直没有在武汉把电台架设起来。1949年初，为了配合各方面策动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吴克坚派周竹安同志（解放后驻保加利亚大使）去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将我们的电台机器调给周竹安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吴化之与我商定，派梁宜苏运

送电台机器去长沙，并随电台工作。梁当时在衡阳国民党空军电台任职，没有及时赶来接受任务。4月中旬，徐淡庐同志至武汉，由他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把电台机器做为随身行李带走。几天后，梁宜苏到达武汉，吴化之与我和周玲同他研究去长沙的工作，并要他留下接头的地址（长沙中山西路福裕祥木炭行），带着暗语即去长沙等待徐淡庐与他联系。徐抵达长沙后，住青年会，按我们通知的地址把电台机器交给梁宜苏，然后去香港，执行别的任务。这时，周竹安已去上海，梁把电台机器存放在《湖南日报》任编辑的汤永安同志家里，经过一些曲折，才把它交给周茂僧同志（周竹安的弟弟）。4月29日，徐淡庐在香港见到潘汉年同志，潘把报务员赵翰林同志介绍给徐，由徐护送至广州转达长沙。5月初，中央社会部又派报务员章朴同志至长沙工作。周竹安开始把电台架设在上营盘街钱去非同志家里。不久，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钱家附近时有可疑的人在徘徊走动，似乎在进行侦察活动。一天上午，距离钱家大门不远的地方，一辆装有天线的吉普车在那里“抛锚”，有几个人佯修车子，并把一些油污涂在钱家的墙上。钱把亲眼所见的这些情况告诉周茂僧，周立即去与梁宜苏进行研究，肯定这是敌特对我们的电台作了测定，他们在墙上涂的污迹是暗记，可能要马上采取破坏行动。于是决定将电台和报务人员马上转移到浏正街李维城家里。当晚，反动派果然在上营盘街一带进行突击检查，因电台和报务人员已经转移，钱家安然无事。电台和报务员转到李维城家里以后，当天午夜，浏正街一带也突击清查户口，章朴同志因无身份证件，反动派要把他带走，幸李维城当时是湖南省银行行长，有一定社会地位，经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李肖白，说章（浙江人）是刚从上海来的亲戚，尚未办理户口手续，这样才应付过去，没有出什么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周茂僧、梁宜苏、章朴同志一致认为：电

台设在长沙城内，随时可能受敌特的侦测、干扰和破坏，难以开展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周竹安决定将电台搬迁到自己的家乡去，以便利用各种关系卫护和隐蔽。周竹安是长沙东乡霞凝市九坛乡人，该乡有自卫武装百余人，乡长经过反复开导，终于明辨了是非，认清了前途，愿意尽最大努力掩护电台工作，这样使电台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电台可直接与中央通报，及时向中央报告重要情况和传达中央指示，对湖南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9月，邓昂领导的电台随程潜撤退至长沙。为了了解湖南和平运动的情况，1949年2月，我与吴化之研究决定，派邓逸去长沙、邵阳，利用邓昂的电台搜集情报，也有一些收获。湖南和平解放后，邓昂、邓逸到武汉找我，要求安排工作，我将他们的情况向中南局社会部作了汇报，该部原想继续派用，后因他们缺乏派出条件，便由中南局组织部介绍给湖南省委送革大学习。

反 搬 迁 反 破 坏

1949年春，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继续挥师南下，直逼武汉。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预感末日即将来临，下令把能搬动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统统搬走，不能搬走的统统捣毁，并准备在武汉不守时，炸毁建筑物、工厂和公益设施。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党动员武汉各种进步力量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群众运动。我们在吴化之领导下，立即在湖北省民生实业公司、武汉电信局、五丰面粉厂、汉口米厂等单位开展了护厂、护局和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一、湖北省民生实业公司的护厂工作。湖北省民生实业公司所辖汉口机械厂、武汉玻璃厂、武汉化工厂、武汉肥皂厂、

武汉织布厂、汉阳炼油厂、湖北印刷厂、湖北茶叶公司等八个大中型工厂企业，在湖北全省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因此，推动该公司的护厂工作深入开展，乃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该公司的副总经理陈英武，曾与汪德彰在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同事，倾向进步，愿意在本职岗位上为人民作些有益的事情。吴化之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与汪德彰商量，由汪动员陈英武同志所属单位的护厂工作。汪与陈多次交谈，陈满口答应，并由陈介绍汪与该公司的董事长吴良琛在汉口兰陵路兰陵村总公司楼上见面，就护厂工作的有关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吴良琛曾任湖北省保安付司令、省粮食厅长、行政专员等职，在湖北军政界和工厂企业方面有一定声望。他对护厂工作比较重视，决定由陈英武具体负责抓所属单位的护厂工作，并要陈英武与汪德彰经常保持联系。护厂过程中，陈英武在汪德彰的帮助和指导下，曾多次召集所属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共同研究护厂工作的步骤和作法。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在各单位积极分子中进行动员，广泛发动职工群众为护厂工作贡献力量。他们在护厂斗争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宣传护厂的重大意义和反搬迁、反破坏与职工的切身利益关系，激发人们的爱厂护厂热忱。②以积极分子为骨干组织纠察队，维护工厂的安全，严防坏人和敌人的破坏。③由各单位造具搬迁所需的庞大经费预算，使当局感到财力上难以负担。④强调机器设备装卸和交通运输的困难，借以阻碍和拖延搬迁的实行。⑤发动各单位职工索取欠薪和提出许多改善职工待遇的要求，使当局疲于筹划和处理。由于采取以上措施，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搬迁、反破坏的群众运动很快形成，从而使八个工厂企业的财产全部保护下来，顺利地移交给人民政府。

二、武汉电信局的护局工作。武汉电信局的护局工作，是通过黄宗熙同志具体部署的。黄宗熙先与胡家炜联系、密谋策

划，后来在吴化之直接领导下开展斗争。吴在余家菊同志的帮助下，经常借用余仲衡（家菊的父亲）的家属身份证进入电信局布置检查工作。黄在护局工作中，行动果断，工作扎实，与隐蔽的地下党员李循堂同志互相配合，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作法是：

①在黄色工会中掺沙子。1949年2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武汉局势日趋紧张，电信局已传出要裁员和搬迁的风声，人心浮动。这时，武汉电信局黄色工会酝酿改选。我们认为，要趁此机会掺沙子，使选举后的工会尽可能倾向进步。于是，要黄宗熙在职工中活动，帮助一些积极分子竞选理、监事。选举结果，有几个积极分子被选为理事或监事。有几个为群众所厌恶的原黄色工会的权势人物落选，广大职工皆大欢喜。

②在职工中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当“华中剿总”下令要武汉电信局向南搬迁时，绝大多数职工因怕被裁遣、遭受颠沛流离和生活无着之苦，都有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黄宗熙和李循堂等同志商量，经过深入的工作，先后在报务员中分别建立北平、上海、西安、成都、武汉、华中报训班同学会；在线务佐、机务佐、报差、工友、妇女中分别建立联谊会。上述群众团体建立后，武汉电信局百分之九十的职工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各个群众团体的骨干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如余家菊同志就是妇女联谊会的骨干），为护局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③成立应变会，夺取领导权。1949年3月，武汉电信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命令，要成立应变委员会（以下简称应变会）。“应变”的本意，就是要在国民党反动派溃逃的形势下，按照统治当局的意图随时遣散员工、搬迁或破坏机器设备和公益设施。黄色工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会谋划，企图操纵和包办筹建应变会的工作。我们认为，在这紧要关头，可

接过“应变”的口号，参加和领导应变会的工作，以便运用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来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活动。于是，吴化之要胡家炜与黄宗熙周密研究，立即发动一场争夺应变会领导权的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黄宗熙与李循堂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群众团体，纷纷提出应变会须由各同学会、联谊会推选代表组成，应变会常务委员应由代表选举产生，工会不得操纵包办，否则，应变会没有代表性，大家不承认。4月初，应变会正式成立，黄宗熙被选为副主任，蒋西亭兼任主任。他是挂名的，实际上由黄主持应变会的工作。应变会下设防护、供应、总务、财务和不管等五个股，股下面设文书、事务、财务、自卫、救护、消防、交通、保管、分配等九个组。各股、组的负责人都是事前经过挑选的积极分子，这样，应变会的领导权便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④从解决生活问题入手，进一步动员群众护局应变。应变会成立后，马上向职工提出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任务，明确告诉大家，机器设备和器材就是生命，如果设备和器材被破坏，人员被遣散，大家就会失业，全家妻儿老小就要跟着吃苦，因此，每个职工必须行动起来，在护局斗争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安定人心，团结群众，保证护局任务的实现，应变会采取各种办法帮助职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第一，电报和电话费加价。当时，电报和电话的价格是以金圆券来计算的，而金圆券每日在急剧贬值，与银元的差价越来越大，职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变会与局方磋商，提出电报、电话要按抗战前规定的银元价格收费。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达到目的，使职工的收入状况得到好转。第二，经再三呼吁，局方给每人发了一笔“应变”费。第三，购买六百三十担大米和相当数量的面粉、食盐、咸菜、煤柴等，存放局里，由应变会保管，以备战乱时的需要。通过上述工

作，应变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望提高了，绝大多数职工决心在应变会领导下积极参加护局斗争。

⑤巧妙地抵制“华中剿总”的搬迁命令。4月下旬，“华中剿总”复令武汉电信局将全部机器设备和器材向南搬迁，如不搬迁，就要爆破。在这严重情况下，黄宗熙请示吴化之，与李循堂具体研究，深入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防范和抵制。第一、反复宣传：机器设备就是生命，没有机器设备就难以活命，要象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机器设备。第二、动员各单位的积极分子，要他们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和器材详细登记造册，防止坏人趁动乱之机混水摸鱼。第三、为了应付“华中剿总”，将大批弃置无用的废旧机器设备全部装箱，以废充好，以假充真，共装钉400余箱报“华中剿总”，佯言随时可以启运。第四、将暂时不用的好机器，全部隐藏起来，正在运行的机器设备，能伪装的都进行伪装。第五、为了防止爆破和对付战时的混乱局面，自卫组建立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纠察队，轮流值勤；其他各组也都建立相应的组织，做好必要的准备；各入口处都堆置沙包和铁蒺藜网，临街的窗口都用木板钉上，南北两面围墙上安装了电网。5月15日晚上八九点钟，国民党约一个排的兵力，背着炸药，妄图闯进电信局进行爆破。由于该局防守很严和敌人处在仓皇逃跑之中，他们才没有进入电信局，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才安然无恙。这充分说明，武汉电信局的护局工作所取得的胜利，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是与全体职工的辛勤努力和顽强战斗分不开的。

三、五丰面粉厂的护厂工作。五丰面粉厂的厂部（办事处）设在汉口，工厂在汉阳，整个护厂工作由我具体负责。我是应变委员会的成员，充分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开展护厂活动。在护厂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①把全体职工组织起来，做好防火、防盗、防止财产转移和敌人破坏等工作。②

1949年3月，国民党行政院已迁广州，武汉局势日趋紧张，这时，五丰面粉厂厂长李敬瞻在南京开会，打电话给他的亲信，要他们运三万袋面粉去广州“销售”，妄图从中牟利，当他的亲信召集各课室负责人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团结一部分人，以时局正在恶化，运输非常困难，行情和价格都不了解为由，坚决反对，使其阴谋未能得逞。③1949年4月，国民党部队与五丰面粉厂厂长胡蒂芬等人相互勾结，打着运“军粮”的幌子，从五丰面粉厂调拨一万五千袋面粉（福新、胜新面粉厂也调拨了几万袋）装“海甬”轮运往上海。我们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一是制造各种借口，使调拨手续复杂化，不按时开出提货单；二是要五丰面粉厂器材股的邓逸（他已调离武汉空军司令部）就近做厂里职工和码头工人的工作，尽量拖延装卸时间，不让迅速运走，以待武汉解放；三是面粉装好船以后，立即将船号和起航日期告吴化之，请他设法通知安庆附近（已解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海甬”轮拦截住，免使这批面粉落入敌人之手。后来，听说“海甬”轮在九江附近被炸沉了。④厂里少数负责人和部分职工提议把仓库里多出账面的几万斤小麦磨成面粉私分，经我多次劝阻，才作罢论。⑤武汉解放前夕，胡蒂芬仓皇逃跑，张一乐（五丰面粉厂副厂长）以个人名义向会计室借了一笔巨款交他带走。后来，张拿着胡的借条，要会计室作为旅差费报销，我们坚决拒绝，并迫使张一乐解私囊如数归还。⑥武汉临近解放时，厂里的职工要求每人发十袋面粉的“应变”费，我们认为武汉即将解放，厂里一草一木，都是党和人民的，谁也不能占为私有。于是，在职工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得到群众的谅解，每人只发了三袋面粉，使国家财产少受了一些损失。五丰面粉厂的护厂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最后做到厂房和机器设备完好无损，账册报表和档案齐全，库存现金分文不少，80余万斤小麦和2万多袋面粉全部保存下

来，这是很大的胜利，是全体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

汉口米厂的护厂工作，由汪德彰负责，他和张余三同志（汪与他在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同事）一道，与全体职工团结奋斗，也很好地完成了护厂任务。

中央社会部华中工作组，1947年7月开始工作，到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通电起义，湖南得到和平解放，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在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党对组内同志的工作安排，由于各地解放的时间不同而有先有后，有的同志在1949年5月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有的直到同年10月才分配工作。但尽管如此，大家都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豪情满怀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奋勇向前。

我是中国第一个女邮工

贺 勃*

我原名贺益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高桥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伯父、舅父、姨父都是在清末洋务运动影响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学去日本的开明人士。1913年春，我随父母由长沙东乡迁入长沙城定居，全家依靠父亲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当年暑期，我考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附属小学三年级，1922年，在周南女中毕业。1923年，考入长沙艺芳中学大专班。1924至1926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1926年秋转入长沙美国人办的雅礼大学。1927年初，北伐革命军占领长沙，洋办的雅礼大学停办。我的同学朱仲芷，当时系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并与谢觉哉、柳直荀等均系“湖南人民收回中华邮政管理权委员会”⁹委员之一，由她介绍，我到长沙民众俱乐部从事社会工作。那时候，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汹涌澎湃，仲芷经常向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并带我参加过几次群众集会。在她的启发下，我的眼界变得开阔了。我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郭亮领导下，湖南邮工掀起了改良邮政、收回邮政管理权的群众运动，将湖南邮务管理局洋邮务长法国人饶略（C·M·R·A·de Jaurias）赶下了台，并由中国政府自主任命了第一位中国籍邮务长施宗岳。施宗岳上任后，采取了

* 贺勃1927年考入湖南邮务管理局。

一些改革措施。他采纳湖南邮务工会的意见，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在招考拣信生（当时最低级职员，后改称邮务佐）时，不分性别，兼收女性。邮局开女禁，这在当时是件特别新鲜的事，人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国民革命军进城赶跑了外国人，邮局归了中国人，才能招收女性，真不容易。有的说，邮工要搬沉重的邮包，而且抛头露面，妇女干不适宜。我伯父贺家梁则说，邮局是个金饭碗，可以去考。我堂姐贺延祜是新民学会会员，思想进步，支持我去考，说：要为妇女争口气。仲芷更是积极鼓励我，说我有两个优点，一是爱国，二是总想为妇女争光。还说，邮局开女禁，在全国是首创，争当一个女邮工是很光荣的，因为这个权利来之不易，是经过湖南邮工长期斗争的结果。仲芷的话，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共鸣。同时，我回忆起蔡畅、向警予大姐在周南女中任教期间一再勉励我们女同学要立志挽救国家危亡，解除妇女苦难的教诲，我就下定决心去闯禁。我改名贺勃，因为“勃”即蓬勃兴起之意，同时贺勃又是英文“HOPE”（希望）的译音。我是满怀妇女解放的希望去报考的，并以此作为走向社会，实现理想的开端。

考试分笔试和口试。笔试除了语文、英文之外，还考三民主义，默写总理遗嘱。1927年3月，湖南邮务管理局张榜，在近500名报考者中，由高分到低分录取前30名，我名列第二，第一名是男性。我的一位名叫萧坚的女同学列为第五。开始我想，有个女同事做伴该多好啊，可是邮局实际只录用了前两名。自此，我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邮工，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幅对联写道：“一举便惊人，玉尺量才真国士；群雄皆失色，金榜题名女状元。”

我是1927年4月18日进邮局的。当时的湖南邮务管理局设
在西长街，是一栋旧式公馆改建的，里面设有办公室、挂号处、
汇兑处、包裹处、平信处、总务处、秘书处、会计室。开始，

我被分配在挂号处。那时候，公众到邮局寄挂号信的很多，因为除了寻常挂号信之外，汇款单也作挂号信寄。汇款单有两联，其中一联须由汇款人亲自封口，作挂号信寄给收款人。挂号处领班雷功辅对我说：此处涉及银钱、要件，工作时要特别小心，不能出错。他提示我：邮局的邮戳很重要，不仅年月日重要，钟点也重要，每天上班千万记得把邮戳对准，洗刷干净，保证盖戳清晰。他还说：外国人收信有个习惯，收信先看邮戳上的时间。

不多久，我由挂号处调到总务处。这里，工作轻松些，空气活跃些，来往接洽公务的人很多，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到一些局内外的消息，在这里，我认识了湖南省邮务工会执行委员陆涸溥（后经邮务工会推举担任监理员），章肇权（后经邮务工会推举担任本地巡员），他俩对我很关心，常对我讲一些工人运动情况和国家大事。其他同事也都待我好，一个个都很正派，使我感到工作愉快，也减少了孤独感。

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领到了工资，心情无比激动。21块银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它是一个妇女经济独立的见证！我将银圆整整齐齐摆放在母亲面前，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那时我父亲贺家楷在北方谋生。我伯父听说我领了工资，笑咪咪地对我说：“你表叔当抄写，每月只赚得十七、八元，你有21元就不少了，何况有光洋呢！”我心里乐滋滋的，心想，从此，我经济独立了，我为中国妇女争了气，那真是难忘的一天啊！

5月21日晚，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军官许克祥掀起反共高潮，残酷杀害共产党员，镇压工人运动。一夜之间，天地变色。司门口高墙上挂着烈士的头，地面流着烈士的血。早晨，堂姐陪同我去邮局。整个长沙城冷冷清清的，邮局里，好象上面罩了一个大罩子，空气沉闷，使人喘不过气。

来。总务处也是一片冷清，我的心好象冰冻了似的，同事们也一下子变得冷漠了。我猛然感到孤独和恐惧，我想着仲芷和她的一家，不知吉凶如何，心里慌乱极了。

“马日事变”之后不久，屠家骅接任邮务长。总务处的同事们背地里叫他“卖油郎”。开始我不懂，后来才知道这个称呼的由来。因屠家骅娶一颇具姿色的妓女为妾，邮人即引《今古奇观》中“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以隐喻讥讽。同事们说屠家骅是崇洋复古的，是反对开放女禁的，男女兼收的那一榜就要作废了。听他们的话音，好象屠家骅要将我开除似的。总之，同事们一再暗示：屠家骅来了对我很不利。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是屠家骅密报北京法籍邮政总办铁士兰（H·Picard——Destelan），铁士兰以男女兼收未经他核准为由，宣布全榜作废，并指令：已录用的女邮工应予发资遣散。因屠家骅慑于舆论压力，未立即执行。一日，邮局宣布，把我从总务处调到会计室。我对会计工作很生疏，心情有点紧张。不几天，会计长张征之找我谈话，表现出对我很关心的样子，说我聪明美貌，才华出众，他愿意资助我去读书，继续深造。我看穿了，这是要借此将我赶出邮局。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心里又急又气。在对会计室工作稍稍熟悉，心情稍稍安定时，我又被调到秘书处搞打字。因为专业英文知识差，工作很吃力。洋文秘书王昌炽，经常在我身边转，总想找岔子似的，我心里提防着，感到很不是滋味。

自从离开总务处，我便处在消息闭塞、孤独无援的境地。加之，一个女的在生活上有许多不便之处。那时，邮局没有女厕所，街上更难寻。我进邮局不久，一位工友好意对我说，某处新设了一个女厕所，我虽高兴，但不好详细问他，也不敢去寻找，上班时，只好不喝水，不上厕所。

1928年8月，当我生病请假在家时，父亲从北方回来了，

他对母亲说，已把我的婚事定妥了，对方是我表哥，在北京工作，要我去北京结婚。此时，我考虑的不是结婚，而是保住工作的问题。我在邮局虽只工作了一年多，但这段时间里的感受非同寻常。我是在那叱咤风云的日子里，带着女性的自豪感踏进邮局大门的，我不愿随随便便离开邮局。我伯父说：“不要丢掉金饭碗。”我堂姐说：“妇女找工作真难啊！”他们都帮我出主意，写报告。湖南邮务工会经过缜密研究，分别向汉口国民政府交通部和湖南省建设厅呈交请愿书，交通部与省建设厅均向湖南邮务管理局发出指令称：对贺勃的任职，须详细调查，不得无理处置云云。但屠家驊仍以除湖南外尚无其他邮区雇用过女职员，男女同酬，而女的不能以同样效率工作，以及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等语搪塞。同时放出风声，要将我调往内地局工作，以迫使我主动辞职。

1928年11月5日，我因处境艰难，又要去北京结婚，向邮局报请婚假，要求婚后调往北京或天津邮局工作，但邮政总局批以“碍难照准”，我终于被迫离职。

结婚之前，父母曾安慰我：到北京还可以找到工作的。谁知到了北京人地生疏，公公、婆婆、丈夫都不支持我搞工作，加之家务纷繁，未能如愿。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天津，公公在天津英租界一个姓周的律师办事处分点工作借以糊口。1939年初，我丈夫因工作需要调往内地，我们老弱妇幼，生活凄苦。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英租界，日子更难熬了。出门就看到日本兵，中小学生都要学日语，男学生一律要剃光头，老百姓只有粗粮吃，间常配点细粮，只能给老人吃。冬天没有煤烧，全家就坐在被窝里取暖。南北交通阻隔，我和南方亲人音讯断绝。我记起儿时母亲说的话：“高丽亡了国，老百姓当了亡国奴，最怕你们大了当亡国奴……”我想：难道我们真的要当亡国奴了吗？

1945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全家老小兴高采烈地在天津欢庆胜利。两年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长沙。

1949年8月5日，我和孩子们在长沙街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我看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看见了解放军威武的军容，听到了解放军雄壮的歌声和宏亮的口号声，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队伍中行进着不少英姿焕发的女兵……我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

解放后，周南女子中学由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我的同学朱超被任命为周南女中校长，我被聘为该校出纳员。1951年，学校决定要我改教英文，随后又派我到教师进修学院业余进修语文，并改教语文，直至1962年退休。

我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而富于情趣。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工程师，儿子在长沙，女儿在外地。这些年，我一直和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儿子住在一起，家庭和睦。我身体还好，喜欢养花，能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年轻时曾是文体活跃分子，如今仍不甘寂寞，83岁时，曾参加长沙市妇联组织的老年妇女文艺表演。我每天看报、听广播，最喜欢的是体育消息。此外，经常练书法，学英语。有时还用英语同上中学的孙儿和上大学的孙女对话，老少相互促进。当儿孙们的欢声笑语在居室荡漾时，我常情不自禁地想：HOPE，HOPE，我当年的美好希望不是已成为美好的现实了吗！

周佛海浮沉录

周之友*

1938年底，我的父亲周佛海，脱离重庆国民党政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大汉奸。那时，我才16岁。到1945年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我已23岁。在这短短的7年时间里，正是我的青年时期。周佛海当汉奸后，虽然有4年时间，我在日本读书，即使在国内，也经常不在家里，但毕竟有些时候，例如寒暑假，特别是最后两年，是在他身边度过的。因此，他的某些汉奸活动，我是耳闻目睹的，对他的一些思想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将我所知道的周佛海的汉奸活动，包括实际活动，思想活动和他的一些打算，回忆并记录下来，提供专门研究“汪伪史”的同志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志作些参考。

由于仅仅是回忆，看过的有关材料又很少，错误之处，实在难免，希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给予指正。

一、投敌与粉墨登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好15岁，初中刚毕业。“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佛海就让我的母亲杨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难，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当时，我家住在

*周之友（1922—1985）即周幼海，生于日本东京，系周佛海之子。中共党员，建国后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工作。

南京西流湾8号，我在长沙时，听到一些朋友的父亲谈起周佛海，说他在南京西流湾，和一批人在家里谈论一种与当时抗战不同的论调，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年纪小，在当时又是个学生，不敢提出这种事来。一直到1938年春节前，周佛海到了武汉，也把我们 from 长沙接到武汉。那时，我便鼓起勇气，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时的一些情况。

周佛海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也故意和我们小孩子谈谈。虽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不高兴，说“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他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在西流湾8号，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以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那时，我还不知道‘低调俱乐部’这个名词，低调俱乐部是以后我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周佛海后来脱离重庆，是老早就有了准备的。因为他把我和我母亲、妹妹从汉口送到香港。当时，正值1938年春节。我们是从武昌的南湖机场坐飞机到香港的。去前，我也问过他：“现在是抗战的时候，送我们到香港作什么？”他说：“你在汉口读不了书，到重庆去，也读不了书，这两个地方都不安

全，飞机轰炸，要躲飞机，跑警报，所以，还是到香港去，那里最安全，好好读几年书再说吧！”那时我也年纪小，没办法，只好到香港去了。

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兰书店”。我们和重庆父母亲的联系，特别是包裹的邮寄，都是由这个机构转递的。当然，我和妹妹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在重庆搞所谓“和平运动”，其中也有周佛海。当时，我的思想闹不通，现在不是正在与日军抗战嘛，搞什么“和平运动”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住在九龙约道5号。我母亲告诉我，她去看他时，陶希圣、梅思平也住在那里。他们躲在那里，平时根本不到什么地方去。我见到周佛海，就问他：“报纸上登了许多关于你们搞‘和平运动’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还是把过去那些汉奸理论给我讲了一遍，最后还发表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说：“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周佛海的这种论调，就是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还神秘地告诉我，当前这个“中日和平”的秘密接触，首先还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搜集情报开始的。当时，我对这一点，是半信半疑的。

以后在香港居住，接触的时间更多，他也谈到汪精卫和日

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形。他说，高宗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结的就是高宗武，他到日本东京去，金城银行的董道宁和梅思平都参加了。日本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即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系统，就是首相近卫文磨。他还谈到军统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事情。他说，军统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的，但是搞错了，把曾仲鸣给干掉了。曾仲鸣作了汪精卫的替死鬼。在此以前，1月17日，军统在香港用斧头朝林柏生头上砍了一斧头。他还说，在曾被暗杀前，汪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因此，曾仲鸣被暗杀后，汪精卫很快离开河内，到上海去了。汪是由影佐和犬养到河内去接他的，先坐一条小船，然后再换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到上海的。

1939年4月，周佛海也到了上海。在离开香港前已向我母亲透露，他要和汪精卫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于5月底便和汪精卫一起，第一次去日本了。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译杨小姐，董道宁、周隆庠及日本人犬养健等人，这是由伊藤芳男在汪精卫住的岩崎别墅的假山上照的。他们那次去东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日汪关系和到底成立不成立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以及磋商如何成立伪政府的问题。就汪精卫来说，当然是希望越早成立越好。因为他自己就是想抓权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成立。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汪精卫，把重庆方面拉过来，以便使中日事变早日结束，汪精卫和日本陆相板垣第一次会谈中，争执得最厉害的，并不是成立伪政府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国旗问题。汪、周主张继承孙中山传统，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则认为这样不好区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主张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汪、周坚决反对。最后，暂时取得折衷办法，在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上，加一条黄色三角形的，写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旗。周对此仍然不满，他认为这样的旗帜是不能号召群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时，我就说过从小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不知道有什么黄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后和日本人谈判中，一定要把这小旗拿下来。周还告诉我，汪和近卫两人的秘密会谈，连翻译都不用，是笔谈的。

周佛海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就让我母亲的弟弟杨惺华到香港，接我母亲以及我和妹妹，都来上海。他告诉我，准备送我到日本去读书，周佛海当时住在虹口公园后面一条弄堂里，是受日本宪兵作保护的。平时，他深居简出，哪儿也不去。我到上海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影佐祯昭、犬养健、西园寺公一、伊藤芳男等人。当时周让我去日本读书。他说：“我现在搞‘和平运动’了，你在香港读书，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到日本去读书好，日本教育是很发达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间，我去过香港，办理转学手续，后来回到上海。那时，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园路1136弄59号，汪精卫住在31号。当时，我发现周佛海的活动与在虹口大不相同，来看他的人很多，当时正是他们刚刚召开了伪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紧锣密鼓，搭配班底，筹组伪政府的时候。

当时，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成立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机关是梅机关。影佐过去一直是在伪满州国工作的，是土肥原部下的一个得力人物，与周佛海关系非常好。周佛海会讲日本话，同别的汉奸相比，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有关与日本的交涉事谊，都是由周佛海进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和从日本回到上海，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拉拢人，组织班底。这里，他一方面要把国民党方面的人拉过来。他过去是国民党员，也是中统特务组织的要人，认识的人很多，当时许多人来看他，拉人下水当汉奸。

其主要办法是用金钱收买，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惺华亲自去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搞活动经费。当时，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几箱，两部汽车同时去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钞票。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担任了财政部长，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这种拉人工作，进行得更加频繁了。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和平运动”，不仅有日本人的扶植，同时也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后，钱新云、唐寿民就给了一笔20万元港币的捐款。这笔钱是由杜月笙交给在香港的周佛海的，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动经费外，其余部分便作为他们的“安家费”。由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人平分了。

第二件事情，是搞特务工作。当时，上海有租界，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行刺汉奸了。发生过好几次事件，如唐昭仪被砍死。在李士群、丁默村于周佛海到上海之前，已由影佐支持，干起“特工”来了。周到上海后，就和了默村、李士群他们统一起来。丁、李都是中共叛徒，以后干了中统，投降日军后，在上海当日本的武装特务。汪伪国民党“六大”以后，成立了特务委员会，了、李的特务组织，改组为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员是丁默村、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具体工作，是由丁默村、李士群去做。周与丁、李二人拉上关系后，成为周佛海的汉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通过操纵特务机构，而掌握了汪伪政权中相当重要的权力。

第三件事，是搞钱。因为搞这一套没钱是不行的。当时，除了从日本人那里拿来些活动经费外，特工总部还专门搞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开赌场、偷汽车、搞绑架票等。特工总部设在沪西地区的根司非尔路76号，人们称沪西为“歹土”，提起“76号”，便大有谈虎色变之感。因此，那时汪伪政府不

仅是个大卖国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欺压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

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上海还有所谓“维新政府”，头子是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北平有所谓“临时政府”，头子是王克敏、王隆泰、王揖唐等人。如何统一维新政府以及临时政府？把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统一到汪精卫系统里来，是摆在汪、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就有所谓青岛会谈。参加青岛会谈的主要有三方，即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压力下，梁、陈不得不把他们的招牌拿了下来，参加到汪伪系统中来。华北表面上也承认汪的领导，但事实上仍搞自己的特殊化。比如继续悬挂五色旗，军队不叫“和平军”，而叫“治安军”。货币还是“联银券”，这是因为日本人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周佛海准备青岛会谈、筹建伪政府的时候，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和运”，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了“日汪密约”事件。这事对积极投敌的汪、周等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打击。那时，我正在东京，同年暑假回到上海时，听到周佛海谈到此事，仍然余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东京听到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冈部长二谈过此事。他说，高、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筹建伪政府时，高宗武内定的是“外交部长”，却被褚民谊抢走了，陶希圣内定的是“宣传部长”，却被林柏生抢走了。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同时，他们对周佛海独揽“和运”大权，也表示不满。

当然，高、陶出走，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汪、周的“和平运动”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汪精卫，只能在沦陷区筹建“政

府”，而不能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陶希圣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把我到日本去读书，说成是去日本作人质的。

周佛海和冈部长二，对我谈及此事时，都认为高、陶出走，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周密策划的。高宗武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战前，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很好，认识宋美龄，戴笠就是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和高宗武夫妇建立了秘密联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巨额美金，送他们去美国。以后高宗武夫妇果然定居美国，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青岛会谈以后，马上就产生了汪记伪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问题。那时，日本人和重庆方面，也有另外的勾结，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同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

汪精卫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部分军队，如张发奎以前是粤军，是改组派的热脚。但后来他们并未响应，汪向日本人开的“支票”未能兑现。因此，部分日本人对成立汪伪政府，有无必要抱怀疑态度，周佛海当时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一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只好等着瞧。虽然如此，汪、周这一批人还是坚决主张成立“政府”，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日本统帅部觉得汪精卫也出来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在南京搞所谓“还都”，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在安排伪政府人事方面，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说，你父亲在南京政府中，事实上集大权于一人。他不但管财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当然筹建伪政府本身就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周面临着几个问题：1、伪政府主席是由汪精卫代理，还是由汪精卫正式担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张代理，好留与重庆给和解留有余地，决定照此办理。2、伪维新政府中的几个老头子，如梁寒操

志、温宗尧等，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院长或副院长，两个实力派：任援道、陈群则担任了伪海军部长、伪内政部长。3、76号的丁默村、李士群都想当警政部长，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周采取自己兼任部长，而让李士群任次长的办法暂时解决。李原系周佛海一派，但不久他投靠了陈璧君的公馆派。周、李矛盾日趋深化。由于李投靠了陈璧君，结果，迫使周佛海不得不把警政部长职务让给李士群。周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中凑了个热闹。罗君强锋芒不露，常常是“老婆长，老婆短”的，得罪了陈璧君，后来仅仅捞到一个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伪政府的班子虽然搭了起来，但却埋伏了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根子。

二、狗咬狗的斗争

汪伪政府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就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公馆派的矛盾。本来在伪政府人事安排上是在汪精卫的领导下，由周具体安排的，诸如主席代理，丁、李警卫部长之争，褚民谊当海军部长或外交部长，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以及维新政府人员安插等问题上，都取得暂时解决。但是，由于握有实权，相互之间利害冲突，很快就加剧了。最先是和陈璧君的矛盾，陈把广东视为私有，这就与周的财政部在税收上，中央对广东的特费补贴上产生了不少之争。此外，陈还过问伪府中央各部事务，这也引起当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极大的不满。我曾听见周佛海与陈公博在鸦片烟床上谈论此事，周抱怨陈璧君是南京的宋美龄。陈公博则劝周要忍耐。公馆派还通过林柏生的宣传部，掌握了伪政府的整个宣传机构。周想要他的亲信金雄白担任伪“中华通讯社”社长，遭到林的反对。林想将伪《中华日报》和周、罗控制的《中报》统一，以并吞

《中报》的企图，也被周、罗拒绝。到了1941年，林柏生的亲信胡兰成作了李士群的《国民新闻》副总编辑，公开写社论指责周佛海的财经政策和私生活。

我曾听见周佛海和替他办《中报》的金雄白讨论如何对付此事？结果决定用正面宣传的方法，宣传伪府财经政策是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的，以回敬这些指责。此外，林柏生还利用他掌握的青年运动，在1944年初，发动南京的大学生搞了一次反对鸦片的运动，捣毁了一些“燕子窝”，没收了一批烟土。这件事直接损害了伪财政部的特税和伪实业部的烟土经营。当然，这次所谓运动，也是短命的。因为这同样违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汪精卫还搞了两项周佛海未曾插手的活动，一项是“新国民运动”，因为这项活动没有什么具体的利害关系。所以，周采取听之忍之的态度。可是在“清乡运动”上，就不同了。周佛海虽然名义上也是副委员长，却一点实权也没有。实权完全掌握在秘书长李士群手中。李通过“清乡”事务，完全投靠了“公馆派”，这也加深了周与公馆派的矛盾。

周佛海为了削弱公馆派的力量，打击李士群，费了很多思考。到了1943年夏，在今井武夫，冈田菡次等人的支持下，通过汪精卫，取消了“清乡委员会”。同年9月，周佛海还进一步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李士群毒死。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周、李之间的斗争，是汪伪政府几年统治时期中的一件大事。它与汪伪其他各种内外矛盾，又互相交错在一起，本身又有其发展过程。很多事情，特别是最后李士群被毒死，当时都严格保密。连周佛海自己，在他的日记中，只是若隐若现的提到过。因此，有必要详细谈一谈。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到

过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村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76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村、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至少在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是如此。李的女儿认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是以部下的态度，在周的面前出现的，毕恭毕敬。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我问周，李士群这样作，到底什么缘故？周告诉我，这是为了表示自己别无二心。此外，76号门，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1940年周佛海给我祖母过生日，祝寿时，就在76号门内，连唱了三天堂会。表面上良好的关系，却也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了1942年还是如此。但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首先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斗争，丁也是中共叛徒。后来投靠了“中统”。他在中统的地位比李高，和周又同是湖南人。因此，一开始丁是二把手。但李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把丁放在眼里。1940年暑假我短期回国，就曾多次看见丁在周的面前，抱怨李对他的倾轧。

李士群和罗君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罗是周的亲信，1928年后一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他是周的一员干将。1940年7月，周佛海在上海筹办税警学校和成立税警团，开始，李士群也是参加的，周为了把持一切，便通过罗君强，把李士群及其一派势力排挤出去。1941年日本要在江南占领区进行“清乡”，让汪伪政府，成立了一个清乡委员会，罗君强为了争夺秘书长，和李士群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税警方

面，由于周的支持，罗取得胜利，但在“清乡”方面完全是李的天下，这样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周的冲突就越发紧张了。

1941年李的《国民新闻》，更公开攻击周的财经、财产政策。可是，从我自己经历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表面上仍然维持良好关系。

1941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因不愿去日本，而离家出走，到了杭州。周令李电杭州特务石林森把我拦住。我被迫返日本后，周、李又要万里浪对协助我的好友进行查询。1943年夏，李还买了飞机票，请我到青岛避暑。直到1943年以后，李虽然还是来到周家商议一些事情，以维持表面关系。但双方之间已充满了火药味，特别是1943年冬，我从北京回来，更感到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罗君强住在税校，不住在家里，出来时后面还有保卫车。他之所以如此，就是怕李士群干掉他。当时他们互相扬言要对杀。这时候，周佛海扩大了势力，又网罗了熊剑东。熊原来是军统，抗战初期在上海市周围打游击，后来被日本俘虏了，投降了日军。日军把他调到汉口一带，组织黄卫军，由武汉日本特务机关长落合主持。后来把熊又介绍给周，周用他为税警团副团长，成为周的两员大将之一。

这时，李士群也想通过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冈村大佐，拉拢熊剑东。周就利用这个关系干掉李士群。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菜里。这种毒药是用网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既不喝茶，也不吃饭。

说完就走。但今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能不吃。不吃就走，会碍于日本人的面子的。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主持人是冈村大佐。冈村和周的关系很深，以后调回日本任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

李士群的死，还有一段应提出来，就是和戴笠的关系。1943年以后，周不得不和戴笠勾结，特别是周佛海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以及岳父的小老婆都被关进息峰监狱。周佛海很孝顺他的母亲，他搞“和平运动”开始时，就派人想把我祖母接出来，但老太婆不肯。因为她老人家同我的母亲关系不好。她说：“我又不做没奸，怕什么。”戴笠知道周的母亲在沅陵，丈人在湘潭后，就把他们关了起来。由于这个原因，周不得不和戴笠联系。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就提出条件，说和他取得正式联系以前，要有立功表现，要把李士群干掉。

戴笠为什么要干掉李士群呢？因为“76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了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 and 人员。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掉李士群呢？主要有两条原因：第一，因李的势力日益增大，日本人恐日后尾大不掉。特别是日本人已经觉察李士群和共产党，具体说是和潘汉年有关。因而决定杀李。冯少白同志病故前，于1950年写的党史回忆录中，有同样的记载；第二，新任派遣总司令部第三课长辻政信。为了维护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在大力整顿伪方官僚，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现象。而李士群的许多活动，都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同意将李除掉。

周和公馆派矛盾之深，还表现在他和我谈论曾仲鸣之死时说过的一句话：“幸亏曾仲鸣死了，否则公馆派又多了一个人。”

周佛海同陈公博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谈一谈。陈公博本是“改组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周佛海高。抗战前就做过实业部长，他虽然一开始就参加“和平运动”，但一直到1940年3月，才从香港来到上海。汪伪政府成立时，他做了立法院长，1940年夏，傅筱庵被军统暗杀之后，才做了伪上海市市长，掌握了一些实权。他是汪伪政府中的第二把手，但他的弱点是，除了情妇莫国康以外，没有得力的干将。他虽是“改组派”，但由于和陈璧君关系不好，再加上和周的关系又不错，因此，在周和公馆派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他们经常轮流在各自的家里，躺在鸦片烟床上谈论至深夜。用周佛海的话说，这叫做“寓意见交换在谈笑之间”，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日本人派系繁多，政见不一，特别是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以及陆军、海军之间，矛盾重重。致使汪伪汉奸们，不知听谁的才好。如在接受法租界法院问题上，陆军主急，海军、外务省主缓。在对重庆工作上，日本人当时感兴趣的“桐工作”，和钱新云之间——周作民工作，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都认作是安排的，但是成功可能性不大，都认为日本人过于乐观，重庆则要破坏伪政府的成立，而且他们还认为日本上层是讲道理的，只是下级部门不好对付。

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打死后，关于继任人的问题，在对内问题上，特别是在陈公博出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问题上，汪精卫主张褚民谊担任。周支持陈公博出任，由于周的力主，汪精卫也只好同意。陈出任伪市长后，周佛海还帮助他选定伪市府人员。任命为副秘书长的胡泽吾，既是伪立法委员，又是周佛海

亲信罗君强的妹夫。伪财政局长赵厚之，是周妻杨淑慧的小同乡和远亲，可见周陈关系融洽。但是到了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出任伪代理主席，周、陈关系就逐步恶化，以致胜利时在南京演出火拼一幕。当然，这是后话了。

伪维新派中有两个卖力人物，即陈群和任援道，特别是陈公博与周佛海的关系，是应该提到的。在历史上周于1927年被捕时，就是由陈群审理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有“狼虎成群”一句话，就是指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杨虎，高等法院陈群。周和我谈到这一段时说：“陈群恨不得杀他，但因杨淑慧援救而没有成功。”因此，周是有点旧嫌未消的。伪政府成立之后，周就说此人，颇有拉拢之必要，否则障碍必大。周的确和陈往来谈论伪府事务，并说，

“看来此人是愿意合作的，不像是捣蛋的样子”。当他听到有人反映，陈群在背后搞小动作的情况后，却又当面对陈群含蓄的进行了劝告，还是团结的好。陈是福建人，和日本海军有关系，自己也会讲日语，在上海搞了个维新学院，把其中“学习”好的人派到日本留学，为自己培养干部。1940年他到东京，请我吃过一次饭，把他的所谓学生叫来一些，高谈阔论一阵，他还收藏图书。在南京时，他自己搞了一个图书馆，他除了做过伪内政部长外，还做过伪江苏省主席，这都是有好处的差事。

陈在汪、周之间，以及以后周、陈（公博）之间，从未过于偏向任何一方。他一听见胜利的消息，就服毒自杀了，他也是汪伪政府中唯一自杀的人；任援道是维新派中，另一个实力人物，他是一个军人，在苏州一带自己有好几个师的军事要人，当过伪海军部长和伪江苏省主席。1942年春，戴笠派他的堂弟任西萍，从重庆到上海同他联系。胜利后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汪伪政府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从开始的汪、周之争，经过周、李（士群）之争，最后又发展成为陈（公博）、周之争。

三、主子和奴才

周佛海和他的主子——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正如任何走狗和他的主子之间那样，既有投靠和效劳的主要一面；又有担心动摇的次要一面。当主子得势时，他们是一种态度。当主子失败时，他们又忙着公开或秘密地找新的主人了。总之，当好一名走狗，是不容易的。

周佛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对日本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日本人经常调动，这使事情很难办。对某一问题，双方刚取得一致意见，人换了，又得从头做起，好容易互相有了了解，性情、脾气摸熟了，人换了，又得从头再来；其次，日本各机构之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东京和外地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他特别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这些都反映出走狗的为难之处。他认为文人比军人好，东京比外地好，南京的侵略者比华北的侵略者好，上面的侵略者比下面的侵略者好。即使对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认为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这反映了奴才对主子的矛盾心理状态。

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之所以握有实权，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些很有力的日本军阀们的支持。支持周佛海的，首先是影佐祯昭，他是汪伪政府的主要策划人。以后又作了最高军事顾问。每逢我从东京回家度假时，经常见到他到我家吃午饭。并且和周进行密谈，能这样做的日本人，只有犬养健、冈田兰次和伊藤芳男。周佛海亲口和我说过：“影佐够朋友，除了太平

洋战争事先没有告诉我以外，其他日本国内外决策，影佐事先都和我通过气，在苏日立条约签字前，他曾向我透露日苏关系，将有重要改善。近卫将进行第三次组阁时，影佐事先也曾告诉过我。”周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这对他有利。主子的赏识与信任，使周佛海感激涕零。1943年春，我母亲访日时，正是影佐长女出嫁前，她带了我们兄妹去拜访影佐及其女儿，送给了颇为贵重的结婚礼物，即用作和服上的装饰品——翡翠玛瑙。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6月，影佐调离南京，先到满州，后来又调到南洋。我清楚的记得，周佛海与罗君强，谈论此事时，垂头丧气，忧心忡忡。1943年夏，周访问伪满时，还专门去和影佐秘密会见。当然，影佐虽走，支持周的日本法西斯军人还是有的，日本军人中和周的关系密切的，还有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酋次。川本最初就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年夏，他陪同周去武汉、北平等地，解决伪府和各沦陷地区，在财政金融上的统一问题。但周和川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是从1944年川本任上海陆军部长以后。上海陆军部本身就是特务谋略机构。周佛海和重庆的电台联系，日本人都知道。张子羽曾告诉我，他几次见过川本，并说，前有影佐，后有川本。这都是支持你父亲的实力人物。

当时，张子羽以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在上海担任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他深入虎穴，周旋于日伪群魔之间，不仅和川本等日本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也深得周佛海的重视与信任。1942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本宪兵逮捕。1944年秋，蒋介石驻沪军事代表、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周佛海先后保释吴开先和蒋伯诚，特别是在1943年4月派吴开先回重庆时，都得到川本的实际支持。1945年日本

投降前，我经常在上海，川本曾多次请我们全家去吃饭，并看当时禁演的美国电影。1945年春，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周淑海及其两个小女儿流落湖南，川本派专人找到了她们，并用飞机接到上海。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在接到蒋介石的委任后，去看川本，川本就向他保证，上海的日军坚决执行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支持周佛海，使他吃了第一颗定心丸，日本三井系财阀高岛菊次郎，当时在上海任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他的儿子高岛泰次，是川本的德文翻译，和川本的关系很深，高岛也是我在东京时，照顾我的人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当“上海行动总队”已经解散时，周佛海决定到重庆去，他特地要我去高岛家，告诉高岛父子，他将去重庆的事，并请他们将此事转告川本。高岛父子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再三说：“真想不到，你在这时会来看我们，你来得太好了！”我说明了来意之后，他告诉我，他们与川本常有电话联系，一定转告。临别时要周佛海保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彻底垮台，周本人也已完蛋之时，周最后一次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伸出自己的手，以示后会有期。这表明周在已经走绝的路上，仍然幻想会有“又一村”的梦境的。

冈田首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府的，并且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从陆大毕业后，又进了东京帝大经济系，是专门掌管军需和经济部门的人员。日本话叫做“主计”，他是伪政府经济顾问，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他都参与其间，是操纵汪伪政府经济命脉的主要日本人之一。不仅如此，周佛海的外出活动，如1943年夏访问伪满，同年秋到东京谈判归还金子问题，也都有他一同前往。至于周佛海通过顾祝同的丈人以及张子羽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进行的物资交换，更是他专管范围。他的“冈本公馆”设在上海，他经常到我家。

和我也很熟。我妹妹1945年春，在上海完婚时，他和川本都参加了。

上海的日本宪兵大佐冈村，也是支持周佛海的一个重要人物。冈村大约从1942年开始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他在周佛海的一些特务活动上支持周。

伪税警总团长的熊剑东是周的亲信，也是冈村的好友，李士群被毒死之策，就是他们谋划的。此外，梅机关成员之一，曾任伪政府军事顾问，以后当了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获那华雄少将，也是支持周的。

在日本法西斯军人中，臼井茂村，今井武夫，晴气都甲和辻政信，有的也是支持周的。但不及前几个人，有的则明确反对，臼井在汪精卫、周佛海搞“和平运动”时任参谋本部第八课（支那课）课长，是航空兵大佐。当时影佐在现地，臼井在东京都支持周。1939年我到东京读书，就由他指定第七课藤原岩市大尉、配合犬养健、西园寺公一、藤田谦次负责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他的立场和影佐又有些不同，在1940年时，臼井和今井还直接说，他们是宋子良的人，进行过中国与日本的“和平”试探，即所谓“桐工作”。日方甚至不惜推迟汪伪政府成立日期，周对此当然不赞成。不过臼井在整个汪伪存在期间，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不久他就在缅甸上空作战死了。今井倒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侵华活动的法西斯军人。

今井对汪伪政府的态度又不同了，一开始他不但进行“桐工作”，而且还进行其他几项对重庆的诱降活动。同时，他还认为汪精卫没有军队支持，没有自己的地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直到日本大本营作了最后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命令。周佛海仍把今井称为“参加‘和平运动’最初同志之一”。在某些问题上，他也支持周。比如1943年，周主张撤销清乡委员会，他和冈田同样是赞成的。然而，今井却在他的回

忆录里，发表过对周佛海带指责性的看法。他认为周和军统勾结，胜利时又当上了“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而其他“和平运动”的“同志”却被重庆枪毙了，这是出卖同志，而自己也逃脱不了病死牢房的下场。

晴气中佐也是梅机关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也任过伪府军事顾问，他是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的，因此，和李士群关系很深，是李士群最有力的靠山。李士群后来反对周佛海，也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从我1943年在东京的一段小小的遭遇也可看出这点。

1940年，当周、李关系良好时，周曾在东京麻木区用特务经费购置了一幢花园洋房，取名“梅花堂”，以招待从国内来的人，这个招待所，由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指定一个姓“一志”的日本人为负责人。我母亲1941年到日本时，一志就是接待人员之一。我母亲在梅花堂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和妹妹慧海，也在那里住过。因此，我和一志很熟，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他和晴气关系密切。从他看来，晴气、李士群、周佛海是一条线上的，对我也很客气。可是到了1943年初，我再次去日本时，为整理我的书籍和杂物，又去过梅花堂一次，才知道一志已经去苏州做了李士群的顾问。接任的老太婆对我很冷淡，要我把书籍杂物拿走。我回去问了我的房东冈部长二，他告诉我一志、晴气都是支持李士群的，反对你父亲的。都甲大佐1941至1942年任第七课课长，后来调到南京“派遣总队”任参谋，他不仅不支持周佛海，而且主张直接和重庆搞全面和平。都甲曾向周佛海提出一个方案：在“全面和平”中应使西南方面集中起来，在南京、重庆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迫使渝宁和谈。周佛海则认为，在内战时可以如此，现在不行。1944年春，我在南京时，唐生智的弟弟，军统派到汪精卫政府的唐生明，从上海来到我家为父亲庆寿。他不会讲日语，要我替他打一个电话。

给都大佐，预约会见时间，我照办了。事后，我问周佛海，唐为什么要找都甲？周都告诉我：一则都甲通过唐正在作龙云的工作，二则唐想依靠都甲作伪湖南省长。当然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成功，不过，都甲在其侵华活动中，倒是搞了不少阴谋的，而这些又和周佛海的利益是冲突的。

辻政信是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有名的石原莞尔的嫡系。他和周佛海的关系是微妙的，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的地方。当1943年周佛海第一次见面时，周就认为这是少壮派军人中的佼佼者，辻向周表示，日本所谓对华新政策，纯属挂羊头卖狗肉，只有石原莞尔来任驻华大使，板垣征四郎任总司令，方能彻底实现。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新民会就必须取消，以求中国统一。辻并希望汪精卫去东京时，向日本政府提出石原、板垣问题。周则表示，石原与东条不和，恐不能实现，且属日本内部人事问题，汪也不便提出。假使提出，若不能实现，汪的面子反不好看。辻则认为，目前在中国之三笠宫亲王，回东京后，也将向天皇提出，因此定能实现。当然这件事，以后并没有实现。

辻一直主张和重庆直接谈判，这一点和周相同。因此，当他们谈起这个问题时，周表示如果辻敢去重庆，周愿一同前往，虽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像这种谈话，关系不深的是不会有的。但是，周、辻之间毕竟分歧是主要的，这种分歧已经影响到周的切身利害关系了。在对重庆问题上，辻认为应该牺牲汪伪，1943年11月25日，他去奉化扫祭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周虽主张应和重庆谈判，但又认为不应将汪伪一脚踢开。

辻政信特别对汪伪政府人员，极端贪污腐化不满。因此，他认为如此怎能争取民心，决定进行“整肃”。不久，他就拿因贪污日侵略军军粮的后大桥、胡政开刀。这事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因素，同时又是一个军事问题。辻曾向人透露，

暗杀李士群，他也参与决定。因为，李势力日巨，恐尾大不掉。杀李这一点，周、辻虽一致，但“尾大不掉”这种情况，在周的身上也同样存在。再加上周妻杨淑慧，小舅子杨惺华，亲信邵式军，钱大魁等贪污程度更加厉害。碍于周的面子，辻一时不敢下手，后、胡事件只是杀鸡给猴子看，凡此种种，使周、辻之间矛盾更加尖锐。

1943年春，当我进入东京时，周的日本籍亲信伊藤芳男，从上海来到东京，住在日比谷水朋馆，我去看他时，他就告诉我，我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了替你父亲办一件重要工作，我带来大批款项，准备买通一位陆军省负责人事工作的将军，把辻政信从中国调走。时隔不久，辻政信果然调到新加坡去了。自称反贪污的人，却被贪污的炮弹打跑了。

1944年8月，周佛海最后一次到日本，他这次去日本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探视汪精卫的病情，其次与刚上任的小矶围昭首相接触，探询日本对华政策，并由伪中储银行向日本银行借款4亿日元贷款，第三，会见一向主张“全面和平”的宇垣一成，交换对“全面和平”的看法。当时日军已全面处于劣势，但法西斯军宇垣仍然打肿脸充胖子，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重庆谈判“和平”。不久宇垣又到中国来一次，不但与陈公博、周佛海继续接触，而且还见了与重庆有联系的周作民。周佛海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三个目的，正反映了汪伪政权政治上、经济上，又不得不更加依赖自身难保的日本侵略者，而“全面和平”，也救不了自己和自己的主人。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悲哀，正是6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卖身投靠的必然结果。

四、勾结渝方 秋波暗送

汪、周逃离重庆，当了汉奸以后，重庆接连对他们采取了

特务暗杀手段。特别是在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成，却杀死了曾仲鸣。所以，汪、周一到上海就组织了自己的“特工总部”，和潜伏在租界里的国民党特务，杀来杀去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局面。就是这个时候，周佛海仍然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比如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卖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思，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

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之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重庆方面的这一回答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初期开始，一直到最后，他们越来越坚持暗中布置，将来反汪的立场。这是因为形势对重庆更加有利，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

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这就是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他们两人我都认识，我也经常在家里看到他们。

在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想要杜、钱特别是钱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他是寄希望于周作

民——钱新之这条线。这条线首先是日本人打通的。“满铁”的西义显，在香港见了钱新之，促使他去重庆劝和，回来后再向汪精卫报告。并通过陈公博、周佛海见了周作民。说服他们到香港去游说钱新之。周作民去是去了，但行前也表示，成功把握不大，结果当然是没有成功。日本人倒是很重视这条线的。西义显曾陪另一居闲人张竞立去过日本东京，还拿了周佛海的介绍信，见了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松冈虽对这条线很感兴趣，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另一条线完全是由日本人进行的，由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桐工作”，就是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人很重视此事，故推迟了汪伪政府的成立日期，周佛海是极力反对此事的。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当然，这些也都没有成功。周反对这件事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重庆这样做，是要阻挠汪记政府的成立。

特别令我当时感到惊奇的是周佛海居然还和燕京大学校长，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见过面。我是在1941年夏，曾向周佛海提不再去日本，而要去美国读书。当时周口头上答应了，并说他可以找司徒雷登帮助我，搞到进入美国的签证。我有点不相信，我问我的母亲，她告诉我，司徒雷登从北京去重庆时，要经过上海，周佛海在租界一个什么朋友家里，同他见过面，为的是托他到重庆，商讨全面和平问题。原来司徒雷登在北京，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去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当然，由于整个形势不同，这些活动就具有不同性质了。在初期，是企图搞“全面和平”把重庆拉过来，以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既然侵略中国，又能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在中期和

期，则是在战争日益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下，利用“全面和平”的幌子，一面替日本帝国主义摆脱困境，一面为自己寻找出路。而重庆方面，在这接连不断的阴谋活动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这一点，周佛海自己也是感觉得到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也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彭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

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还有我的祖母、外祖父在息烽的照片。那时，我正在南京，程向周汇报时，我也旁听了。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预敌战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之军事人员。

1945年初，当周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顾都寄予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肯定是顾祝同，因此，你父亲大有作为。张还替周佛海拉拢胡宗南。胡宗南派驻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洪复礼，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由张向周说情。周即将洪保释出来，以后即与周联系。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伪府沪杭地区与西北物资交换问题。但终因胡宗南所处地区与上海相距太远，这条线没有什么发展。

除了这两个主要关系以外，在此时期，周还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其中我记得主要有：刘百川，他是抗战前，周在江苏省任教育厅长时期的老部下。由陈立夫派到上海与周联系的，以后又来往于沪渝之间。但因受戴笠排挤，也没有什么发展。另一个人是罗宝，又名罗教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从三战区屯溪来上海的，一直由周资助掩护。一些老的中统关系，如马元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由周保释，并资助他回重庆。有名的吴开先，也由周佛海打通川本芳太郎的关系，由日本派飞机送往重庆，让他“相机”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意见。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诱降，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还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通过周作民派了朱文雄去重庆，因已接近胜利，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我还多次听见周和他的亲信罗君强、杨惺华谈起在和重庆勾结中，他所担心的三件事：第一，中间人是否可靠，是政治

政客，还是真想做点事的人；第二，来接头的关系，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军统与中统、中央与地方等关系复杂，只好应付；第三，重庆当局是否可靠？是否出于一时利用。由于周在政治上，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所以这种担心是必要的，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对周的如意算盘不利，每况愈下，更加被动了。以后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这场丑剧的必然下场。

五、人·财·军

自周佛海当了汉奸，直到抗战胜利、彻底灭亡为止，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了一个中心，就是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而他和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的斗争与联合，又是同这个目的分不开的。首先从人事方面看，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村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当然，这三个人和周的关系并不一样。丁、罗一直和周站在一起。梅则不同。由于梅也属于“低调俱乐部”，又是“和平运动”的最初参与者。所以两人关系也是很好的，但是梅思平当了伪实业部长后，因鸦片经营、税收等问题，与周日益矛盾起来了。后来又投向陈公博，周对其他部长级汉奸，如岑德广、赵权雍、鲍文樾、陈群等都极力拉拢。至于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最应提出的是他的小舅子杨愷华。杨抗战前由我母亲资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

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以后由他单独管理），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杨也参与周的重要政治活动，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秘密电台，一度就设在他家。1941年和1943年，周两度去日本，也带了杨惺华同行。

其次，拉拢黄埔军校出身和原国民党江苏省教育界及中统方面的人员。这是因为周佛海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作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也是CC系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利用师生、部属等关系，来建立和发展个人势力，形成周佛海派系，亦即CC系。比如郝鹏举，项致庄、徐肇明、蔡洪田等，则是原江苏省政府的部属，至于CC系的人，则就更多了。

第三，网罗上海财政金融方面的所谓专家，如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陈之颐、司长俞绍瀛、张素民等。伪中储银行的钱大槲、戴霭庐、柳仪祥、夏宗德等人。周佛海和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没有政治渊源，但因周过去在这方面毫无基础，不得不用这些人。为了使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势力，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委以要职，予以重用，而且在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贪污，给他们以好处。

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的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钱大槲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掌握了财政大权以后，首先就要统一税收。江淮是汪伪控制的基本地区，因此很容易解决盐税、统税和关税问题。他分别委派阮毓琪、邵式军、张素民掌管，只有特税较麻烦。

税，就是鸦片税。鸦片的经营是由梅思平的伪实业部批准。当时上海为取得一张执照，须花几根金条作为贿赂。而鸦片从产地到销地的运输，则是由盛幼盦的宏济善堂以商业机构名义负责的。这个机构由日本陆军经理部门牢牢控制。并且派了一个叫里见夫的日本人监督。这样，周和梅、盛两人之间，就有矛盾了。后二人希望税少，周希望税多，最后在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干预下，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正式税率不变，再由盛定期送一定款项给周，周的亲信金雄白，就成了周、盛间的联络人。关于地方税款问题，由于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的支持，周于1941年在武汉时，即解决了武汉地方税款向汪伪中央缴纳问题。广州比较麻烦，因为陈璧君把广东视为私产。以后周与陈几次争议，结果名义上广东向“中央”缴纳，实际上又以“中央”向广东补贴方式发给广东。周在这次争夺中是处于失败地位。最困难的是华北，华北向“中央”缴纳的税款存入“联银”，伪财政部须要支出时，开联银券支票。当时市面上联银券价值高于中储券，是1比2，面官价是1比1。周就利用这个办法大肆贪污。我母亲在北京购买大批珍宝和房地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推广中储券，也是周佛海扩充财政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沦陷区全面使用中储券，从那以后，租界里的银行家，如金城的周作民，交通的唐寿民，大陆的叶枝霄，盐业的吴震修、中南的胡惠春和一些工业资本家，都不得不依赖伪中储银行。而中储银行，则通过贷款方式，加深和这些财阀的关系。中储银行的高级职员，则用各种方式进行贪污。周本人在中储银行的户头，可以无限制透支。中储银行用本行支票，将透支补上，周的特费开支也都来源于此。

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

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逢、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第一，这些军人都有实力，周需要利用他们；因为周掌握财政，这些伪军在领取饷银时，需要周佛海给予方便。比如在时间上，能早拿一天，就可以在市场上放利息，为自己获得利益；第二，由于周佛海和日本军阀的关系比这些投敌的将领要深。当他们有什么重大问题，须要打通日方渠道时，往往求助于周。

但是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作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这是一支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不但有各种轻武器，而且还有足够数量的，当时称为小钢炮的炮兵。到1944年，周又以物资交换形式，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那里取得一批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税警总团的防区，主要在浙东一带。这是富饶之区，与国民党三战区接界，又与新四军浙东部队犬牙交错。

在特务工作方面，周佛海和李士群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充分反映了周在这方面的扩充势力的斗争。李被毒死后，不但过去与李关系不好的苏成德，马哨天更加听命于周，就连李的亲信胡均鹤、万里浪、杨杰等，也纷纷来请周主持特工工作。

六、太平洋战争和周佛海的应变术

周佛海当了汉奸后，曾在日本人和他的亲信面前，发表过一种看法。他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同英、美开战，以免扩大战线，树敌过多，而应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的问题。重庆国民党政府，正寄希望于日本和英美的冲突上。如果日本真和英美打起来，那正上了重庆的当。当然这是周为其主子出谋划策，但也反映了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一种矛盾心理状态。日本败了，自己当然完蛋，胜利了会更加跋扈，自己的日子也会好过些。他不但有这样的看法，而且有这样的行动。他一方面送我去日本读书，同时送我妹妹进了上海美童公学，我母亲的美金10万元存在美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这说明他是想和美国保持一定关系。

可是，日本军阀的扩张和侵略，不是周佛海以及一些和周抱有同样见解的日本的英美派，如西园寺公一，犬养健和松本重治所希望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周在上海。凌晨，听到枪炮声，影佐祯昭很快就打来电话，告诉周佛海日军在太平洋已经和英美进入交战状态。上海日军已进驻租界，并向周道歉说：

“我事先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绝密的。”

太平洋战争，无论是对日军，或是对汪伪政府，以及周本人，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点周佛海心里是很清楚的。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一些留港的人不得不到上海，如颜惠庆、李恩浩、郑宏年、唐寿民、吴颂皋等。后三人都当了汉奸，唐、吴都成了周的军统中重要人物。日军占领租界后，伪中储券能在沦陷区全面使用，周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支持周的影佐祯昭，不久就被调到南太平洋的苏罗门群岛，做部队长去了。犬养健也因受“尾崎秀实案件”牵连到

东京候审去了。

周佛海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周与汪伪其他派别的斗争也更加激烈。1942年他曾有过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准备放弃伪财政部长及伪中储银行的领导权，把它让给“公馆派”，自己到华北去。周曾多次在人面前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偏安江左，而有所作为的必须北上。”当然，周要到华北去，必须得到日本人的同意。日本军阀中有一部分人，如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冈田酋次是支持周的。因为华北日军一向不听命于“派遣军总司令部”，如果能有一个较有能力的汉奸到北京去，对实行日本军令一元化是有好处的。因此，当时周于1943年夏，访问伪满，归途经过北京时，冈田酋次就陪同前往。周在伪满除公开礼节性访问外，主要是搞好同伪满的关系。他认为没有东北的合作，华北是搞不好的。他在北京时，曾和支持他的人广泛接触。当时北京、天津一带的银行家，如北四行，南四行等，也都希望周在北京。他们认为，有个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多少抢一点东西回来的人，比那些腐朽的北洋政客好得多。

南方一些闲居在北京的旧官僚，如张之洞的儿子，曾任伪满外交部长的张燕卿，曾任北京市长的何其等，都是支持周的。此外，华北的一贯道也是支持周的。但是，由于华北日军的反对，这个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1943年秋，周佛海随汪精卫赴东京参加日寇召集的“大东亚大会”，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陷于不利，为摆脱这种困境，因而对重庆加紧诱降，以便专力对付英美。同时，日本侵略者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实行所谓“对华新政策”，要促进占领区的经济。因此，周和藏相贺屋兴宣签署了归还三吨黄金的协定。从侵略者牙缝里，捞回一点残渣。周还和已不担任公职的犬养健秘密会见一次。周事后告诉我，犬养明确劝他

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希望他早作打算。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军人和知识分子，认为“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就要和重庆谈判，主张抛弃汪伪政府。“每日新闻”的吉冈文六，曾邀请周参加一次座谈会，公开向周提出：如果全面和平成功，“汪伪政府”何去何从的问题，周对此很为恼火。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正是反映“应变”之举，已经刻不容缓了。

进入1944年，整个世界局势更加明显了。在欧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已经完蛋，苏联正步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国也开始反攻，并轰炸日本本土。

3月，周佛海因患肺炎及心脏扩大，病情严重，日本帝国，特地从东京派来一个叫坂口的心脏病及肺病权威医学博士，来为周佛海治病。我也从东京赶回南京。直到4月底，才逐渐恢复健康。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到外面散散步。

有一天，我问周佛海，现在形势已明确摆着，你究竟如何打算？他告诉我，你知道，彭寿已去重庆，现在又回来了。我已和军统有联系，今后形势万一有变化，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问他，有两个问题你要考虑：第一，他们都是特务，是不是可靠？现在说的很好。将来会不会认账；第二，你和重庆来往，假若日本人知道了，你这个头也很危险。他笑了说，蒋介石有一封亲笔信给他，保证将来前途不会有问题。至于彭寿、程克祥他们是我从日本人的监狱里保释出来的，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允许他们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想通过他们搞“全面和平”。因此，我通过程、彭和重庆进行联系，这是合法的。但是，在合法当中我们另外搞了一套，这些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的。

周佛海病好后，我们回到上海，周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

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这“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佛海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我对周说，蒋的信对你还是客气，叫你戴罪立功。周说，官样文章总还要维持的，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汉奸哩，戴罪立功，给我一条出路，就算是不容易了，这一点，我现在也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我问周，蒋说对你的前途予以保证，这只是一句话，有什么更牢靠的保证没有？他说，政治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可靠的保证也很难。他把信给我看了之后，又把它放进保险箱里去了。我问他，这封信日本人是否知道？他说不知道。后来，我母亲托人把这封信带到香港，放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去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进老虎桥监狱时，还利用过这封信。

有一天杨惺华告诉我说：“程克祥想见你，要和你谈谈。”我就答应了。我在1943年底的一次宴会上，曾见过程克祥，但是没有讲话。因此，这一次和程克祥的谈话是第一次。程克祥见到我后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对你父亲当汉奸之事，是不满意的。你想出走，到杭州去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和我们有了联系。因此，不要再反对你父亲了，这会增加你父亲的烦恼。同时，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明显地摆在面前。美军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我问他你所指的支持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你最近还要到北京去。北京你只管去好了，我们也不是要你们做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希望从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父亲及其周围，多多说我的好话。我当时点了点头，说，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都支持。

我也向程克祥提出：你们是否注意到共产党的问题？程克

祥拍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好了，蒋介石在陕西有胡宗南的50万大军，一点没有动，专门预备对付共产党。因此，共产党的问题，三个月就能解决”。我说，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1945年初，程克祥又来找过我一次。当时，是在北京西路一个喇嘛庙里。他说现在形势更加发展了，但是你父亲好像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热心。希望你能跟他谈一谈，怎样更积极协助我们的工作，万一形势有了很快变化，准备工作搞得不好，那就来不及了。程克祥的话有一些是威胁味道。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没有表示态度。我妹妹周慧海在旁边，听了以后说，程克祥是什么东西，爹爹的事情要他管什么？当时，我也有这个感觉，因周佛海没有说什么，我也就没有多说。

不久，戴笠有个电报给周佛海，要他集中力量抓上海、江浙。假若周保住了上海，就是立了大功。因此，周必须要做上海市长。那时，陈公博已做了代理行政院长。能做上海市长的人，只有周佛海了。周任上海市长后，把罗君强调来做秘书长。周本人兼任保安司令、警察局长。熊念冻兼副司令，徐肇明任参谋长。

周任上海市长时，搞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把当时上海有名人物网罗起来，如周作民、唐寿民、叶扶霄、吴震修、颜惠卿、李恩浩等，把太平洋战争末期，国际上有一种做法，交战双方搞不设防城市。周当时也想把上海搞成不设防城市。但这事必须经日军同意，他想让日伪军部撤离市区，由警察维持市区治安。他自己准备在计划实现后，带着熊剑东的税警团去郊区。而罗君强以上海市副市长、警察局长名义维持治安。他还准备了几间公寓，每个公寓里面都有够吃几个月的食物，准备万一情况紧张，就让我和我妹妹住进去。对此，日本人也并非完全不同意，特别是川本芳太郎很支持，因为部队撤出上海

后，仓库仍留在上海。如果美军不轰炸，对日本人也有好处。另外，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同意，特别是瑞士。瑞士领事馆人员，好几次来找周商谈此事，因瑞士侨民在上海有大量财产（周妻曾通过瑞领馆买到一笔瑞士法郎）。江浙财阀也支持，周佛海也把此事向戴笠报告过。当时的形势是，美军即将登陆，美国和重庆方面当然都希望保持一个完整的城市。

周佛海也认为共产党不会反对，因为可以避免老百姓遭受损失。问题在于东京，东京怕上海做成功后，会使日军在太平洋的其他占领区的大城市，也仿效上海，这样使日本利用城市进行战略防御的计划不能实现，结果未搞成。

七、汪伪政府垮台

1945年6月下旬，传来我祖母在息烽监狱病逝的消息。此事，对周、戴之间的关系的加强，有一定作用。戴笠一听到周母死于息烽时，就立即赶去，作为孝子，替周母收殮，还披麻戴孝的治理丧事。周为此，对戴极为感激。戴笠此举，基于当时形势，想稳住周，好保住上海。周母死的消息，是通过程、彭的秘密电台打给周的。周因感激戴笠，也加强了对程、彭二人的“关照”，提高他们的地位。从此，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周家。

周母死后，周在上海玉佛寺大办丧事，这是周佛海一生大摆排场的最后一幕。共办了七七四十九天，花了不少钱，而全部费用都由中储银行支付。那时中国官场有个规矩，父母死后，自己应该提出辞职。周也照样提出辞职，陈公博表示挽留，准假一个月。周当时很悲恸，哭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请医生医治才好。周母死后，周觉得作了汉奸，对不起母亲，但也因此，使周死心踏地的跟戴笠走。

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14日日军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周赶往南京与陈公博商量对策。8月12日周不在上海，那天第一个到我家的罗君强，问我周佛海何时回来？我说，已挂长途去南京，但未接通。他要我接通后让周立即回上海。随后程克祥与彭寿拿着一份电报来，是戴笠委任周佛海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熊、罗为副司令的委任令。

日本人最先来到我家的是伊藤芳男，问周佛海回来了没有？我和他两人一起在收音机旁收听日本天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讲话。他听了以后，垂头丧气，要我在周佛海回上海后，赶快告诉他。

16日，陈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开伪府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南京伪政府，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当夜发生了周镐与陈公博的火拼事件。

18日，周电话通知我说，南京事件已经解决，当天回上海。我和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都到车站去接。我与周同坐一部车，在车上，我问他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戴笠发表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镐为南京行动总队司令以后，周镐就把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及财政部占领了，挂起了行动总队招牌。杨淑丹的财政部警卫总队800多人，都带上袖章。陈公博就派陈皋带宪兵司令部的宪兵，把西流湾8号包围了，要干掉周佛海。在当时的形势下，假定陈公博要干掉周佛海，周是要吃亏的。因为他只有杨淑丹的800多人，而陈皋是南京宪兵司令，几乎有一个师的兵力。这时，日本人出面干涉，派了小笠原少佐会见陈公博，他首先问陈公博为什么要干掉周佛海？陈说，周佛海与戴笠有来往，而且在周庇护下，周镐利用财政部警卫队，挂起南京行动总队的牌子，杀了肖叔萱。这事

对不起我。假若你们日本人出来调停的话，得依准我三个条件：第一、周佛海必须到我这里来向我解释。为什么事先不把与戴的勾结情况告诉我？第二、周来解释时，不能带卫队和武器，最多只能带一个副官；第三、不管周如何解释，都应向我道歉。日本人答应向周传达，但是日本人也向陈公博提出，要绝对保证周的安全。如果周佛海少了一根汗毛，他们就不答应。

周佛海接受了陈的三个条件，亲自登门向陈公博作了解释。周说：“你的地位一向比我高，特别是做了国民党政府的代理主席后，地位更比我高。假定我把戴笠联系的情况向你报告，你很难向我表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假若同意了，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假若你不同意的话，我就要吃亏。我不向你汇报，你可避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才没有向你报告，的确对不起你。他解释以后，陈公博也没讲什么。但陈皋的宪兵立即撤离了。这样，周佛海就回到家里，并很快上火车到了上海。

周、陈火拼事件解决后，周镐被日本人接到派遣军司令部保护起来。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周、陈火拼的紧张时刻，周佛海预备去见陈公博的时候，新四军的冯少白，派章兑来看周佛海。

上海行动总队是周佛海由南京回到上海后，与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等人商量后，于8月19日才成立的。到9月中、下旬结束。结束后，周佛海到了重庆，所谓上海行动总队的班底，只不过，把周佛海能控制的势力，换个招牌而已。当时，周能控制的势力，有这样几个部分：第一、伪中央储备银行；第二、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市警察局；第三、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税警学校和税警总团。

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副司令罗君强、熊剑东，

长程克祥，宣传处长彭寿、总务处正副处长杨惺华、马骥良，保安司令部正副参谋长徐肇明、刘明夏。下面有若干大队，总指挥部由保安司令部、税警总团、税警学校组成。

周佛海一到上海，还没有来得及与罗君强商量搭班事，就跑到川本那里，告诉川本他已被重庆委任为行动总队司令，希望了解日本方面的态度。川本表示，他和松井都完全执行天皇的无条件投降命令，保证在上海的日本军部队，决不挠乱社会治安。在国民党军队没有接管上海以前，负责维持治安。对上海行动总队也是支持的。然后，周又跑到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登部队所在地，面见松井。松井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周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也就放心了。

上海行动总队的任务是：第一，维持上海治安，防止共产党接管上海；防止流氓地痞及歹徒跳出来抢劫人民财产，当然这个任务主要是日军维持。上海警察及保安大队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是把上海的伪财政机构及人员档案物资器材等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第三，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及机构，供给活动经费。这些任务，周佛海都一一照办了。

戴笠大约在8月底、9月初到了上海。周佛海告诉我：胜利后，戴笠先跑到昆明解决龙云问题。因为，龙云问题不解决，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他到上海后，召见周佛海。对周说：“你放心好了，有我戴笠，就有你周佛海。”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也约见了周，说了些安抚的话。大约在9月初或中旬，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全部到了上海，国民党对上海、南京地区获得了确实的保障之后，戴笠对周佛海说：“现在委员长想见你，希望你到重庆去”。那时，丁默村也到了上海。戴笠也对丁讲：“可以到重庆去见委员长。”9

月25日，周佛海便移交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的事务，乘日机去了重庆。和周佛海同去的有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马骥良等5人。

周佛海在去重庆以前，有一天晚上12点左右，一个人在他卧屋后面凉台上踱步，我见他的样子，像在考虑什么问题，就凑上去说：“爹爹，据你看，前途怎么样？”他说：“很难讲”。这句话说明他自己也有些疑问。他马上加了一句：“熊剑东也不大放心”。我听后提出：“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吗？据我看，前途不一定靠得住。上海行动队已有几个明显的弱点。第一，上海行动队只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面的一个机构。换句话说，你是戴笠的部下，到现在为止，你和戴笠是平起平坐的，至少电报上的往来如此，何况戴笠在祖母死后，还作过孝子。现在发表你的名义，是把你变成了他的部下了，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面的上海行动总队。名不正、言不顺，应当考虑；第二，上海冒出来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以及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对你这个行动总队并不卖账，这是全上海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第三，周镐是南京行动总队总司令，和你一样，但是，他过去是你的部下……”他想了以后说：“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胜利后，我曾担心日本人趁这个时候在上海乱搞一气，败兵如山倒，军纪会很乱，把上海搞得乌七八糟。这一点我得到川本和松井的保证。事实也证明，日本人在上海没有什么乱来的地方，我已放心了；我也曾担心上海周围的新四军，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个时候会起来接管上海。这一点据张子羽告诉我，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指示是：市区地下组织不冒头，市郊新四军不进入市内。因此，我这个担心也没有了；我也曾担心上海地痞流氓出来趁火打劫，这一点担心现在也没有了。把上海搞乱的还是国民党自己。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他这样讲了之后，我提醒他，洪隆（冯少白）在南京不是找过你吗？章克送信给你，不是讲过，万一你要找洪隆，可以到章克家里去找。现在，你是否可以去找他？看看他那里到底是什么态度？假若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到南京，代表你去见他。你看怎样？他想了想，说：“算了吧，不要节外生枝了。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我就要将上海完整地交给国民党了。”这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八、这边也挂上钩

周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不但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而且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我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

第一，杨宇久。我的外祖父杨自容，二十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学生——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作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护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同志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作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在苏北新四军工作。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见了我就告诉我杨宇久的事。

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他姐姐——杨宇

久。我忙问她：“他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的？”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湾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寇占领南京时战死）。杨叔丹接着问：“你住在那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帮腔：“既然如此，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作，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为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当时，由于我母亲要送我妹妹去日本，杨宇久也就一起到了上海。杨宇久是我外祖母的干女儿，她就住在姥姥家，姥姥的家就在愚园路1136弄旁一条弄堂内。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卖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

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就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早已和邵式军有联系，周佛海也知道邵有这门亲戚。1943年春，冯龙从苏北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于是3月的一个深夜，邵式军陪同冯龙来到湖南路周家。冯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受何人委托，来商讨双方是否有可能合作的问题。冯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冯说：“当然这个问题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马上接腔：“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象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至。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又接着说：“你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

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

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作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周佛海还在我面前表示非常欣赏冯的这种办法。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1945年8月，抗日胜利时，在南京发生陈公博火并周佛海，派兵包围周的住宅事件时，伪宣传部副部长章克登门求见。周当时，因处理与陈的关系，要立即赶往陈家，表示不见。章又拿出一封信，希望看了信后再说，周仍不见。说：“人不见，信可留下”。但也并未看信；只往口袋里一揣了事。当周处理完陈火并之事以后，便立刻坐火车赶往上海。在火车上才想起章克送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冯龙写的。大意是，前次谈论的形势变化前景，现在已经到来；盼能全面商谈双方的共同对策云云。并指明，如能见面，请通知章克。可是，那时周已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周看后把信撕碎，往窗外一扔了事。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

安发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的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作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76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76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1955年潘汉年被捕，我母亲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而被拘留受审一段时间。

1944年夏、秋时，张子羽从第三战区的屯溪回到上海。我虽然是顾祝同的驻沪代表，住在上海，而实际上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周佛海虽然不能详细知道内中情况，但张与潘汉年有联系，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周佛海最大的忧虑，是怕新四军解放上海。他曾向张子羽探悉，中共对上海的对策是不进入上海，这使他感到放心，可以完整地把上海交给蒋介石了。

1947年秋，张子羽虽在南京监狱探视周佛海，告诉周，潘汉年已从解放区回到了上海，他们之间已经取得了联系。这是一次普通的接见，隔墙有耳。在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谈话。

以未能多谈。

1947年底，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因病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的时候，张子羽又一次去看望周佛海时，进一步告诉周说，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作点有益的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九、从白公馆到老虎桥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汉奸。陈公博、陈璧君、林柏生等要犯，先后入狱。在1946年的初夏，开始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将他们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周佛海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分子，汪伪政府的要员，本应立即逮捕法办，受到应有的惩治。但他却和陈公博等人的处境大不相同，因此，我愿意把他以后的情况简单地谈一谈，作为一个尾声。

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戴笠要把周佛海送到重庆去？而又不马上把他象其他汉奸那样送去法办。这个道理当然很简单。第一，周佛海为戴笠作过不少事情，一般人也都知道。假若他立即将周佛海送去法办，那他以后，还有谁为他卖命？他还要不要用人？因此，戴只好以蒋介石接见为由。把他诱到重庆去。第二，和周佛海有关系的伪军，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周直接控制的税警团，如果把周直接送进监狱，就会使伪军动摇，特别是熊剑东，当时已经有些动摇。戴笠此举目的是稳住伪军。

周佛海等5人，到重庆后不久，周病倒了。主要是旧病未全好，胜利后又忙了一阵，再加之有些忧虑等原故所致。周佛海病倒后，戴到上海，要我和我的母亲也去，说周病了，就这样，我和母亲便到了重庆。

周病好后，戴笠就把我们这些人，送进重庆白公馆软禁起

米。白公馆位于歌乐山的山腰，远远可以望见沙坪坝，是一幢三层楼的老式楼房。周佛海和杨淑慧住在二楼左边的大房，后边的小厢房，由看护和保姆住。丁默村住在右边的大房，马骥良夫妻住在后面的小房。罗君强住在楼下右边的大房，后面的小房，则由两名副官住。我和杨懋华住在左面的大房，后面的小房则由军统管理员魏孔住。白公馆内部的生活是自由的，不但可以互相来往，而且唱歌、打牌、读书、看报都可以，还可以和家里通信。只是必须经特务检查，唯一禁止的就是外出和外界人见面。

生活待遇也很好，每顿八菜一汤。我母亲不时还做点湖南菜。每星期洗澡一次，春节时，还吃了两顿酒席。他们这样作，说是共产党攻击甚烈，需要保护，实际是软禁。自此，再也不提蒋介石接见的事儿了。

白公馆院内左侧，还有一幢小楼，住着一警卫。在院子内晒太阳，是每个人每天必须做的事。每天下午，大家都等待从城里送来报纸，重庆全部报纸都有。报纸一到，我先拿新华日报，罗君强拿大公报，丁默村拿中央日报。当时正是毛主席访渝，国、共两党进行和谈，旧政协召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都很关心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与他们的命运有关系，看完报纸后，大家就议论一通。

周佛海到白公馆后，几次写信给戴笠，要戴看他，戴一直未来。到1946年4月1日，军统的“四·一”节时戴笠来了。事先周不知道，大家在二楼客厅里闲谈，戴未谈及他们的问题如何处理，只是一般谈形势。周向戴提出，最好让我儿子去读书，他又没作汉奸，何苦和我们在一起呢？戴笠就答应了。在谈话中，周还曾把戴拉到里面房间里谈了一阵。我当时还想他们有什么秘密要谈，事后，我问丁周，同戴在里房谈了些

么？周说，没有什么。午饭后，戴告诉周，他就要到北京和南京去。戴走后不几天，我们就听到戴笠飞机失事摔死的消息。白公馆的几个人，特别是周、丁听后很恐慌。那天晚上，他们儿人在楼上谈了许久。因为戴说过，有戴笠在，就有你周佛海在。现在戴不在了，很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前途更加悲观。他们认为，应尽快使他们的问题明朗化，不要总是蒙在鼓里，不上不下，不明不白。于是，决定由周佛海出面，给毛人凤写信，要求将他们送进法院。这封信是经我手交给魏孔的，由他转交给毛人凤。

在这穷途末路的环境中，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首先，周佛海心里闷闷不乐，因为他自己也感到前途不大乐观。在开始时还有一点希望，但后来情绪越来越坏。特别是听到南京、苏州两地的许多汉奸，都被枪毙了时，他认为自己也等不到大赦了。但他仍抱着一点希望，认为蒋介石不会处决他，他对蒋介石还有某些用处，还想投美帝国主义之机。

周佛海虽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在叛变后，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在此期间，他对我说过这样的看法，他说，“蒋介石一生面临三次重要选择：一次是1927年，当时反了共，所以是正确的；一次是1936年西安事变，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是错误的；一次就是现在，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反共到底。”

丁默村不愧是老牌特务，他一到白公馆，我就看见他和一个警卫鬼鬼祟祟地谈论些什么，很快我从我母亲那里知道，他通过这个警卫和外面建立了秘密联系。不久罗君强又告诉我，丁和外面秘密通信后，还布置他的一些老下级去找他的中统关系，为他们了解情况，开脱罪行。1946年4月底，我离开了白公馆，我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人。丁默村——也是大家——很关心我出去后，军统对我的真正对策，比如是否会跟踪监

视。他要我出去后，采取在重庆大公报登广告的办法，告诉他们我出去后的情况，好让他们放心，我当然照办了。

除了这些事情以外，丁还非常关心当时国共关系，他认为国共和谈破裂对他们有利，否则不利。他在大家面前公开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蒋先生怎么不派我们用场？”一切反动派都是把他们的命运寄托在反共上，结果，都遭到彻底失败，丁默村也不例外。他和周佛海住在二楼。所以，他们之间经常密谈，罗君强不时也参加。罗君强在白公馆的表现与丁不同，过去我对他的印象是锋芒外露，可是到了白公馆，却比较含蓄了。本来他想把他的第五个老婆接来的，不久看出矛头不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军统还把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周少海送到白公馆来，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他的老婆是个基督教徒，他带来了一本圣经，开始时读圣经，以后知道可以买书，他也买了不少书，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他对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关心的。但他既不象丁默村那样寄希望于反共，也不像杨惺华那样焦急，而是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他也很注意时局的发展，但不象丁那样发表露骨的反共言论。我的舅舅杨惺华，在白公馆七个月的生活中，做了这么几件事。

首先，他认为他之所以当汉奸，完全是由于周佛海的关系。因此，不断和周佛海争吵。周承认他对杨有影响，但是关键还是杨自己。他反驳杨说：“你又不是小孩子，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当我派专人到湖南去接我的母亲，你的父亲时，他们自己决定不出来呢？再说，你到了上海后，不是每次嫌官职不够高，而要求当这当那吗？当你聚敛大批钱财，纸碎金迷时，为什么不说这种话呢？”他们争吵了几次以后，杨同周绝交了。直到周病老虎桥监狱，都没说过话，也没去看望过他。杨为了财产之事，还经常和我母亲吵架。他

晚躺在床上念佛，每天早晨起床时，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气色，这些事情实在令人好笑。然而，我和他的关系还好，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从小还好，还因为我之所以到白公馆来，也是受了周佛海的株连。基于这种想法，勉强使我们两人找到了共同点。

其次，杨多次写报告给军统当局，为自己表白，并要他的老婆在外面走军统头面人物郑介民、毛人凤的门路，为自己活动。军统元老胡静安到白公馆来探望过一次，就是受了我舅妈的委托。胡和大家谈了以后，还和杨单独谈了。杨向胡谈了过去给军统做了那些事情，并请胡为自己帮忙。

和周关在一起的还有马骥良，钱大榭。马骥良和周佛海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是随钱大榭到伪中储银行当汉奸后，才成了周佛海的亲信。本来根据他当时的地位，是没有资格到白公馆的。这完全是因为他成了周佛海亲信的缘故。他们夫妻俩，没有一点怨天尤人的表现，而采取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杨淑慧一向是个急性人，但到了白公馆后，也无可奈何了。她只是为了财产事，和弟弟杨惺华吵架。至于我自己，七个月的软禁生活，使我读了不少书。在形势、时代和家庭遭遇的教育和推动下，过去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有了较多的觉悟。我不应该将一切归咎于周佛海，应将自己虽有反抗但不彻底的思想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我和周佛海也是不多讲话，一直到离开白公馆前夕，才在母亲的劝导下，和周佛海作了一次较深的谈话。特别是了解了几年来，他和共产党一些往来情况。白公馆的七个月，是我一生中，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过渡。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以后的道路更加曲折复杂，变化更大、更快，对我的考验，更加严峻罢了。

4月29日，军统局突然通知我，让我准备行李，说明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那时，我和成都的朋友也建立了联系。我到成都后，辗转回到了上海，然后到了苏北解放区。

我走后，军统很快改变了对周等人的态度。首先通知我母亲去上海。为什么让她去上海？他们摸不透，是凶是吉，只好去了看。他们和我母亲订了秘密联系办法，让我母亲到了京沪后，秘密给他们通信，我母亲由军统派专机送到南京，马上又送到上海关起来了。主要是追问财产，搞了一个多月。由于我母亲吞金自杀，军统慌了，只好把她放了出来。追问财产一事，草草收场了。

我母亲离开白公馆没几天，跟随周去的一个“副官”从警卫森严的白公馆中逃出，引起军统不大不小的一阵骚动。接着，也允许周少海出去了。不久，军统把周等人从重庆送到南京，监押在看守所内。

当国民党检察官陈绳祖在预审周佛海时，周申辩说，在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对收复上海是有功劳的。陈对此笑了笑，并把军统移交周到法院的移解公文给周看。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至于周逆佛海和我局的关系，以及胜利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名义一节，纯属一时利用，判刑时，毋庸考虑。”周看完后无话可讲。

1946年10月21日，周佛海在南京朝天宫被公审，周为自己写了自白书，竭力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国民党虽然对周佛海宽恕，但因周是全国人民最痛恨的大汉奸，不能有所顾忌。因此，11月9日判处死刑。周不服，进行上诉，被驳回；驳回后，周又抗诉；抗诉又被驳回。国民党法律规定被驳回抗诉24小时后，就可以枪毙。因此，1947年春节前腊月三十那天晚上（即除夕之夜），国民党法院把抗诉驳回书送给杨淑慧。杨接到上述通知后，很恐慌，便四处托国民党要人说情，为周佛海开脱罪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机要秘书陈方，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等，都是为周佛海开脱罪责的主要人物。陈布雷曾通过陈方向杨淑慧表示，要她不要经常去陈布雷家。因周的名

大，经常去的话，人家会怀疑有贿赂，对你我都不好，你用不看来，我总是周佛海的老朋友，我尽我的力量，能帮助的一定帮助。陈立夫出示材料，证明周佛海与中统关系和为中统作的工作。陈方及时把蒋介石对周的打算，事先告诉杨淑慧。当周佛海抗诉被驳回后，陈方对杨说：“委座（指蒋介石）已有这样的话，万一要枪毙周佛海，事先一定要得到我的同意。”杨淑慧婉转表示：“现在情况紧急，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把周佛海的命保下来。当然，你过去也讲过，不得老头子点头，周佛海是不会被枪毙的，万一到了这一步，就来不及了。这些我也是不得已才向你讲的。万一周佛海落到这种地步，我杨淑慧也不是没有办法来报复的。”陈方问杨淑慧：“你打算怎样报复？”杨说：“你大概不知道，蒋先生在沦陷期间，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周佛海，答应给周佛海机会，戴罪立功，并保证周佛海今后前途无虑。现在你们已把周佛海送进老虎桥监狱，还要枪毙他，未免太对不起人。假若真正走到这一步，我也不得不把这封信公之于世。”

熟悉我母亲脾气的人都知道，她要搞僵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陈方和我母亲很熟，他也知道她的脾气。我母亲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当然心里有数。于是他说：“你放心好了，我陈方用自己的脑袋保证，无论如何在24小时之后，不可能把周佛海枪毙。我现在就去请示蒋先生，把周佛海的命运决定下来。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公布了特赦汉奸周佛海令，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两万多汉奸罪犯中，便成了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了。4月4日，周佛海被移解南京老虎桥监狱。

1975年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曾经刊登了《汪精卫日记》一文，文中谈到了杨淑慧利用蒋介石给周佛海的

信，打官司的事，说杨亲自见到了蒋介石。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在打官司的整个过程中，杨淑慧和我都从未见到过蒋介石，提出这件事都是通过陈方实现的。

周佛海被送到南京看守所后，便开始生病，移解老虎桥监狱后，病情恶化，杨淑慧就想让保外就医，但周的名气太大，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以及监狱当局，都不敢应允。后来，国民党政府答应让周佛海搬到监狱内一间宿舍里，由家属找医生专门替他看病。从此，一直到他死，都是住在这里的。1948年2月，因病医治无效，死于狱中。

十、周佛海之死

软禁白公馆

1945年9月底，周佛海把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保安司令部、伪中储上海分行移交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后，前几天门庭若市的湖南路私宅，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从重庆飞来的新权贵们忙着上演“五子登科”的丑剧，而失势的大小汉奸则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戴笠跑来告诉周说，蒋介石要接见周。罗君强和丁默村、周等听了十分高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等人乘专机去了重庆。

周走后第三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戴笠在二楼客厅里和我母亲杨淑慧、外祖母、舅母谈话。母亲一见我就说：“你父亲一到重庆就旧病复发，戴先生已经把他送到四一医院请美国医生治疗。戴先生要我带着看护马小姐明天去重庆照顾你父亲。戴先生要你也去。”我说：“我不会照顾，我不去。”戴笠马上插嘴：“你过去不是很想到大后方去看看吗？现在一起去不是很好吗？”我说：“看是想去看看，但是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了，

利，交通没有恢复，局势不那么安定，我还是等局势稍稳定后自己去好了。”

戴沉下了脸说：“你知道，当我要什么人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志的。”

我马上回答：“我又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必要执行你的命令。”

戴脸一板，说：“你不走？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走！”

这时空气非常紧张，我外祖母和母亲都哭了，劝我还是去好。我知道戴笠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就说：“去可以，但第一，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动自由。”

戴说：“好，我答应你这两个条件，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许你用现在这个名字。”我母亲插嘴说：“你祖父叫周逵几，你就叫周祖逵吧。”戴接着说：“第二，不许你去看你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

我答应后，戴说：“现在我写封介绍信，到重庆后你去看毛人凤，由他来安排你。”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亲、马小姐、伪中储行秘书处处长马骧良的老婆以及一个广东老保姆坐飞机到重庆去了。

我们在白市驿机场着陆。军统总务科科长侯禎祥立即用汽车将我们送到重庆郊外磁器口军统大本营，戴笠的住地杨家山。丁默村、罗君强等人已经在杨家山。从他们口中，我知道周的病倒是真的，戴也确实把周送到四一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来到医院。周一人占用了三间病房，由他自己和跟去的副官使用。周在美国医生的治疗下病情已有好转，他坐起来和人谈话了。他一见我就毫无表情地说：“不是我叫你来的！”

周在医院治疗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务监视或保护。周的两副官随时可以到镇上购买物品，伙食也是根据医嘱准备的。但就留在医院看护周。不久周就康复了。

我到杨家山后，第三天由侯禎祥带我去见毛人凤。我把介绍信给毛，毛并没有仔细看，只是瞅了一眼说：“你的问题戴先生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了。他要我告诉你，你的事由他回重庆亲自安排，希望你安心等着他。”我故意问：“戴先生不是在信里说要你为我安排的吗？”毛回答：“我只能按戴先生的电报办事。”毛又说：“我很忙，你还是回去安心多等几天吧。”

我回到杨家山后，没有几天，就搬到白公馆去了。我们在白公馆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准备了整桌酒席让我们过年。

我们一到白公馆，侯禎祥吩咐道，为了保护我们，戴笠规定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来探望，我们也不能出去。我们可和外面亲友通信，但都必须交给侯禎祥寄出，外面来信也必须经过他转给我们。

兔死狐悲

软禁中的周佛海等人非常关心其他几个大汉奸的命运。当陈公博和褚民谊等被处决的消息传来后，都大为惊慌，缪斌被枪决的消息尤使他们震动。他们知道抗战末期，缪曾和蒋有勾结，以蒋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去东京和日本首相举行过秘密谈判。他们都认为，蒋是为了杀人灭口才第一个杀缪的。联系到自身的命运，他们就更惶惶不安了。

周、罗等人在白公馆的情绪各不相同。周一到白公馆就沉默寡言，每天在二楼踱方步，并托管理员买了英文书籍和字典认真地学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完蛋了，他在考虑下一步投靠美国主子了。

丁默村是老牌特务，他到白公馆不久就买通了一个警

外面建立了联系。要他的亲信联络他过去的部下，为他说情，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丁还叫我母亲买通大师傅和外面建立联系，他说：“当你和家里秘密写信时，也不要忘记公开写几封信给侯祯祥寄出去，以免他们怀疑。”

罗君强不象丁那么刁顽，他带了一本圣经，开始时每天读圣经，以后又要管理员买了一些历史书籍阅读。

舅舅杨惺华认为他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受周的连累，因此他一直不愿和周讲话。他要他的老婆到处活动，拉拢郑介民和毛人凤的老婆为他说情。他还多次写信、报告给军统，希望把他的问题另作处理。

1946年春节后不久，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周少海也由侯祯祥陪同来到白公馆。他原是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周当汉奸后戴把他关起来了。抗战胜利后才从兰州放出来，说是让他回湖南，到了重庆又把他送进了白公馆。他从小和周的感情不好，已过继给我的叔父周佛生。他认为这几年吃官司，完全是周佛海的关系，所以，一来就和周吵架。

周佛海曾写过两封信给戴笠，希望戴来看他。戴果然来了。大家到客厅坐定后，戴先海阔天空地谈些一般的事情。丁默村忍不住，向戴提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戴说：“应该相信蒋先生嘛。”丁又问：“缪默不是为蒋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吗，为什么反而第一个枪毙呢？”戴说：“他的情况特殊，所以要从速处理。”

戴笠走后没几天，白公馆管理局的人说他乘飞机在南京摔死了。警卫班的特务们都很紧张。周佛海等人一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丁默村这时带头开了腔：“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吱声。丁默村歇了会又说：“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然是毛人凤。毛是

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象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要他在老头子面前为我们讲几句好话，我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马骥良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苦笑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象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看，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到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公博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几个人偷生于此，未免对得起朋友，也没有什么意思。”周佛海说完接着问：“你们以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先回答。过了很久，还是追随周二十几年的罗君强开了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村也低声说：“那就这样办吧！”周看他们二人都表了态，便再没有问其他的人，说：“好，那就决定了。等他们再来时，我就口头提出来，假定他们不来，我们就写书面报告。”

第二天，管理局的人又在议论，说山下传说戴笠的死是老头子自己下令干的，他派人在戴的飞机上放了定时炸弹。周佛海等又凑在一起议论起来。丁默村说：“这完全可能。因为戴在胜利以后，实力大为膨胀，他的忠义救国军已经改编为交警总队，自己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胡宗南又在军事方面支持他，宋子文在财政方面也支持他，他自己又发了一批劫收财。同时，借解散特务机关为名，把他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以退为进，分散到全国各种机构里去，蒋介石怕他势力太大，尾大不掉，干掉他是完全可能的。”对丁默村这一番分析，大家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周听了以后微微叹了一口气说：“这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吧。”过了几天，侯桢祥就来通知戴笠死的正式消息，并说毛人凤继任军统局局长，过几天会来看他们。

众叛亲离

没几天毛人凤来了，周佛海说：“毛先生，你刚接管军统不久，我们觉得为了使你们不增加更大的压力，请把我们送到法院，根据法律来处理我们。”说着，周拿出一封信说：“这是我和默村、君强共同署名的信，请毛先生收下。”毛人凤推说刚刚接管军统没有几天，正在办移交，等局势稍为安定以后就去向委员长请示。他说：“希望你们绝对不要多心，应该相信委员长嘛！”周佛海一定要他收信，毛人凤坚持不肯收。周接着讲：“既然毛先生不肯把这封信收下，那就算我口头提出来吧。但还有另一件事情，要请毛先生答应，就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了，他完全没有必要住在白公馆，戴先生生前也答应让他出去的。”对这个问题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我出去后不准去看我父亲的老朋友；第二，不准在重庆逗留，也不准回上海，因为上海认识我的人太多，只能到成都去。我心想，到成都去正好，因为我的好朋友肖孟能正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到了4月底，我才接到通知可以出去了。当晚，母亲帮我准备行装时跟我讲：

“你明天要出去了，应该去和你父亲谈谈。”我想也确实应该和他谈谈，于是就上去和周佛海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在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中都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那时周佛海希望我到美国去读书，他说，你妈妈给的钱，供你到美国读三五年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我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了。”他听了以后说：“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

我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人。他们对我离开以后，军统竟采取什么措施是十分关心的。丁默村就说：“你出去以

后，到了成都要想办法在重庆《大公报》上登一个广告，告诉我们你出去以后的情况。”以后我出去了就照丁默村的办法办了。

第二天一早管理员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乘他去买长途汽车票的时候，就托旅馆的服务员给我打电报给成都的肖孟能。第三天我到成都的时候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在成都住了半个多月，又和肖孟能回到重庆，肖好不容易替我买到了回上海的飞机票。大约在6月初我就从重庆飞回上海。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送到上海，关起来追逼财产，那时我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6月底，地下党的同志送我去解放区，到了淮阴，我到华中分局联络部，杨帆部长接见了，并发展我为中共党员，决定再派我回上海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离开白公馆以后，周少海和周佛海大吵一次，要周佛海和军统联系，尽快放他出去。周佛海这才把侯祯祥找来，说：“你把他送走吧，否则我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结果周少海也离开了白公馆。

1946年中秋节后，我启程南下。当时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淮阴已经听到枪声。我好不容易过江到了江阴，买了一份《大公报》，一看才知道周佛海已于7月19日移解到南京高等检察院，准备受审。我赶到南京见到了杨淑慧后，知道周关在军统看守所。周提出，和他一起前来的马骥良的老婆、看护马小姐、广东老保姆和一名副官等人应放出去。军统答应了，第二天他们都被释放了。

负责处理周案的国民党首都法院的金某某（名字我忘了）和高等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都从重庆来的，是著名的笔吏。他们声称，一定要把周定为死刑。因为周是大财神，外面已经谣传我们接受他的贿赂，不判他死刑说不清；而且周自以为能言善辩，如果不把他判为死刑，好象驳不倒他的论点。

据周佛海告诉我，在审讯中，当周佛海强调胜利时军统委派他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的时候，陈绳祖即从档案中拿出一份公文给周看，上面清楚地写道：“至于胜利时委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一事，纯属一时利用，量刑时毋庸考虑。”当周看完后，陈冷笑道：“现在你总该没有话说了吧。”周说：

“是的，是利用。但是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时，难道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辈子吗？难道你可以利用所有的人一辈子吗？”陈说：“那是政治问题，我们司法人员办案的时候是从司法角度考虑的。政治问题，那是最高当局政治家的事。”

蒋 氏 救 死

杨淑慧为保全周佛海的性命，准备大打官司。首先，她请了三位律师，一是章士钊，一是王善祥，他是立法委员段运凯的亲信，还有律师杨家麟，负责周案的一些事务。第二方面是收集有关证据。其中有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杜月笙、吴绍澍、吴开先、马元放以及军统方面的一些人。陈果夫、陈立夫为周佛海写的证明是这样的：“……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丁默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死，拟请予日内飭司法行政部长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

在所有取得的证明中，被律师们认为最有力的是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6位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谷、吴化文和郝鹏举写的。我母亲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军统特务周皋去找这六个人联合签名，在这6人签名的证明上，详细地谈了周佛海在抗战期间在军饷、军械、驻防、情报、交通联络和日军办理交涉等方面给他们的帮助。希望对周佛海量刑

时，考虑以上事实。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我母亲也走访了一些周过去的老朋友，其中一个陈布雷，他是周的好友。还有陈方，他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1946年10月初某天，南京朝天宫大殿上，挤满了旁听的群众。上午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下午周佛海为自己辩护。陈绳祖则一一予以反驳，没有几天就宣判周为死刑。

周被判死刑后，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结果最高法院仍维持原判。这时只有家属可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于是，我母亲写了抗告，送到司法行政部。不料就在1947年除夕下午，抗告被驳回。根据国民党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周随时可以被枪毙。我母大为恐慌，立即赶到陈方那里说：“如果佛海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杨淑慧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陈方一听，就问：“你有什么办法呀？”杨淑慧说：“蒋先生曾经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上面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下面没有签名，只是写了‘知名不具’字样。这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佛海认识蒋介石的笔迹，这封信后来我送到香港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的话，请你不要怪我杨淑慧撕破脸皮，把这封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都会知道，蒋先生在说了那么多好话以后，最后还是把周佛海枪毙了，这对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政治信用来讲，总不大好吧。”陈方知道我母亲这个人急了是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就说：“蒋先生老早有话在先，枪毙周佛海，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决定。如果法院要枪毙周佛海，先一定要写公函来，我一定要把它扣下来。明天大年初一，我去蒋先生那里拜年的时候，就向他提醒这件事。我以脑袋担保，保证周佛海不会被枪毙，你尽管放心回去好好地过一个年吧！”

大年初四，我母亲到陈方家拜年的时候，陈方告诉她说，他已经把枪毙周佛海的公事压下来了，并和蒋介石谈过了，你们可以放一百个心，蒋先生绝对无意枪毙周佛海。果然，到了这年的3月26日，蒋介石就以国民党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特赦令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职守，虽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此令。

主席蒋中正

巫婆诈骗

周赦死后被关进老虎桥监狱，身体越来越坏，虽然用很多贵重药品治疗，都无济于事。

有一天，我母亲、妹妹象往常一样到监狱去看周佛海，等半天，也没见周佛海被扶出来。正感到奇怪，看守出来对我说：“周佛海今天扶也扶不起来了。”我母亲马上找到监

狱长说：“既然他的病这么厉害，无论如何要请监狱长让我见到他。”监狱长想了想说：“那用担架把他抬出来，在办公室和他见面吧。”我母亲表示不同意，说：“这样把他抬来抬去，万一发生更危险的问题那怎么办？”我母亲还去找了温医生，请温医生帮助说几句话。温医生向监狱长说：“周犯的是心脏病，应该保持绝对安静，这样抬来抬去，对他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监狱长就同意家属到牢房去看周佛海。

这时我母亲就想把周保外就医。她到上海去看章士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章说：“保外就医是监狱长所不能做主的，你只有去找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吧，也许他肯给我个面子。”于是我母亲带了介绍信和一份很厚的礼物去看谢冠生。

谢问明来意，看过章士钊的信，眉头一皱断然拒绝说：“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情况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批准他保外就医。蒋主席不久前刚刚明令把他减为无期徒刑，现在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又批准他保外就医，实际上是分两步走让他自由了，万一舆论界知道了，攻击起我来，我是担当不起的。”

谢冠生这条路子走不通，我母亲就又动脑筋想走小道了。当时南京有一个人称马太太的巫婆，她是广西籍国大代表马某某的老婆，住在安乐洒家，家里设了一个什么娘娘仙女的神坛，自称能治百病。杨淑慧曾多次到这个神坛前面请神灰送给周佛海服用。

有一天，马巫婆问杨淑慧：“你真想把周佛海保外就医吗？”杨说：“是的！”马巫婆问：“你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吗？”“当然愿意！不过你也要说说代价到底有多大。”

马巫婆压低了声音说：“我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她向我表示，如果你肯出40根大金条，她就有办法使周佛海保外就医。”

医。

“究竟是什么人，你要跟我讲清楚，我不能糊里糊涂来谈这件事情。”

马用更低的声音说：“是陈小姐。”

当时在南京传说，所谓陈小姐，是蒋介石的情妇，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心想，如果真是陈小姐愿意以40根金条作代价，把周佛海弄出去，那倒是一条门路，就怕不是真的。因此半信半疑地问道：“你真的认识这个陈小姐？”

“当然认识。”

“那么就这样，如果你能介绍我和陈小姐见面，她亲自当面向我保证，能在老头子面前为周讲几句好话，把周保外就医的话，那我就送她40根金条。”

“那怎么行，人家和老头子的关系，在外面是绝对保密的，就是有些人在外面传些什么，她自己也是绝对否认的。现在和你见了面，万一传出去，问题就大了。”马巫婆不肯介绍陈小姐和我母亲见面。

“既然你不能介绍我和陈小姐见面，那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和你谈下去了。”杨不置可否就走了。

杨淑蕙即赶到老虎桥监狱告诉周佛海，周断然反对，他根本不相信马巫婆，即使马所说的是事实，筹集40根大金条也很不容易。

病 死 狱 中

过了两天马又来找我母亲，问：“你到底有没有下决心。是你不相信人家，人家也不耐烦老等下去了。”杨也有点着急，一方面怕失去保外就医的机会，一方面又担心白送掉40根金条。她想半天，就对马巫婆讲：“那么这样吧，我给20条，事成以后再送她20条，你看行不行？”

“这我自己不能做主，等我回去问了她以后再告诉你吧。”马随即离去。当天晚上，马又来对杨说对方已同意这个办法。杨凑了20根大金条交给马巫婆，由她转交给对方。

过了没有几天，我回到家里，看见一个国民党的军法官，正在和我母亲谈话，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认真。歇了一会，那个军官走了，我问母亲，那个军官来是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这个人自称是军统军法处的军法官，他听说我向某一个有名的人运动，花了不少钱想把周佛海保外就医，问我是否有这回事，我已完全否认，因为我已经答应马老太婆，对任何人都都不提这件事。那个军官问了我好多遍，我都一口否认。最后，他说，给你个机会，明天我再来看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随后，我母亲就去看马巫婆了。到了第二天，这个军法官又来了，对母亲讲：“经过我们调查，我们已经肯定你干了这件事。你所运动的那个有名人物不是男的，是女的，而且你已经付了人家20根金条，其余20根等周佛海保出监狱后你再送给她。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母亲一听，心里更吃惊，但表面上仍然镇静，否认有这个事。这个军法官看我母亲一再否认，就恶狠狠地说了句：“明后天我再来，你对这件事情要负完全责任，万一真有这个事，出了问题，你是要担当责任的！”

我母亲马上赶到马家，责问马巫婆说：“军法官又来了，人家讲得这么具体，看来他全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了这番话，马的脸色很难看，呆了一下就说：“好吧，我现在告诉你吧，我根本不认识陈小姐，这只是毛人凤的老婆，想用你想保周佛海出外就医的心理敲你一笔。而现在来向你调查这件事的军法官是郑介民派来的。郑介民和毛人凤两个人是对头。郑想乘这个机会打击毛人凤一下，所以要你承认这件事。现在毛人凤老婆要我告诉你，只要你肯绝对否认这件事情，

个军法官也拿你没有办法。而且她也愿意把那20根金条还给你。”我母亲考虑一下，心想，承认是讨好了郑介民，但要得罪毛人凤。不承认这件事情要得罪郑介民，但可以讨好毛人凤，而且20根金条可以拿回来。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否认这件事好，就对马说：“好吧，我回去绝对否认就是了。”第二天，那个军法官又来了，我母亲还是一口否认。他要我母亲书面具结保证没有这件事情。我母亲当场写好签了字。这位军法官到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来过。过了两天，马巫婆把20根金条还给了我母亲。

杨淑慧想保周出外就医的打算落空以后，她又动脑筋想把周在牢房里的居住条件改善一下。她听说监狱里有一间不用的办公室空着，就去找监狱长，请他把周佛海从牢房里搬出来。监狱长开始不同意，经杨一再要求，后来监狱长也就同意了。并撤去看守监视，看护也出自己请，可以进行24小时的护理。

周的病情，到了1948年春节前几天更加严重。到了初五，便病死在老虎桥监狱。周佛海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以后放入杨淑慧珍藏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棺木里。棺材运到南京汤山附近的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个地方找到一块小小的穴位，为他殡葬。

周佛海的安葬是在1948年的清明。送葬的人除了他的亲属、几个亲友以及过去几名贴身副官以外，没有任何人。

